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红色

基因

代代传

红船精神
井冈山精神
苏区精神
长征精神
遵义会议精神
延安精神
抗战精神
太行精神
沂蒙精神
西柏坡精神
雷锋精神
焦裕禄精神
“两弹一星”精神

任仲文◎编

人民日报出版社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红色

基因

代代传

红船精神
井冈山精神
苏区精神
长征精神
遵义会议精神
延安精神
抗战精神
太行精神
沂蒙精神
西柏坡精神
雷锋精神
焦裕禄精神
“两弹一星”精神

任仲文◎编

人民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红色基因代代传 / 任仲文编. -- 北京: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18.3

ISBN 978-7-5115-5366-9

I. ①红… II. ①任… III. ①新闻—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52094 号

书 名: 红色基因代代传

编 者: 任仲文

出版人: 董 伟

责任编辑: 蒋菊平 钱慧春

封面设计: 元泰书装

出版发行: 人民日报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金台西路 2 号

邮政编码: 100733

发行热线: (010) 65369527 65369509 65369512 65369846

邮购热线: (010) 65369530 65363527

编辑热线: (010) 65369528

网 址: www.peopledaily.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大厂回族自治县彩虹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字 数: 228 千字

印 张: 15.5

版 次: 2018 年 7 月第 1 版 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5-5366-9

定 价: 38.00 元

目 录

弘扬“红船精神” 走在时代前列

习近平 1

红船精神

红船劈波行，精神聚人心。红船所代表和昭示的是时代高度，是发展方向，是奋进明灯，是铸就在中华儿女心中的永不褪色的精神丰碑。“红船精神”同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一道，伴随中国革命的光辉历程，共同构成我们党在前进道路上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不断夺取新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和宝贵精神财富。……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信念、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之源，也是“红船精神”的深刻内涵。

——习近平，《弘扬“红船精神”走在时代前列》，《人民日报》

2017年12月1日

弘扬“红船精神” 凝聚时代力量

陈 晋 12

大力弘扬“红船精神”

葛慧君 15

红船精神的新时代意义

胡 坚 19

井冈山精神

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每一名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把理想信念作为照亮前路的灯、把准航向的舵，转化为对奋斗目标的执着追求、对本职工作的不懈进取、对高尚情操的笃定坚持、对艰难险阻的勇于担当；都要一切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开拓进取，善于用改革的思路和办法解决前进中的各种问题；都要保持艰苦奋斗本色，不丢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不丢廉洁奉公的高尚操守，逢事想在前面、干在实处，关键时刻坚决顶起自己该顶的那片天；都要认真践行党的宗旨，努力提高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服务群众的能力和水平。

——2016年2月1日至3日，习近平在江西考察时指出

弘扬井冈山精神 加快老区振兴发展

中共江西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 24

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

张晓明 29

苏区精神

在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中，在建立红色政权、探索革命道路的实践中，无数革命先辈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以坚定信念、求真务实、一心为民、清正廉洁、艰苦奋斗、争创一流、无私奉献等为主要内涵的苏区精神。这一精神既蕴涵了中国共产党人革命精神的共性，又显示了苏区时期的特色和个性，是中国共产党人政治本色和精神特质的集中体现，是中华民族精神新的升华，也是我们今天正在建设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来源。……无论现在和将来，我们都要坚持继承先烈遗志，大力弘扬苏区精神，学习宣传在革命、建设、改革不同历史时期作出卓越贡献的共产党员的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使广大党员和干部从中获得精神鼓舞，升华思想境界，陶冶道德情操，完善思想品格，培养浩然正气，牢记“两个务必”，从而更好地经受住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防止和克服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习近平，《在纪念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8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2011年11月4日

苏区精神的内涵和表现

李红喜 34

论苏区精神

余伯流 43

苏区精神与红船精神

江西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55

长征精神

长征这一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

伟大长征精神，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

——习近平，《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2016年10月21日

红军长征与长征精神

石仲泉 60

论长征和长征精神

李洪峰 82

长征精神：中国共产党人的红色基因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95

弘扬长征精神 谱写壮丽篇章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理论研究中心 99

遵义会议精神

遵义会议作为我们党历史上一次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走独立自主道路、坚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政策策略、建设坚强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等方面，留下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我们要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

——2015年6月16日至18日，习近平在贵州调研时强调

遵义会议精神的内涵

曲青山 106

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

中共贵州省委中心组 110

延安精神

我们党是一个具有长期奋斗历史和优良革命传统的党，也是一个紧跟时代步伐、善于与时俱进的党。党的建设必须坚持继承和创新相结合，结合时代条件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老一辈革命家和老一代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留下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培育形成的延安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今天，全面从严治党要继续从延安精神中汲取力量。要把抓理想信念贯穿始终，提高辩证思维、系统思维能力，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为党和人民事业艰苦奋斗、不懈奋斗。

——2015年2月13日至16日，习近平在陕西考察时强调

延安精神的由来和体现

李颖 118

弘扬延安精神 走好新长征路

徐新荣 126

从延安精神中汲取从严治党的力量

靳铭 130

抗战精神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壮阔进程中，形成了伟大的抗战精神，中国人民向世界展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伟大的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永远是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强大精神动力。

——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69 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2014 年 9 月 3 日

不忘抗战历史 弘扬抗战精神

沈 强 134

对“抗战精神”的哲学思考

刘庭华 140

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柳建辉 李庆刚 148

太行精神

结合新的实际与时俱进地大力弘扬太行精神，坚定正确的理想信念，始终保持对党对人民对事业的忠诚；坚持执政为民的政治立场，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锤炼坚忍不拔、百折不挠的品格，始终保持知难而进、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坚守党的政治本色，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为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2009年5月24日至26日，习近平在山西调研时强调

太行精神的内涵与由来

胡 玥 152

抗日烽火铸就太行精神

王 科 160

沂蒙精神

在沂蒙这片红色土地上，诞生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儿女，沂蒙六姐妹、沂蒙母亲、沂蒙红嫂的事迹十分感人。沂蒙精神与延安精神、井冈山精神、西柏坡精神一样，是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不断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发扬光大。

——2013年11月24日至28日，习近平在山东考察时指出

沂蒙精神的形成及发展

胡晓青 166

弘扬沂蒙精神 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王玉君 173

沂蒙精神：涵养中国精神的重要话语资源

徐东升 182

西柏坡精神

西柏坡我来过多次，每次都怀着崇敬之心来，带着许多思考走。对我们来讲，每到井冈山、延安、西柏坡等革命圣地，都是一种精神上、思想上的洗礼。每来一次，都能受到一次党的性质和宗旨的生动教育，就更加坚定了我们的公仆意识和为民情怀。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多重温这些伟大历史，心中就会增加很多正能量。

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之际，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向全党郑重提出“两个务必”，是经过了深入思考的。这里面，包含着对我国几千年历史上治乱规律的深刻借鉴，包含着对我们党艰苦奋斗历程的深刻总结，包含着对胜利了的政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对即将诞生的人民政权实现长治久安的深刻忧思，也包含着对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深刻认识，思想意义和历史意义十分深远。

——2013年7月11日至12日，习近平在河北省调研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时指出

西柏坡“立规矩”的启示

中共石家庄市委 188

在弘扬西柏坡精神中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

刘月 贾玉娥 192

雷锋精神

雷锋精神是永恒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体现。你们要做雷锋精神的种子，把雷锋精神广播在祖国大地上。

——2014年3月11日，习近平出席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解放军代表团全体会议，接见部分基层代表时指出

让雷锋精神成为改革发展的时代标杆

杨忠民 谢文凤 198

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焕发光彩

钧 青 200

弘扬雷锋精神是真正的文化自信

刘德中 206

焦裕禄精神

要特别学习弘扬焦裕禄同志“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的公仆情怀，凡事探求就里、“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的求实作风，“敢教日月换新天”“革命者要在困难面前逞英雄”的奋斗精神，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殊化”的道德情操。要把焦裕禄精神作为一面镜子，从里到外、从上到下反复照一照自己，深入查摆自己在思想境界、素质能力、作风形象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努力向焦裕禄同志看齐，从今天做起，从眼前做起，从小事做起，像焦裕禄同志那样对待群众、对待组织、对待事业、对待同志、对待亲属、对待自己，像焦裕禄同志那样生命不息、奋斗不止，努力做焦裕禄式的好党员、好干部。

——2014年3月17日至18日，习近平在河南省兰考县调研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时指出

焦裕禄精神是党的宝贵财富

湖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210

学习焦裕禄精神重在实干

陈礼洋 213

“两弹一星”精神

“两弹一星”精神激励和鼓舞了几代人，是中华民族宝贵精神财富。

——2011年1月26日，习近平看望三位著名科学家时指出

“两弹一星”精神的内涵与体现

李 斌 218

我国“两弹一星”历史研究现状与前瞻

詹 欣 226

弘扬“红船精神” 走在时代前列

习近平

1921年8月初，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浙江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上胜利闭幕，庄严宣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这条游船因而获得了一个永载中国革命史册的名字——红船。

红船，见证了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成为中国革命源头的象征。红船，一直接受着人们特别是共产党人的瞻仰。上世纪60年代，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同志两次重访南湖，即兴赋诗。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关怀党的诞生地，或瞻仰红船，或亲笔题词，勉励我们“沿着南湖红船开辟的革命航道奋勇前进”。2002年10月，我调任浙江后，即怀着无限崇敬的心情，专程到嘉兴南湖瞻仰红船，接受革命精神教育。今年春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浙江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来到南湖瞻仰红船，举行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专题学习会。在先进性教育活动期间，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从全国各地来到南湖，看一次展览，听一次党课，学一次党章，观一次专题片，瞻仰一次红船，重温一次入党誓词。嘉兴市广泛开展以“精神传承、思想升华”为主要内容的“红船精神”大讨论活动，有力地促进了先进性教育活动。

红船劈波行，精神聚人心。红船所代表和昭示的是时代高度，是发展方向，是奋进明灯，是铸就在中华儿女心中的永不褪色的精神丰碑。“红船精神”同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一道，伴随中国革命的光辉历程，共同构成我们党在前进道路上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不断夺取新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和宝贵精神财富。80多年来，“红船精神”一直激励和鼓舞着我们党坚持站在历史的高度，走在时代的前列，勇当舵手，引领航向，不断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一个又一个胜利。

“红船精神”——党的先进性之源

一个大党诞生于一条小船。从此，中国共产党引领革命的航船，劈波斩浪，开天辟地，使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伟大的革命实践产生伟大的革命精神。“红船精神”正是中国革命精神之源：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形成的优良传统和革命精神，无不与之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从这条红船扬帆起航，就始终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推动中国历史前进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领导核心作用。正如党的十六大报告所明确指出的，党的先进性“归根到底要看党在推动历史前进中的作用”。红船正是走在时代前列的象征，“红船精神”就充分体现了走在时代前列的精神，这也就集中体现了党的先进性，是党的先进性之源。

中国共产党沿着红船的航向，以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始终站在历史和时代发展的潮头。上世纪20年代的旧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马克

思列宁主义，“五四”运动中工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这都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作了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中国共产党正是顺应求民族独立、谋人民解放的历史使命，勇立社会历史发展的潮头，在南湖红船上宣告成立，从此使中国革命的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对此，毛泽东同志称之为“开天辟地的大事变”。董必武同志在故地重游中欣然命笔：“烟雨楼台革命萌生，此间曾著星星火；风云世界逢春蛰起，到处皆闻殷殷雷。”南湖红船点燃的星星之火，形成了中国革命的燎原之势，使四海翻腾，五岳震荡。我们党从这里走向井冈山，走向延安，走向西柏坡，由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

中国共产党扬起红船的风帆，以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矢志推动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不断前进。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先进政党。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使中国革命从此有了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强大的精神支柱。在惊涛骇浪不断的革命大潮中，红船在升腾，共产党人的信念也在升腾。当初，党的“一大”会议在白色恐怖中召开，由上海转至嘉兴，在南湖红船上完成缔造中国共产党的使命，靠的是坚定的理想信念和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之后，我们党在长期艰苦卓绝的奋斗中，历经曲折而不畏艰险，屡受考验而不变初衷，由小到大，由弱变强，靠的还是坚定的理想信念和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中国共产党人不管风吹浪打，不怕急流险滩，始终坚定自己的理想和信念，以压倒一切敌人、战胜一切困难的大无畏英雄气概，矢志推动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大船劈波斩浪、不断奋进。

中国共产党载着红船的意愿，以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努力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革命声传画舫中，诞生共党庆工农”。中国共产党从诞生那天起，从来就没

有自己的私利，而是以全心全意为人民谋福利为根本宗旨。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任何一个政党的显著标志。依水行舟，忠诚为民，成为贯穿中国革命和建设全过程的一条红线，也是“红船精神”的本质所在。肩负为人民谋利益的神圣职责和崇高使命，中国共产党人以自己的身体力行，宣传、发动和引领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心，和衷共济，英勇奋战，在推进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进程中，不断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信念、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之源，也是“红船精神”的深刻内涵。我们要高举“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就必须永远铭记我们党的“母亲船”，重温红船的历史沧桑，在继承和弘扬“红船精神”中永葆党的先进性，进一步激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的信念和力量。

“红船精神”对党的先进性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已踏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伟大征程。保持党的先进性，既面临着新的要求，也面临着新的考验。在新的形势下，继承和弘扬“红船精神”，对于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进一步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完成党的执政使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红船精神”是激励我们把握发展这一时代主题和党执政兴国第一要务，大胆探索、创新创业的强大思想武器。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一大主题，也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首要任务就是提高领导发展的能力。当今世界处于深刻变化之中，综合国力的竞争日趋激烈，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也出现了

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问题。“红船精神”昭示我们，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我们不能因循守旧，刻舟求剑，必须勇立潮头，敢为人先，以创新的精神永葆党的生机和活力。面对新挑战、新机遇和新形势、新任务，我们要坚持和发扬“红船精神”，有敢于突破前人的勇气和智慧，自觉克服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的思想观念，坚持用创新的理论成果武装头脑，用创新的思想观念谋划工作，紧紧扭住发展不放松，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不断推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

“红船精神”是鼓舞我们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不畏艰险、艰苦奋斗的强大精神支柱。中国革命的航船是在惊涛骇浪中到达成功的彼岸的，中国改革和建设事业的航程同样不会一帆风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创造性事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一项空前艰巨的宏图伟业，在推进其发展的漫漫征程中充满了重重困难和各种风险。“红船精神”昭示我们，逆水行舟，不进则退。面对我们的基本国情和我们党的历史使命，没有坚定的理想和必胜的信念，没有不畏艰辛、励精图治的精神状态和艰苦奋斗、顽强拼搏的作风，就难以克服前进道路上的重重困难，难以战胜前进道路上的风险和挑战。我们必须坚持和发扬“红船精神”，坚定理想信念，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危，处盛虑衰，以共产党人的胸襟和眼界观察世界、判断形势，恪尽职守、脚踏实地，不怕艰难、坚韧不拔，矢志拼搏、艰苦创业，努力谱写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篇章。

“红船精神”是鞭策我们牢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本质要求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求真务实、一心为民的强大道德力量。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我们党自诞生之日起就以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为己任，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坚持立

党为公、执政为民，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与生俱来的政治品质和最高从政道德，是衡量党的先进性的根本标尺。“红船精神”昭示我们，党和人民的关系就好比舟和水的关系，“水可载舟，亦可覆舟”。革命战争年代，正是在“红船精神”引领下，我们党从民族大义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充分发动并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夺取了政权，从此成为在全国掌握政权并长期执政的执政党。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经受着执政和改革开放的双重考验。党的先进性能否始终保持，党的执政地位能否不断巩固，根本取决于人民群众对党的信赖和拥护，而这又取决于我们党能否践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取决于我们党能否团结带领人民群众求真务实、真抓实干。我们必须牢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谆谆教诲，继续发扬“红船精神”，始终不渝地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政德，真正干出有利于党和人民事业的政绩。

在新的实践中继承和弘扬“红船精神”

“红船精神”是我们党创立时期坚持和实践自身先进性的一个历史明证。正如党的先进性不是与生俱来、一劳永逸的，“红船精神”也是具体的、历史的。我们要把“红船精神”贯穿于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的实践上来。把握住这一点，就从根本上把握了“红船精神”的实质与核心，同时也就把握了党的先进性的真谛。

红船起航于浙江，既有历史的偶然性，也有历史的必然性。这是浙江的光荣，也是推进浙江发展的精神力量所在。联系浙江实际，我们要在新的实践中继承和弘扬“红船精神”，就必须结合当前正在

开展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高扬理想的风帆，荡起奋发的双桨，乘着改革开放的浪潮，认真贯彻胡锦涛总书记对浙江工作提出的“努力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走在前列”的要求，做到学在深处，谋在新处，干在实处，再铸浙江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的辉煌。

第一，要深入实施“八八战略”，努力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方面走在前列。科学发展观是指导浙江实现更快更好发展的根本指南，深入实施“发挥八个方面优势、推进八个方面举措”的“八八战略”，是浙江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实践。我们要不断深化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不断提高用科学发展观来指导实践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不断推进“八八战略”的深化细化具体化，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更加注重统筹兼顾、加强薄弱环节，更加注重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更加注重以人为本，实现和维护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要坚持在贯彻中央宏观调控政策中把握经济发展全局，正确处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与加强政府宏观调控的关系，确保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要以主动的姿态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切实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作为结构调整的中心环节，把建设节约型社会放在重要位置，把统筹城乡发展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着力点，把加快建设先进制造业基地和发展现代服务业作为结构调整的突破口，把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作为根本动力，努力在更高层次上推动浙江的发展。

第二，要全面建设“平安浙江”，努力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方面走在前列。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根据当今时代社会实践发展的新要求 and 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需要，而提出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战略、新举措。浙江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方面具有较好的条件。特别是建设“平安浙江”的具体实践，为我省构建和谐社会打下了工作基础，积累了有益经验。我们要以建设“平安浙

江”为载体，积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时代特征、浙江特点的和谐社会。要建设“法治浙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法制保障。要加快文化大省建设，增强构成浙江综合竞争力的软实力，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智力支持和精神支撑。要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激发社会发展的活力和创造力，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进一步做好关心群众生产生活特别是帮扶困难群众的各项工作，不断健全社会保障和社会救助体系，为构建和谐社会营造良好的氛围。要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努力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高度重视并切实做好维护社会稳定的各项工作，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良好的社会秩序。

第三，要切实增强执政本领，努力在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方面走在前列。党的先进性建设是关乎党生存、发展、壮大的根本性建设。要扎实抓好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把“走在前列”的要求贯穿于先进性教育活动的全过程，做到谋划工作有“走在前列”的意识，学习动员有“走在前列”的内容，分析评议有“走在前列”的标准，整改提高有“走在前列”的要求，努力解决存在的突出问题，真正使我省先进性教育活动成为推进各级党组织自身建设的基础工程、提高党员思想政治水平和工作能力的素质工程、人民群众真正得到实惠的满意工程。要以改革的精神推进党的建设各项工作，围绕深化理论武装这一首要任务，深入研究如何全面贯彻“真学、真懂、真信、真用”的要求，坚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问题；围绕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这一总体要求，深入研究在选人用人、党管人才、政绩考核、能上能“下”、管理监督、基层基础等方面的一些难题，努力求突破、创特色、出成果；围绕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这一核心，深入研究如何全面贯彻求真务实的要求，进一步转变作风，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同时，要把制

度建设贯穿于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建设之中。

总之，我们要在新的实践中继承和弘扬“红船精神”，在“红船精神”的激励和鼓舞下，不断强化前列意识，切实把“走在前列”的要求体现到精神状态上，贯彻到衡量标准上，落实到各项工作上，再接再厉，乘势而上，努力为全国大局作出积极的贡献。

（新华社北京 11 月 30 日电）

《人民日报》，2017 年 12 月 1 日

红船精神



红船劈波行，精神聚人心。红船所代表和昭示的是时代高度，是发展方向，是奋进明灯，是铸就在中华儿女心中的永不褪色的精神丰碑。“红船精神”同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一道，伴随中国革命的光辉历程，共同构成我们党在前进道路上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不断夺取新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和宝贵精神财富。……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信念、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之源，也是“红船精神”的深刻内涵。

——习近平，《弘扬“红船精神”走在时代前列》，
《人民日报》2017年12月1日

弘扬“红船精神” 凝聚时代力量

陈 晋

弘扬“红船精神”，激发担当创新的时代力量

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体现了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是因为在此之前，为改变中国，各种各样的主义、方案和道路，都尝试过了，也都失败了，只有一艘小船承载的先进政党，在启航的时候，矗立时代潮头，在乱云飞渡、暗夜无边的局面中，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和中国工人运动的实践结合起来，把“改变中国和世界”的历史使命和扎实有效的革命道路结合起来，走出一条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救国、兴国和强国的道路。建党先驱们做出这样的选择，体现出何其深刻的远见，何其勇敢的担当，何其巨大的创新。正是靠了这样的精神，中国共产党一路走来，始终把握时代、引领时代，担当进取，创新发展，开创、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如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肩负着新的历史使命，新使命要求有新担当、新作为。新时代党的建设要“以调动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着力点”。结合新时代特点大力弘扬“红船精神”，就是要跟上时代潮流，凝聚时代力量，保持锐意进取，增强创新能力，不断认识规律，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

弘扬“红船精神”，汲取不忘初心的前进定力

将近一个世纪以前，当一群平均年龄 28 岁的年轻人，在那艘红船上

描绘出远大理想和奋斗目标的时候，也为新生的即将远航的中国共产党奠定了初心和使命。在风风雨雨跨越世纪的行程中，确实有人上了“船”又跳了“船”，但从不影响这艘红船朝向目标前进的定力。我们党在长期艰苦卓绝的奋斗中，历经曲折而不畏艰险，屡受考验而不变初衷，由小到大，由弱变强，靠的就是坚定的理想信念和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靠的就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靠的就是真理的力量和人格的力量。

如今，在新时代长征路上前行的中国共产党人，依然会遭遇各种各样的“娄山关”“大渡河”和“腊子口”，依然面临着许多方面的重大困难、重大挑战、重大风险、重大考验。我们党要经得起风浪，要有不懈怠的精神，做到百折不挠地前进，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牢记为什么出发；要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在真懂真信的基础上，牢固树立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要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中，保持政治定力、道德定力、战略定力、前进定力，有一张蓝图绘到底干到底的决心。这些，正是“红船精神”给我们的启发，也是“红船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

弘扬“红船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基本方略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的那天起，就没有自己的私利。如果有私利，为自己谋前程，那些家境和社会地位都还不错的知识分子完全没有必要登上红船。在红船上通过的第一个党纲，拥有鲜明的人民立场，代表工人农民最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早在革命年代，毛泽东同志在思考和回答我们党为什么能够取得胜利的时候，曾经说过：“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一面”“拜人民为师，这就灵了”。这两句话，讲清了中国共产党成功的秘诀，就是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革命如此，建设如此，改革也是如此。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依水行舟，忠诚为民，成为贯穿中国革命和建设全过程的一条红线，也是‘红船精神’的本质所在”。

在新时代弘扬“红船精神”，就是要坚持好、贯彻好、落实好“以人民为中心”这个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

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只有依靠人民才能创造历史伟业。我们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我们的奋斗目标。

《光明日报》，2017年12月11日

大力弘扬“红船精神”

葛慧君

党的十九大闭幕仅一周，习近平总书记就带领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嘉兴南湖红船，回顾建党历史，宣示了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的坚定政治信念，为全党上了一堂生动深刻、直抵灵魂的党课。总书记在瞻仰红船时指出，小小红船承载千钧，播下了中国革命的火种，开启了中国共产党的跨世纪航程，我们要结合时代特点大力弘扬“红船精神”。

2005年6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首次提出“红船精神”，并将其概括为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10多年来，“红船精神”丰富的思想价值被不断发掘，南湖红船成为全国人民尤其是党员干部心向往之的革命圣地。今天，作为党的精神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红船精神”越发彰显出超越时空的恒久价值和旺盛生命力。

大力弘扬“红船精神”，就要深入把握“红船精神”的丰富内涵，牢记这一永恒思想丰碑。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伟大的革命实践产生伟大的革命精神，“红船精神”正是中国革命精神之源。以党的诞生地嘉兴南湖红船命名的“红船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创建党的伟大实践中所形成的一种革命精神，即伟大的建党精神。这一精神内涵深刻、思想深邃、历久弥新，是我们共产党人薪火相传的精神源泉、红色基因。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是“红船精神”的灵魂，是动力之源，体现的是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社会历史条件以及早期共产党人的追求，和他们改变近代中国社会命运的迫切愿望。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是“红船精神”的支柱，是胜利之本，体现的是中国共产党特有的政党品质，以及广大共

产党人的理想追求。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是“红船精神”的本质，是政德之基，体现的是共产党人的社会理想、价值取向和根本宗旨、道德要求。“红船精神”点燃了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感召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为党的事业不惧风吹雨打、穿越惊涛骇浪、甘洒热血为人民，成为指引我们不断前进的强大思想武器。

正是以“红船精神”为内在源头，中国共产党培育形成了一系列彰显马克思主义政党性质、反映民族精神、体现时代要求、凝聚各方力量的伟大革命精神。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对自身精神价值系统的构建。正因为秉承了党的这一优良传统，在数次瞻仰南湖红船、深刻把握党的精神创建史，特别是在倾听基层干部群众关于“红船精神”大讨论情况的基础上，习近平同志提出了“红船精神”，并对其科学内涵和时代价值作了精辟阐述。史学研究强调时间的沉淀。回溯我们党革命精神研究的历程，“红船精神”的提出，完善了中国革命精神链条的起始性环节，表明我们党的精神创建史与发展奋斗史在时间序列上是高度统一的、组织立党与思想立党是同步同行的。在我们党已经走过的96年伟大历程中，“红船精神”同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一道，共同筑成了我们党不忘历史、映照现实、折射未来的永恒精神和思想丰碑。

大力弘扬“红船精神”，就要深入梳理“红船精神”的精神力量，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中国故事。任何一个政党都需要精神的滋养。作为伟大的建党精神，“红船精神”贯穿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历程。革命年代，中国共产党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革命道路，创造了令人瞩目的革命奇迹。和平年代，中国共产党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造了发展的世界奇迹。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塑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崭新面貌，向世界展现了一幅更加强大、自信的中国未来图景。习近平总书记在南湖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96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这值得我们骄傲和自豪。中国共产党团结领导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生动故事启示我们：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历经磨难而信念愈坚、饱尝艰辛而斗志更强、千锤百炼而愈加刚毅，由小变大、由弱变强，带领人民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根本原因就是始终有强大的精

神力量支撑。

“一船红天下，万众跟党走”。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中国故事肇始于20世纪上半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运动中逐渐生成，在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目标的历史性实践中走向辉煌。今天，我们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让世界知道真实的中国、真实的中国共产党，最根本的是要生动诠释好中国共产党的精神魅力和精神风貌，特别是要让世界了解“红船精神”是我们党奋斗的初心和不变的底色，作为带领人民开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保证中国稳定发展不可替代的精神力量。共产党人将始终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沿着南湖红船开辟的革命航道奋勇前进。这些年来，浙江始终高度重视“红船精神”的学习宣传研究。在党的重大纪念、主题教育活动期间，到南湖红船缅怀革命先辈，看一次展览、听一次党课、学一次党章、观一次专题片、瞻仰一次红船、重温一次入党誓词，已成为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优良传统。全省建立了“红船精神”研究中心，形成了《红船精神：历史地位、当代意义及永恒价值》等一批国家级研究成果，创作了《红船驶进中国梦》等一批优秀视觉传播作品，《红船精神：启航的梦想》（中、英文版）在海外发行，对讲好中国故事和中国共产党故事产生了积极影响。

大力弘扬“红船精神”，就要深入挖掘“红船精神”的时代价值，在新时代彰显巨大引领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在南湖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事业的发展永无止境，共产党人的初心永远不能改变。唯有不忘初心，方可告慰历史、告慰先辈，方可赢得民心、赢得时代，方可善作善成、一往无前。秀水泱泱，红船依旧；时代变迁，精神永恒。“红船精神”是开放发展的理论架构和表述体系，其所包含的首创、奋斗、奉献精神，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和时代背景下必将被注入新的内涵、得到新的阐释。自觉的当代意识是理解历史价值的钥匙。今天，首创精神昭示我们：创新是事业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之源，只有坚持用时代发展要求审视自己、以改革精神创新发展理念，才能焕发蓬勃生机和无限活力。奋斗精神昭示我们：只有坚定理想信念，才能意志坚强、品节刚毅；只有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遭遇任何挫折都不动摇、不退缩、不屈服，才能始终走在前列。奉献精神昭示我们：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我

们党才能保持根本性质、恪守根本宗旨、牢记根本使命、巩固执政地位。

“红船劈波行，精神聚人心”。中国共产党近百年的奋斗史告诉我们，无论过去还是未来，“红船精神”都永不过时，仍将是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国人民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动力。党的十九大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的重大论断，回答了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担负什么样的历史使命、实现什么样的奋斗目标的重大问题，明确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我们党迈进新时代、开启新征程、续写新篇章的行动指南。浙江是中国革命红船的启航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萌发地。要以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央政治局常委集体到南湖瞻仰红船为动力，迅速掀起一场大学习，通过全面兴起学习教育、主题报道、理论阐释、集中宣讲、社会宣传等热潮，深入学习把握党的十九大精神，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丰富内涵、精神实质、核心要义，更好地用这一当代中国最鲜活的马克思主义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当好学懂弄通、深学笃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排头兵，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路子走下去，加快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高水平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奋力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浙江篇章。

《光明日报》，2017年11月2日

红船精神的新时代意义

胡 坚

习近平总书记在带领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常委赴上海瞻仰中共一大会址、赴浙江嘉兴瞻仰南湖红船时，重申了“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信念、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的红船精神，要求结合时代特点大力弘扬红船精神。红船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的集中体现，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之源，凝结着中国共产党的初心，是立党兴党、执政兴国的红色基因。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今天，更要大力弘扬和传承红船精神。为此，本刊联合教育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高等学校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和嘉兴学院，开辟“弘扬和传承红船精神”专栏，敬请读者关注。

一条红船从上世纪 50 年代起，就静静地停泊在南湖，其间不知有多少人路过。到了 2005 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从这条船上看到了共产党的建党精神，并总结为“红船精神”，这使得这条船第二次获得了生命，也是其第二次承载了历史的光荣与使命。

红船精神具有很强烈的象征意义。中国共产党的“一大”到一条船上去召开，是由很多历史的机缘造成的，但就是这种机缘让共产党的创建历史有了一种非同一般的神奇色彩和史诗般的华丽场景。习近平同志在《弘扬“红船精神” 走在时代前列》一文中，用了大量关于船的比喻来讲党的历史与精神。他说，一个大党诞生于一条小船，从此，中国共产党引领革命的航船，劈波斩浪，开天辟地，使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中国共产党沿着红船的航向，以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始终站在历史

和时代发展的潮头；中国共产党扬起红船的风帆，以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矢志推动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不断前进；中国共产党载着红船的意愿，以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努力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民可载舟，亦可覆舟”。在一条船上召开党的一大，让人不由自主地记起这句古训。习近平同志说，依水行舟，忠诚为民，成为贯穿中国革命和建设全过程的一条红线，也是“红船精神”的本质所在。红船，给了我们风雨同舟、逆水行舟、同舟共济等无穷的启迪与启示。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红船，给中国共产党擘画的历史画卷盖上了一颗不同凡响的印章。

红船是一种物质形态，它的珍贵，还是背后蕴含着的精神形态。中国近代以来，多少志士仁人为民族的复兴浴血奋斗。俄国十月革命送来的马克思主义，让一批先知先觉者集聚在一起，建立中国共产党。在风雨如磐的时代，支撑他们走到一起的，正是一种精神的力量。这种精神力量开启了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中国共产党97年的历史，面对多少艰难困苦、多少挑战考验、多少挫折失败，才走到今天，创造了一个崭新的新时代，靠的就是这种精神的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总结的红船精神，既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建党精神，同时，也高度集中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最核心的精神内涵。97年来，中国共产党在不懈的奋斗中凝聚了许许多多的精神，红船精神所蕴含的首创精神、奋斗精神和奉献精神是最根本也是最具代表性的精神。

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奋斗目标与战略部署，我们走过97年靠的是精神的支柱，我们走向新的时代更要靠这种精神的力量。党的十九大后，习近平总书记与中央政治局常委一起到嘉兴南湖，重温红船精神，彰显了在新时代弘扬红船精神的重大现实意义。

弘扬红船精神，最可贵的是坚持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中国共产党走过97年，靠的就是不断的、无数次的首创。建立共产党是首创，走上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是首创，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是首创，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首创。正是这种首创精神，使中国共产党保持与时俱进的品质，使党领导的事业永葆生机与活力。我们走

进新时代，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永远走在时代前列，最需要也最依靠的就是坚守这种首创精神。

弘扬红船精神，最难的是坚定理想信念、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不是组建一个俱乐部，不是花前月下的低吟，而是面对社会变革的腥风血雨、刀光剑影。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开放的道路，也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存在着各种艰难险阻，需要付出百倍的努力，甚至鲜血与生命。所以，坚定理想信念、百折不挠是极不容易的。中国共产党的一大代表，有脱党的、有叛变的，97年的奋斗历程中，多少人离开了这支艰难困苦的队伍，大浪淘沙，真正走到最后的真的很不容易。我们走进新时代，要面对伟大梦想、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最弥足珍贵的还是这种奋斗精神。

弘扬红船精神，最本质的是坚持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为什么建立中国共产党？就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无论我们走多远，都永远不能忘记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我们走得远了，最怕离人民群众也远了，我们党员人数多了，最怕身边的人民群众少了。红船提醒我们，船再大，与浩瀚的水比较都是渺小的，力量都在水中，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我们才能走得远，才能任凭风浪而不屈。我们走进新时代，最需要的就是保持这种初心与使命。但是，我们的一些党员干部，最难的也是坚守这种初心与使命，有的党员和干部就是做不到奉献，不是为党为民谋幸福，而是为己为私谋利益，最终背离党和人民，走上违法乱纪的道路。所以，坚持红船精神，最难的是坚持这种奉献精神。我们走进新时代，最需要告诫每一个党员干部的也是这种奉献精神。只有保持这种奉献精神，中国共产党才能保持自己的性质和宗旨，才能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进而才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光辉的未来。

《中国教育报》，2018年1月11日

井冈山精神



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每一名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把理想信念作为照亮前路的灯、把准航向的舵，转化为对奋斗目标的执着追求、对本职工作的不懈进取、对高尚情操的笃定坚持、对艰难险阻的勇于担当；都要一切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开拓进取，善于用改革的思路和办法解决前进中的各种问题；都要保持艰苦奋斗本色，不丢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不丢廉洁奉公的高尚操守，逢事想在前面、干在实处，关键时刻坚决顶起自己该顶的那片天；都要认真践行党的宗旨，努力提高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服务群众的能力和水平。

——2016年2月1日至3日，习近平在江西考察时指出

弘扬井冈山精神 加快老区振兴发展

中共江西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

习近平同志 2016 年视察江西时指出，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这一重要指示精神，大力弘扬井冈山精神，坚持苦干实干，加快革命老区振兴发展步伐，让老区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坚定发展信心

习近平同志指出：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是井冈山精神的灵魂。面对大革命失败和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受挫，面对“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迷茫和质疑，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依然高擎火炬前行，坚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毅然决然团结战斗在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开辟了中国革命的崭新道路。新形势下，我们要大力弘扬井冈山精神，坚定执着追理想，对加快老区振兴发展始终充满信心。

中央关怀坚定信心。习近平同志在 2015 年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江西代表团审议、2016 年视察江西时，提出“新的希望、三个着力、四个坚持”重要要求，为江西老区振兴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近些年，党中央、国务院密集推出长江经济带发展、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长江中游城市群建设、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赣江新区建设等重大战略，江西迎来了国家战略叠加效应形成的重大机遇期。面

对中央的关怀和支持，全省人民深受鼓舞，斗志倍增。

巨大成就坚定信心。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科学把握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发展大势，顺应实践要求和人民愿望，推出一系列重大战略举措，出台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推进一系列重大工作，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大大增强了全党全国人民的自豪感和自信心。江西各项事业发展也取得明显成效，经济实力显著增强，主要经济指标增速位居全国前列；民生事业快速发展，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不断增强；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建设深入推进，担当实干促崛起的信心牢固树立。

奋斗目标坚定信心。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中，习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科学的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党和国家事业继往开来、不断夺取新胜利的行动指南。在“7·26”重要讲话中，习近平同志深刻回答了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担负什么样的历史使命、实现什么样的奋斗目标等重大问题，坚定了全党全国人民同心共筑中国梦的信心。对标中央精神，江西省第十四次党代会提出的“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富裕美丽幸福江西”奋斗目标，寄托着老区人民的梦想，坚定了全省上下对发展前景的信心。

创新发展思路

习近平同志指出：实事求是、敢闯新路，是井冈山精神的核心。井冈山时期，面对“敌军围困万千重”和物资极度匮乏，毛泽东同志提出“以农村为中心”的革命思想，在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等方面进行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成功实践，为中国革命胜利作出了开拓性贡献。新形势下，我们要大力弘扬井冈山精神，继续保持实事求是闯新路的勇气和作风，坚决把习近平同志提出的“三个向”落到实处，不断创新老区振兴发展思路。

向改革开放要动力。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当前，江西老区发展成效显著、势头强劲，但也存在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解

决矛盾和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开放。要深入推进改革攻坚，紧紧围绕“放管服”和财税金融、国资国企、农业农村、生态文明等重点领域推出重大改革举措。着力打造内陆双向开放高地，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协调互动，主动对接长珠闽、港澳台和国际重点区域，引进一批带动力强的大项目、好项目；深度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支持更多江西企业走出去，不断增强老区振兴发展动力。

向创新创业要活力。创新是社会进步的灵魂，创业是经济发展的路径。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江西老区要实现持续健康发展，必须依靠创新引领、创业带动。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着力抓好创新驱动重大工程、重点创新产业化升级工程和科技协同创新计划，加快产学研结合和科技成果转化。引进一批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培育一批特色产业、特色小镇。创新人才培养、引进和保障机制，完善创新创业服务体系，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不断激发老区振兴发展活力。

向特色优势要竞争力。特色就是优势和竞争力。对江西来说，绿色生态是最大特色，也是最大财富、最大优势、最大品牌。要大力推进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加大生态保护和治理力度，坚持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实现江西绿色崛起。加快发展绿色新兴产业，推进传统制造业绿色改造，做大做强绿色农业、特色林业产业和绿色新兴服务业，争当绿色经济发展排头兵。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开展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综合试验，探索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新路，不断提高老区振兴发展竞争力。

攻克发展难关

习近平同志指出：艰苦奋斗是我们党的政治本色和优良传统，也是井冈山精神的基石。井冈山时期，根据地缺衣少食，困难“有时真是到了极度”。但是，我们党领导军民不畏强敌、不畏艰难，开展积极的生产自救和反封锁斗争，多次取得反“进剿”“会剿”胜利。新形势下，我们要大力弘扬井冈山精神，艰苦奋斗攻难关，坚决打好“三大攻坚战”，为老区振兴发展强弱项、补短板。

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平稳，社会和谐

稳定。但也应看到，经济社会领域一些矛盾风险交织叠加，不安全不稳定不和谐因素增多。要牢固树立风险防控意识，切实提高风险防控能力，坚决防范化解可能出现的经济风险、政治风险、社会风险以及其他各种风险。强化社会矛盾防范化解管控，建立健全社会舆情汇集和研判机制，统筹政法、综治、维稳、信访等部门力量，提高工作实效。加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积极运用新技术新办法，织密织牢公共安全网，不断增强群众安全感，让老区人民安居乐业。

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和庄严承诺。党的十八大以来，江西脱贫攻坚取得显著成效，井冈山市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但也要看到，江西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存在，脱贫攻坚任务依然繁重。要按照核心是精准、关键在落实、确保可持续的要求，通过更加集中的支持、更加有效的举措、更加有力的工作，确保到2020年如期实现脱贫攻坚目标，决不让老区人民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掉队。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生态环境保护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建设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是重大政治任务，必须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要围绕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环境问题，大力开展城乡环境综合整治。深入实施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开展国家山水林田湖生态保护修复试点，积极推进工业园区污染治理、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大气污染防治、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清河行动”提升、环保专项督查六大专项行动，促进全省生态环境质量稳步提升，让老区人民享受更多的生态福祉。

凝聚发展力量

习近平同志指出：紧紧团结群众、依靠群众，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和发展的重要法宝。井冈山时期，党和红军一开始就把“做群众工作”作为红军的三大任务之一，通过多种方式激发群众参加革命、支持革命的热情，把广大群众团结凝聚在党的周围。新形势下，我们要大力弘扬井冈山精神，依靠群众求胜利，凝聚起老区振兴发展的强大力量。

满足群众需要。这是我们党领导革命、执政兴国的根本目的，也是我

们党赢得群众支持和拥护的根本前提。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深入贯彻共享发展理念，持续加大民生投入，切实帮群众解难题、为群众增福祉、让群众享公平，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深入实施民生工程，积极促进就业创业，扎实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城镇棚户区改造，加快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持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不断为老区人民造福。

尊重群众意愿。这是把群众当作真正英雄，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必然要求。要尊重人民主体地位，群众的事情依靠群众办，充分激发老区人民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内生动力。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谋划发展思路向群众问计，改进发展措施向群众请教，把群众的聪明才智汇聚到老区建设中。坚持群众检验原则，把是否给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作为改革和各项工作的检验标准，使各项决策和各方面工作最大程度地符合人民群众意愿。

团结群众前进。党要依靠群众，又要教育和团结群众前进，这是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得出的宝贵经验。要加强理论武装，以习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凝聚共识、促进发展。加强政策宣传，让中央支持老区发展的好政策为群众所掌握，转化为群众的自觉行动。加强形势教育，引导群众坚定对国家发展大局和老区建设前景的信心，始终团结在党的周围，永远听党话、跟党走。

《人民日报》，2017年10月9日

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

张晓明

年初，习主席在视察江西时强调：“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井冈山斗争的伟大实践，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和抉择、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成长具有关键意义”，要求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聚焦强军目标、推进改革发展是一场新的深刻革命，需要强有力的精神支撑。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充分挖掘和弘扬井冈山精神，为部队建设发展注入强大动力。

井冈山精神是强军兴军的宝贵精神财富

习主席指出：“井冈山是革命的山、战斗的山，也是英雄的山、光荣的山。”井冈山精神，是我党我军精神历程中的关键节点，具有超越时空的恒久价值和旺盛生命，能够跨越历史的鸿沟，继续支撑我们勠力行进在强军兴军的伟大征程上。

井冈山精神昭示我们要坚持党的绝对领导。井冈山是我党我军灵魂的高地、精神的故乡。井冈山斗争中，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面对白色恐怖，在敌我力量极为悬殊的恶劣形势下，为党牺牲、无私奉献，集中展现了他们对党绝对忠诚、与党同心同德的革命本色。新时期，改革大潮风起云涌，我们弘扬井冈山精神，最紧要的是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维护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权威，一切行动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指挥。

井冈山精神鼓舞我们要坚定崇高的理想信念。我们党和军队在江西的

革命斗争中，曾几度陷入被打散、被围剿，甚至被扼杀的艰难困境，如果没有坚定崇高的理想信念，没有对革命事业的执着追求，没有对民族、对国家的使命担当，就不会取得革命事业的成功。弘扬伟大的井冈山精神，必将鼓舞我们更加坚定强国梦强军梦的崇高理想，以虽百折而不挠、虽崎岖而愈坚的斗志，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中披荆斩棘、开拓进取、奋力前行。

井冈山精神启迪我们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井冈山是我党建立的第一个革命根据地，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道路，其建立本身就集中体现了我们党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并取得巨大成功，使革命的星星之火终成燎原之势。当前，在强军兴军的伟大征程中，我们必须一如既往地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以求实的态度、务实的状态、扎实的作风，继承和弘扬井冈山精神，矢志不移推动改革、一丝不苟聚焦工作，确保改革落地生根、强军征程稳扎稳打。

井冈山精神是创新发展的精神动力

习主席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不忘峥嵘岁月，铭记先烈功勋，就要从中不断吸收赓续发展的营养、传承改革前行的力量。

坚定信念、艰苦奋斗是创新发展之本。习主席指出，到井冈山接受传统教育很有必要，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从哪里来的，我们共产党是干什么的、从哪里来的，我们人民军队是干什么的、从哪里来的。不忘本来，方有未来。今天，面对深化改革的硬骨头，面对发展中的突出短板，每一名官兵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更要将理想信念转化为对强军目标的执着追求、对本职工作的不懈进取、对高尚情操的笃定坚持、对艰难险阻的勇于担当，才能在思想上正本清源、固根守魂，在实践中迎难而上、奋发有为。

实事求是、敢闯新路是创新发展之法。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同志立足中国革命实际，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紧密结合，提出了“以农村为中心”的革命道路思想，创造了一系列成功实践。习主席指出，“实事求是、敢闯新路，是井冈山精神的核心”，强调“革命如此，建设和改革也如此，都必须从实际出发，敢于开辟前人没有走过的

路”。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到今天，发展环境和条件变了，发展理念就自然要随之而变。只有把思想认识统一到五大发展理念上来，自觉把新发展理念作为指挥棒用好，才能以变求新、以变求进，奋力闯出政治建军、改革强军、依法治军的发展新路。

依靠群众、勇于胜利是创新发展之源。井冈山时期，我党我军紧紧团结群众、依靠群众，正是有了群众这“真正的铜墙铁壁”，党和红军才多次创造了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奇迹。习主席强调：“群众路线在革命战争年代是胜利之本，在和平年代同样是胜利之本。”党只有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党的事业才能坚如磐石、保持旺盛活力。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更需要我们认真践行党的宗旨，坚持群众路线，坚持官兵至上，才能从广大官兵中集聚发展智慧，汇聚起谋战备战的强大力量。

实现强军梦想呼唤井冈山精神的时代化

习主席指出，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大力弘扬井冈山精神，并让她以契合时代要求的崭新面貌，引导官兵在改革中坚定信念、凝心聚力、开拓进取，显得尤为紧要。

在解放思想中强化井冈山精神的思想引领。唯有解放思想、才能释放活力，唯有站上精神高地、才能冲出发展洼地。省军区系统转隶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领导管理，是习主席、中央军委对国防动员建设的战略性设计、根本性变革，必须来一场思想解放的头脑风暴，不断强化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确保省军区建设和发展的正确方向。融入新体制、转入新战位、实现新发展，我们更要大力弘扬井冈山精神所蕴含的坚定信念、敢闯新路、勇于胜利等精神，并以形象、生动、鲜活的方式展示出来，让广大官兵在接受革命精神洗礼中突破思想禁锢、实现思想解放，以全新思维、全新观念和全新思路投身到改革大潮中去。

在增强自信中强化井冈山精神的行为激励。江西红色资源丰富，军地关系融洽，省内经济增速加快，是创新发展最有利的条件；服务全局、保障主战的使命任务，围绕“水、山、路、矿、震”的非战争军事行动，是创新发展最大的牵引；着眼全国力争同步发展、破解难题实现跨越发展、

紧贴省情深化融合发展，是创新发展最紧迫的课题。大力弘扬井冈山精神，我们要倍加珍惜、努力传承坚定信念、不怕困难，自我加压、沉着应对的优良品质，激发奋斗的干劲，坚定奋斗的决心，不仅要在发挥发展优势上有自信，也要在破解破除困境上有自信。只要我们以实事求是、敢闯新路的精神坚定改革自信、打赢自信、强军自信，就一定能够交出强军兴军的合格答卷。

在发动官兵中强化井冈山精神的力量凝聚。井冈山时期，党和红军坚持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通过多种方式激发群众参加革命、支持革命的热情和行动，把分散的民众转化为革命斗争的重要力量，形成了鱼水相依、血肉相连的党群关系、军民关系。广大官兵是实现强军梦的主体，只有全体官兵共同给力，才能凝聚起强军兴军的磅礴力量，才能推动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向前迈进。大力弘扬井冈山精神，做到人人肩上有责任、人人心中有激情、人人胸中有使命，就一定能凝聚起广大官兵自觉强军兴军的正能量，一定能把革命精神的感召力、凝聚力转化为官兵的行动力、实践力。

在打造品牌中实现井冈山精神的时代价值。大力弘扬井冈山精神，努力打造一批可学习、可践行的实践品牌，是展现井冈山精神的时代要求。在运用红色资源上求突破，加大井冈山国防教育基地建设力度，持续做好先进典型培塑，为井冈山精神的宣传普及、学习实践提供有效的平台和载体支撑；在军民深度融合上求发展，积极传承井冈山精神中军民团结、军民结合、军民共进的优良传统，着力抓好思想融合、体制融合、产业融合和信息融合，打造管用可学能推广的系列品牌；在倾力扶贫上求作为，坚持把扶贫帮困作为弘扬井冈山精神、促进军政军民团结的重要体现，认真做好助学兴教、医疗扶持、抢险救灾等工作，特别是抓好井冈山扶贫“三联”活动持续落实，努力在江西实现“五年决战同步全面小康”奋斗目标中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解放军报》，2016年3月29日

苏区精神



在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中，在建立红色政权、探索革命道路的实践中，无数革命先辈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以坚定信念、求真务实、一心为民、清正廉洁、艰苦奋斗、争创一流、无私奉献等为主要内涵的苏区精神。这一精神既蕴涵了中国共产党人革命精神的共性，又显示了苏区时期的特色和个性，是中国共产党人政治本色和精神特质的集中体现，是中华民族精神新的升华，也是我们今天正在建设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来源。……无论现在和将来，我们都要坚持继承先烈遗志，大力弘扬苏区精神，学习宣传在革命、建设、改革不同历史时期作出卓越贡献的共产党员的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使广大党员和干部从中获得精神鼓舞，升华思想境界，陶冶道德情操，完善思想品格，培养浩然正气，牢记“两个务必”，从而更好地经受住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防止和克服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习近平，《在纪念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8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2011年11月4日

苏区精神的内涵和表现

李红喜

苏区精神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艰辛探索中国革命正确道路的伟大实践中培育形成的伟大革命精神。

2011年11月4日，习近平同志在纪念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80周年座谈会上指出，在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过程中，在建立红色政权、探索革命道路的实践中，无数革命先辈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以坚定信念、求真务实、一心为民、清正廉洁、艰苦奋斗、争创一流、无私奉献等为主要内涵的苏区精神。

其中，坚定信念是苏区精神的灵魂；求真务实是苏区精神的精髓；一心为民是苏区精神的本质；清正廉洁是苏区精神的品格；艰苦奋斗是苏区精神的要义；争创一流是苏区精神的特质；无私奉献是苏区精神的内核。

矢志不渝的坚定信念

理想信念是产生巨大精神力量的根本源泉，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对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也是经受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在风雨如晦的革命战争年代，白色恐怖笼罩全国，革命斗争充满生死考验。远大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是苏区军民坚持斗争胜利的根本动力。苏区军民始终坚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论断和中国革命必定胜利的信念，他们为了追寻崇高的理想、光明的愿景，前仆后继、舍生忘死，奋勇向前。

1930年1月，针对党内和红军内部存在的对时局估计悲观情绪，特别是林彪等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悲观言论，毛泽东给林彪写了一封近8000字的回信。毛泽东在信中批评了当时林彪以及党内一些同志对时局估量的悲观思想，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著名论断。这不仅提出了红军初创时期建立革命根据地、武装夺取政权的战略构想，而且揭示了中国革命胜利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客观规律。正如毛泽东所预见的，1年后，具有“燎原”之势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中国南部的小城瑞金成立。

1935年，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方志敏被俘后，蒋介石多次派人妄图以高官厚禄来劝降他，但方志敏不为所动。面对那些说客，方志敏铿锵有力地回答道：“我们军事上是暂时失败，政治上是不会失败的。我们一定会胜利，共产主义一定要在中国实现的！”

同年3月，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伯坚负伤不幸被俘。为瓦解其意志，敌人押解刘伯坚戴着铁镣从大余县城最繁华的大街经过。在狱中，刘伯坚不惧酷刑，抗拒诱降，志坚如钢，抱定为革命流血牺牲的坚定信念，以笔作武器，以监狱当战场，奋笔写下了《带镣行》《移狱》《狱中月夜》等革命诗篇，表达了为革命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和对共产主义崇高理想的赤胆忠心。敌人不禁感言：“真不愧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共产党员！”

毛泽东关于“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论断，不仅坚定了苏区时期全党同志和全军将士的必胜信念，而且对引领中国革命胜利和建立新中国，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求真务实的艰苦探索

求真务实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鲜明特征，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本质要求。深入调查研究，坚持求真务实，是中国共产党大力倡导和实行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

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党内一部分人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将共产国际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十分盛行。1927年后的三次“左”倾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了严重危害，特别是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

中全会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对苏区的革命战争和各项建设事业带来了严重的干扰和危害。

毛泽东对此深恶痛绝，坚决反对，并十分注重深入实际，调查了解中国社会实际情况，从中国实际出发指导中国革命运动。他先后作了大量的农村调查。1930年5月，毛泽东在进行“寻乌调查”后，写下了著名的《调查工作》即后来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他在文章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末，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并鲜明地提出了“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

后来，毛泽东又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的名义，向红军各级政治部、地方各级政府发出《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进一步提出：“一，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二，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

毛泽东要求教育党员干部重视调查研究，要学会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方法。苏区时期，党的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方针、政策，红军第一至四次反“围剿”的正确战略方针和战术，根据地党和政权建设、经济文化建设等正确的方针政策等等，正是通过调查研究，不断总结苏区干部群众创造的新鲜经验，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和创造性地提出来的。

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

一心为民的执政理念

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谋利益，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和价值追求。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是中国共产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苏维埃政权作为新生的国家政权，不仅是工农劳苦群众自己管理自己生活的机关，而且代表了工农劳苦大众的

利益，践行一心为民的执政理念。

为了使贫苦农民获得土地，在苏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为了保卫巩固苏区，改善群众生活，党和苏维埃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经济政策，努力发展苏区经济，千方百计地帮助群众搞好生产；为解决苏区内劳动力缺乏问题，组织领导农民建立劳动互助社、耕田队、换工队、耕牛站、耕牛合作社等互助合作组织，帮助群众克服困难，发展生产；为解决物资匮乏，保护群众利益，减少私商的中间盘剥，活跃苏区市场，在苏区创办了以保障供给、搞活流通、减少剥削、增加收入为目的的各类消费合作社；为了使苏区群众的文化教育水平和健康水平得到提高，党和苏维埃政府在苏区大力普及文化教育，对苏区儿童普遍实行免费义务教育，对成人实行扫盲教育。这些都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都是为民谋利的实事、大事。

为了广泛动员和发动群众，毛泽东十分关心群众的生活问题，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而且把它和革命战争、为群众谋利益联系起来看。在中央苏区初创时期，毛泽东就提出，每个共产党员要像和尚叨念“阿弥陀佛”一样时刻叨念“争取群众”。在中央苏区战事频繁和政务繁忙中，毛泽东把战士、群众的冷暖温饱，都时时放在心上，给老乡送医送药、车水抗旱、打井找水、割禾挑水、挖茅坑、修路桥等。瑞金沙洲坝的“红井”，就是当年毛泽东为解决当地村民饮水困难带领临时中央政府工作人员和红军战士开挖的。朱德帮助农民插秧收稻，周恩来、张闻天等帮助红军家属挑水砍柴等爱民故事，至今还被广为传颂。

1934年1月，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郑重提出要“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他指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我们是这样做了么，广大群众就必定拥护我们，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把革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在会上，表扬了兴国县的苏维埃工作人员，不但是“革命战争的良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而且“又是群众生活的良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不仅从理论上认识到“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

益”的重要性，而且从行动上非常关心群众生产和生活，受到全国苏区广大人民群众的真心想戴。苏区群众发自内心地由衷地感叹说：“共产党真正好，什么事情都替我们想到了。”

清正廉洁的政治品格

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是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清正廉洁，是中国共产党苏区执政时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兴国山歌“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着草鞋闹革命，夜走山路打灯笼。”这不仅是对当年苏区干部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真心实意地为人民群众谋利益形象生动的真实写照，更是表达了苏区人民对苏区干部好作风发自肺腑的高度评价和赞颂之情。

苏区时期，除少量技术人员外，从中央政府主席到乡苏维埃工作人员的所有干部一律没有薪饷。1933年7月18日，毛泽东来到宁都县铲田区调研，在区政府住宿一晚，毛泽东坚持要交上食宿费，于是铲田区财政部的记账本上有了如下记载：“七月十八日，主席毛泽东一行四人住，照章交来食宿费大洋一元八角。”这册记账本至今保存在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博物馆，成为革命领袖廉洁自律作表率生动见证。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土地革命斗争建立起来了苏维埃政权，为巩固新生的红色政权，保证中央苏区建设和革命战争的进行，党和苏维埃中央政府十分重视并严格要求苏区党政干部养成清廉从政的工作作风，且实行了一系列坚决有力的、行之有效的反腐倡廉的措施。为保持党的纯洁性，建立了惩防并举，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党风廉政建设机制。

在惩处腐败分子方面，中央苏区制定了《政府工作人员惩办条例》和《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在制度建设方面，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暂行财政条例》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审计条例》等法规。在监督方面，一是在中央设立了中央党务委员会，各级苏维埃政府设立工农检察委员会，同时组织突击队、轻骑队，监督苏维埃政府法令、批示的执行；二是重视新闻舆论监督，在《红色中华》《斗争》等报纸杂志开辟有“红板”“黑板”“铁锤”等专栏；三是发动群众监督，主要通过建

立控告局、设置控告箱、聘请工农检察通讯员、开展群众评议等方法，发动群众广泛参与检举运动。

苏区时期，党和苏维埃政府非常注重干部作风和反腐倡廉建设，坚持用制度和法纪反腐惩贪，创建了“空前的真正的廉洁政府”，赢得高度赞誉。苏区干部纪律严明，不谋私利，成为廉洁自律的典范。

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

艰苦奋斗是党的优良传统，是我们战胜种种困难不断前进的力量源泉。苏区时期，由于国民党残酷的军事“围剿”和严密的经济封锁，中央苏区的物资严重匮乏，广大军民的生活异常艰苦困难。从中央政府主席到乡苏维埃工作人员每人每天只发不到1角钱菜金和大半斤粮食。毛泽东严以律己，带头节衣缩食。毛泽东有夜晚办公习惯，有时夜深了，公事没有办完，肚子很饿，他就和谢觉哉一起煮南瓜吃。

1934年春，随着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日益激烈，根据地范围日趋缩小，苏区的财政经济状况严重恶化。面对严峻形势，为全力支援反“围剿”战争，1934年3月13日，苏维埃中央政府通过《红色中华》报发出“为四个月节省八十万元而斗争”的号召。中央党政机关及工作人员率先响应。中共中央机关博古、陈云、李维汉、邓颖超、潘汉年、陆定一、毛泽覃等23位同志响应节省运动，在给《红色中华》报的信提出：（一）每天节省二两米，使前方红军吃饱饭，好打胜仗；（二）今年公家不发我们热天衣服，把这些衣服给新战士穿。响应红色中华的节省号召！在瑞金工作的中央机关后方工作人员，成立了“节约总会”。大家每天只吃两餐饭，节约一餐口粮支援前线。当时有句很响亮的口号“节约每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成为苏区军民的自觉行动。

在中央机关的带动下，中央苏区各省、县、区、乡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红军部队广大指战员和各工厂、企业、商店的工人、店员、职员，都积极行动起来，响应《红色中华》号召，投入节省运动。1934年4月19日，中央人民委员会为进一步推动节省运动更广泛深入开展，专门向各级苏维埃政府主席团及后方各军事机关负责同志发出指示信，进一步在全苏区干

部群众中开展每人节省三升米支援红军运动。

在节省运动过程中，不断推进反对贪污浪费和消极怠工的斗争，赢得了人民群众的高度认同，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中国共产党以自己艰苦奋斗的经历，以几十万英勇党员和几万英勇干部的流血精神，在全民族几万万中间起了伟大的教育作用。”

争创一流的工作境界

争创一流、创造一等工作，既是共产党人在苏区时期精神世界的反映，也是广大群众对待工作的一种基本境界。在中央苏区的各项建设中，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言传身教带领下，广大苏区干部都自觉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发扬锐意进取、勇于开拓、争创第一的革命精神，涌现出了许多各方面工作都取得优异成绩的模范县、乡，成为蜚声苏区的楷模。赣东北省委、兴国县委及长冈乡、才溪乡苏维埃政府，都创造了“第一等的工作”，受到毛泽东和苏维埃中央政府的表彰，他们的先进事迹，充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创造精神。其中兴国模范县就是其中最为突出的代表。

1931年12月至1933年1月，中共江西省委和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机关设在兴国县城，兴国县的各项工工作得到省委、省苏维埃政府的直接领导。兴国县的广大共产党员和苏维埃干部，带领全县人民艰苦奋斗，努力创造“第一等的工作”，使全县各方面的工作都走在全苏区前列，多次受到苏维埃中央政府、江西省委、省苏维埃政府的表扬和毛泽东的称赞，成为全苏区学习的榜样，主要体现在“十模范”：扩大红军的模范、支前参战的模范、慰劳红军的模范、优待红属的模范、推销公债的模范、粮食动员的模范、合作社运动的模范、节省运动的模范、文化教育的模范、干部作风的模范。

1932年10月，中共江西省委开展了一场为期两个月的冲锋工作竞赛，兴国县苏区各级党政干部在工作中深入实际，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完成各项任务，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创造了党员干部“十带头”（即政治学习带头、军事训练带头、执行勤务带头、参军参战带头、遵纪守法带头、购买公债带头、节省粮食带头、优待红属带头、发展生产带头、移风易俗带头）的好风尚，在竞赛中获得总分第一的成绩。

1934年1月，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兴国的同志们创造了第一等的工作，值得我们称赞他们为模范工作者。”并题写“模范兴国”四个字，赠送给兴国的同志们，予以褒奖。

兴国县长冈乡是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受到毛泽东表扬的两个模范乡之一。毛泽东号召全苏区都要向这些创造第一等工作的先进典型学习，提出“要造成几千个长冈乡，几十个兴国县”，作为我们“巩固的阵地”。

苏区军民发扬争创一流的精神，以蓬勃的革命热情、昂扬的革命斗志，踊跃支前扩红、发展生产，创造了“第一等的工作”，涌现出模范兴国县、模范长冈乡等苏区典型，成为广大苏区军民学习的标杆。

无私奉献的牺牲精神

为人民而奋斗的无私奉献精神，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品格，是中国共产党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由于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苏区群众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拥护苏维埃，无私地将一切奉献给革命、奉献给红军、奉献给苏维埃。

中央苏区当时脱产的红军部队、苏维埃工作人员和小学教师，共约20万人，平均每20位农民就要供养1名脱产人员，还要保障数额巨大的军需开支，苏区人民负担之重可想而知。但是，苏区人民为了革命，为了苏维埃事业，毫不迟疑地承担了这一切。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能够在苏区时期发展、壮大，与苏区人民无私奉献和积极支持是分不开的。

在当时“一切为了革命战争”的口号下，苏区党员干部和广大群众积极起来为保卫红色政权进行顽强的斗争，作出了无私的奉献牺牲，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

何叔衡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1931年11月进入中央苏区，先后任临时中央政府工农检察部部长、内务人民委员部代部长、临时法庭主席等职。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奉命留在苏区坚持游击战争。1935年2月24日，从江西转移福建途中，被敌人发现，穷追不舍。何叔衡因年老体弱，为不愿拖累同志，临难不苟，纵身跳下山崖壮烈牺牲，用

血肉之躯实践了他生前“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誓言。

当年，所有苏区干部没有薪饷，“自带干粮去办公”，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苏区群众义无反顾、倾其所有支援革命、支前参战，作出了重大贡献和巨大牺牲。正是这种无私奉献精神，使党和红军能够在极端艰难时期发展、壮大，最终夺取中国革命胜利。

苏区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伟大革命精神链条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井冈山精神的发展和深化，是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的支柱和源头。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苏区精神“既蕴涵了中国共产党人革命精神的共性，又显示了苏区时期的特色和个性，是中国共产党人政治本色和精神特质的集中体现，是中华民族精神新的升华，也是今天我们正在建设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来源”。今天，我们要坚持继承先烈遗志，大力弘扬苏区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人民政协报》，2017年9月7日

论苏区精神

——解读习近平关于苏区精神的重要论述

余伯流

内容提要：2015年3月6日，习近平在全国两会期间参加江西代表团审议讲话时，强调指出：“井冈山精神和苏区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永远铭记、世代传承，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在思想上正本清源、固根守魂，始终保持共产党人政治本色。”2011年11月4日，习近平在“纪念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80周年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要“大力弘扬苏区精神”，第一次明确使用了“苏区精神”的概念，概括了苏区精神的内涵、时代价值及其现实意义。时过三年，习近平关于苏区精神的重要论述，今天仍然值得我们很好地重温、学习和贯彻执行。文章旨在阐释、解读习近平这一重要讲话的精神实质，以期通过“大力弘扬苏区精神”，更好地保持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推进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2015年3月6日，习近平在全国两会期间参加江西代表团审议讲话时，强调指出：“井冈山精神和苏区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永远铭记、世代传承，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在思想上正本清源、固根守魂，始终保持共产党人政治本色。”三年前，即2011年11月4日，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纪念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80周年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要“大力弘扬苏区精神”，第一次明确使用了“苏区精神”的概念，概括了苏区精神的内涵、时代价值及其现实意义。本文旨在阐释、解读习近平这一重要讲话的精神实质，以期通过

“大力弘扬苏区精神”，更好地保持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推进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一、习近平谈苏区精神

三年前，即2011年11月4日，习近平在“纪念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80周年座谈会”上，明确提出：

“我们要始终大力弘扬苏区精神，推动创先争优，不断开创各项工作新局面。在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中，在建立红色政权、探索革命道路的实践中，无数革命先辈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以坚定信念、求真务实、一心为民、清正廉洁、艰苦奋斗、争创一流、无私奉献等为主要内涵的苏区精神。这一精神既蕴涵了中国共产党人革命精神的共性，又显示了苏区时期的特色和个性，是中国共产党人政治本色和精神特质的集中体现，是中华民族精神新的升华，也是我们今天正在建设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来源。”

“无论现在和将来，我们都要坚持继承先烈遗志，大力弘扬苏区精神，学习宣传在革命、建设、改革不同历史时期作出卓越贡献的共产党员的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使广大党员和干部从中获得精神鼓舞，升华思想境界，陶冶道德情操，完善思想品格，培养浩然正气，牢记‘两个务必’，从而更好地经受住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防止和克服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习近平的这一讲话，非常重要，也极为精到。党中央领导人首次在重大纪念活动中，明确使用了“苏区精神”的概念，阐述了“苏区精神”的内涵、重要价值及其现实意义，并呼吁“大力弘扬苏区精神”。这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关于“苏区精神”评价的权威论断和科学定位，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苏区精神”的关注和高度重视。从此，“苏区精神”从学术层面上升为政治层面，从学界话语迈入官方定位。

解读习近平关于“苏区精神”的讲话精神，必须从总体上、全局上、宏观上明确一种认识：苏区精神是一个全国的概念，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我党在十年浴血奋战的战争硝烟中孕育而成的宝贵精神财富，是中国共产党一整套优良革命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史上不可或缺的一座伟岸的丰碑。

第一，苏区精神源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群雄并起、烽火连天的全国苏区革命斗争，是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相伴生的独立精神形态。苏区精神最早是从研究中央苏区史时提出来的，但苏区精神是一个大概念，不仅仅指中央苏区，还泛指和涵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先后领导创建了井冈山、中央苏区、湘赣、湘鄂赣、闽浙赣、左右江、湘鄂西、鄂豫皖、海陆丰、琼崖、陕甘、湘鄂川黔、川陕等13块革命根据地。这十几块革命根据地，都是中国革命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重要起点，在当时如火如荼的峥嵘岁月中，都衍生和造就了不同表现形态的伟大的苏区精神。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治国安邦、局部执政的伟大预演中，苏区精神在中央苏区和全国苏维埃区域得到了更好的彰显和发展。研究苏区精神要从这样一个大背景、大视野、大概念出发，而不是仅仅局限于中央苏区。

第二，苏区精神是中华民族优秀精神血脉在革命战争年代的积淀，是具有原创意义的当代民族精神。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威武不屈，舍生取义”“爱国至上，精忠报国”“一身正气，救民于火”和“敢为天下先”的中华民族精神的血脉，一直生生不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战争年代，这种民族精神和革命精神相结合，就凝聚成特定的“苏区精神”。这种特定的苏区精神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一种首创性、原创性精神形态，是当代民族精神的生动体现，苏区精神中的思想内核处处闪耀着民族精神的璀璨光芒，都有中华民族精神血脉的传统基因。

第三，苏区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伟大革命精神链条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史上的一座不朽丰碑。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创造和培育了建党精神、北伐精神、铁军精神、八一精神、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抗战精神、西柏坡等精神，这是一个伟大的精神宝库，一个辉煌的精神链条。苏区精神正是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后，继井冈山精神之后培育和造就的又一伟大革命精神。革命精神来源于伟大的革命实践。苏区精神的主要发祥地是中央苏区。从1929年1月朱毛红军下山向赣南闽西进军，到1934年10月红一方面军长征，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央苏区战斗了五年零九个月。这一段血与火的战斗岁月是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时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初成果——毛泽东思想开始架构和发育成形的时期，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聚集崛起和崭露头角的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开始治国安邦、局部执政的时期，是党培养和造就一大批治国精英的时期，也是中国共产党进行先进性建设和形成优良传统作风的时期。苏区革命斗争是苏区精神的本体和源泉。离开了这个本体和源泉，苏区精神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苏区精神在中央苏区衍生的同时，在全国其他苏区也同样得到了发展。

第四，苏区精神具有革命性、民族性、时代性相统一的品格，是一种能够与时俱进的人文精神。苏区精神从本质上看，是中国共产党人和无数革命先烈用生命和鲜血凝聚而成的一种无产阶级革命精神，是根植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精神的沃土，又融合中国革命战争的时代特征、共产党人的革命风格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宝贵精神财富，这一宝贵财富的精神血脉也是新世纪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传承和弘扬的一种能够与时俱进的人文精神。它既具有强烈的革命性和深厚的民族性，又具有鲜明的时代性。这种革命性、民族性、时代性的聚焦点，就是一种求新求变的创新精神。革命要创新，民族要创新，时代要创新。创新是苏区精神的题中之义，也是时代精神的本质要求。

第五，苏区精神是八一精神、井冈山精神的延伸和发展，也是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的先河和源泉。苏区精神具有承上启下的功能，苏区精神与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一脉相承、同根同源，但又是在不同的时间地点产生的精神形态，其内涵和表现形态是不一样的。井冈山精神不能代替苏区精神，苏区精神是继井冈山精神之后党培育和造就的、独立的精神形态。那种认为有了井冈山精神就可以不提苏区精神，或者突出宣传井冈山精神就淡化、忽略、漠视苏区精神存在价值的认识和做法，都是不正确的。

二、苏区精神的内涵阐释

习近平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对苏区精神的内涵，作了7句话28个字的概括，这就是：“坚定信念、求真务实、一心为民、清正廉洁、艰苦奋斗、争创一流、无私奉献。”这个概括是非常全面、精当的。

（一）坚定信念。突出体现在坚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毛泽东于1930年1月在中央苏区就针对中央“二月来信”和林彪等人的悲观思潮，给林彪写了一封近八千字的党内通讯，提出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著名论断。这一论断不仅提出了红军初创时期建立革命根据地武装夺取政权的战略构想，而且揭示了中国革命胜利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客观规律。毛泽东指出：“中国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星火燎原’的话，正是时局发展的适当的描写。”“这个‘星星之火’，距‘燎原’的期，毫无疑义地是不远了。”一年零四个月后，具有“燎原”意味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就在中国南方一个小城瑞金呱呱坠地了。毛泽东的预见和判断成为活生生的“星火燎原”的现实。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论断不仅坚定了中央苏区时期全党同志和全军将士的信念，而且对引领中国革命走向全国胜利建立新中国，都具有重大和深远的意义。苏区领导人和广大军民为了坚守主义和信念，矢志不移，至死不渝。方志敏在就义前，大义凛然地说：“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瞿秋白含笑饮弹，刘伯坚戴镣长行，李美群“马前托孤”，江善忠“死到阴间不反水”等等。坚定信念是苏区精神的灵魂所在。

（二）求真务实。突出表现在“反对本本主义”

苏区精神中最本质的东西首先是思想路线问题。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的理论概念和基本思想，最早是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提出的，早在1929年6月14日红四军“七大”前夕，毛泽东针对党和红军初创时期出现的重大原则问题争论和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在给林彪的信中就明确提出：“近日的问题（军委问题，但原则问题）只是历史的结穴，历史上一种错误的思想路线上的最后挣扎。”这是毛泽东在我们党的历史上首次提出“思想路线”的概念。1930年5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更加鲜明地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

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并提出了“共产党人的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在苏区时期提出的“思想路线”的概念及其基本思想，为我们党在延安时期形成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为了践行这一思想路线，毛泽东在中央苏区进行了大量的实际调查，发表了《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寻乌调查》等，开创了我党求真务实、注重调查研究的新风。张闻天、陈云、刘少奇从苏区实际出发，废除了从苏联照搬而来的《劳动法》中过高的福利待遇的“左”的条文，颁发了符合苏区实际的新的《劳动法》。邓小平在中央苏区担任会寻安中心县委书记期间，求真务实，坚守真理，忍辱负重，顾全大局，不向“左”倾错误低头，勤勤恳恳地做好实际工作。求真务实是苏区精神的本质要求。

（三）一心为民。突出体现在“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

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谋利益，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和执着追求。这一理念在中央苏区时期就已很明确。在全苏二大总结中央苏区经验时，毛泽东郑重提出：要深刻地注意群众的生活问题，从土地问题、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妇女群众要学习犁耙，找什么人去教她们呢？小孩子要求读书，小学办起了没有呢？对面的木桥太小会跌倒行人，要不要修理一下呢？许多人生疮害病，想个什么办法呢？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毛泽东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中，强调指出：“要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我们是这样做了么，广大群众就必定拥护我们，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把革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在这里，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的毛泽东，实际上已经阐述了执政为民的思想，这是我们党的文献中关于这个问题最早的确切表述。广大苏区党政干部和红军指战员，牢记党的这一执政宗旨，努力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谋利益，受到全国苏区广大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戴。苏区人民发自内心称赞说：“共产党真正好，什么事情都替我们想到了。”毛泽东在兴国的一次讲话中强调：共产党员应

该“要像和尚叨念‘阿弥陀佛’一样，随时叨念‘争取群众’。”他自己也身体力行，为房东“开天窗”照明、为沙洲坝人民掘井引水。周恩来在苏区曾说：“共产党员就应当像牛一样努力奋斗，为人民服务而死。”朱德在苏区为贫苦百姓送盐，张闻天为老房东拉犁耕田等等，可谓“一心为民”。一心为民是苏区精神的根本宗旨。

（四）清正廉洁。突出体现在践行“苏区干部好作风”

在全国广大苏区，党和苏维埃干部密切联系群众，艰苦奋斗，廉洁奉公，勤于政务，一身正气，铸就了血浓于水、鱼水相依的党群关系。“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着草鞋闹革命，夜走山路打灯笼。”这首脍炙人口的山歌，就是当年苏区干部优良作风的真实写照。为了使苏区干部廉政清明、克己奉公，苏维埃中央政府规定，“每个革命的民众都有揭发苏维埃工作人员的错误缺点之权”，“如果发现了贪污腐化消极怠工以及官僚主义的分子”，“苏维埃则立即惩办他们决不姑息”。为此，苏维埃中央政府还制定了许多法规法纪，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监督机制，凡贪污腐败分子一经发现，立即予以严厉惩处。1932年5月9日，苏维埃中央政府临时最高法院（主审梁柏台），将瑞金县苏的腐败分子谢步鸫（私吞公款、强奸妇女、公报私仇、滥杀无辜）处以枪决，打响了中央苏区反腐惩贪的第一枪。1933年12月15日，苏维埃中央政府由毛泽东签署发布了中共历史上第一个反贪法规——《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第二十六号训令》，规定“贪污公款在五百元以上者，处以死刑”。时任中央政府总务厅工程基建处处长的左祥云、瑞金县组织部长陈景魁、瑞金县财政部会计科长唐仁达、胜利县苏维埃政府主席钟铁青、于都县苏维埃政府军事部长刘仕祥、少共县委书记滕琼等9个贪污腐败分子，都被苏维埃中央政府判处死刑，一时轰动苏区，大快人心。1934年4月至9月，苏维埃中央审计委员会（主任阮啸仙）对中央政府各部进行了检查审计后，在审计报告中宣布：“只有苏维埃是空前的真正的廉洁政府。”毛泽东号召“节省每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成为苏区的响亮口号。在中央苏区，毛泽东补交伙食费，朱德被误认为“伙伙头”，周恩来以砖头当枕头，彭德怀陈毅受伤、邓小平生病都拒绝任何照顾，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启耀，在三年游击战争时期被敌打散，讨米度日，历尽艰辛却腰缠万贯，分文未动，

抗战爆发后把身上保存的金条、银圆全部交给党组织，苏区群众称他为“腰缠金条的讨米人”。方志敏的《清贫》更是真实感人，脍炙人口。清正廉洁是苏区精神的重要内涵。

（五）艰苦奋斗。突出表现在“创业艰难百战多”

苏区时期为维系革命战争，“建筑红色政权”（徐特立语），各地苏区军民在党和苏区政府领导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白手起家，创办了兵工厂、被服厂、造币厂、印刷厂、农具厂、榨油厂、斗笠厂、织布厂、卫生材料厂、无线电器材厂等等。苏维埃国家银行行长兼钨砂公司总经理毛泽民，经常头戴斗笠，脚穿草鞋，背着装有衣服、笔墨、算盘、账簿的背包，下乡办公，群众称赞地说：“毛行长的办公室打在背包里。”博古、陈云、罗迈、邓颖超、潘汉年、陆定一、成仿吾、贾拓夫、毛泽覃、阿金、彭儒等23人，向《红色中华》倡议“每人每天节省二两米”，送往前方，倡导节省运动。苏区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更是苏区军民艰苦奋斗的绝唱。彭真曾经说过：“中共党史上有三件最苦的事，红军长征，东北抗联，三年游击战争。”项英、陈毅领导的“油山苦斗”，曾受到党中央的高度评价和称赞，成为“全党的模范”。他们在赣南的深山老林，过着“像野人一样的生活”。正如陈毅在《赣南游击词》中所述：“天将午，饥肠响如鼓。粮食封锁已三月，囊中存米清可数。野菜和水煮。”“叹缺粮，三月肉不尝。夏吃杨梅冬剥笋，猎取野猪遍山忙。捉蛇二更长。”红军游击队紧紧依靠人民，“创业艰难百战多”，终于苦尽甘来，走出深山老林，奔赴抗日前线。艰苦奋斗是苏区精神的显著特征。

（六）争创第一。突出表现在创造“第一等的工作”

在中央苏区的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文化教育、扩红运动、推销公债、拥军优属、粮食动员等各项工作中，广大苏区干部努力拼搏、开拓创新、模范带头，都创造了“第一等的工作”，受到毛泽东和苏维埃中央政府的表彰。赣东北省委、兴国县委、长冈乡、才溪乡苏维埃政府就是这方面的先进模范。毛泽东在二苏大会期间，还亲笔为兴国县题写“模范兴国”四字，予以褒奖，并号召全苏区干部要向兴国县学习，造成“几十个兴国县”，“几千个长冈乡”，作为我们“巩固的阵地”。兴国县委书记谢名仁力倡“用冲锋的精神做好革命工作”，被群众称为“不知疲倦的人”，他和长冈乡苏主

席谢昌宝一起在全苏二大登台接受了毛泽东亲手授予的“兴国模范县”“长冈模范乡”奖旗、奖牌，后二人都壮烈牺牲。谢名仁就义前留言：“生不投降，死不叛党”，“宁做刀下鬼，不做负义人！”兴国县提出了《兴国县党员和干部十带头制度》，蜚声苏区。争创第一是苏区精神的突出表现。

（七）无私奉献。突出体现在“一切为了苏维埃”

在中央苏区血与火的峥嵘岁月里，广大军民无私奉献、不怕牺牲，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为了苏维埃，广大人民群众倾其所有，参军支前，积极支援红军和反围剿战争。当时赣南 13 个苏区县总人口约 240 万人，青壮年有 50 万，先后扩红参军的有 33 万，支前的 60 余万，牺牲的有 20 余万人，其中有名有姓的烈士为 10.8 万人，兴国、瑞金、于都、宁都等县的烈士都在 1.6 万人以上。闽西有 10 万儿女参加红军，有 2.8 万人参加长征。长征途中，每前进一公里就有一个兴国战士倒下。苏区人民响应中央政府号召，扩大红军达 8.6 万人，征调挑夫 5000 余人，借谷 84 万担，被毯 2 万床，布鞋 5 万双，草鞋 20 万双，筹款 150 余万元，中央苏区的人民倾其所有、支援战争，为中国革命作出的巨大奉献和牺牲，在全国是罕见的、震撼人心的。闽西福音医院院长傅连璋是个基督教徒，他放弃优厚的生活待遇参加革命，并将自己的整个医院器材、药品和多年的积蓄，全部搬到瑞金献给苏维埃政府，创办了中央红色医院，是苏区干部无私奉献的光辉典范。苏维埃中央政府工农检查部部长何叔衡，坚持原则，执法如山，被群众誉为“苏区包公”。他在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守苏区，被敌包围，跳崖牺牲，实践了生前“我要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誓言。瑞金县下霄区杨荣显老人，将自己八个儿子陆续送往前线，最后全部壮烈牺牲。兴国县高兴乡邱会培一家 12 口献身革命，满门忠烈。长征前夕，于都县年过古稀的曾大爷，为了给红军架桥，将自己的寿材都捐出来了。无私奉献是苏区精神的重要方面。

上述 28 个字的概括昭示：苏区精神既蕴含了中国共产党人革命精神的共性，又凸显了苏区时期的特色和个性，“是中国共产党人政治本色和精神特质的集中体现，是中华民族精神新的升华，也是我们今天正在建设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来源”。习近平对“苏区精神”的概括，既是原汁原味，切合历史实际的，又把握了苏区精神的主流形态和本质内涵，

抓住了能穿透时空、影响时代的亮点，且用语精短，简明扼要，易于记忆，便于宣传。

三、新时期仍须大力弘扬苏区精神

中央几代领导人一直都非常关心老区人民，关注苏区精神。

1951年8月，毛泽东和党中央委派谢觉哉为团长带领中央慰问团来到江西和赣南老区，送来了毛泽东“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的亲笔题词。这个“革命传统”，是“苏区精神”的最初表述。

1996年9月，江泽民在视察老区时提出，“我们要把老区的精神和传统世代传下去”。老区的精神就是苏区精神，老区的传统就是苏区干部好作风。

2003年8月，胡锦涛视察赣南老区时指出，“革命前辈们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培育起来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传统……永远是我们前进道路上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不断夺取新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这个老区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传统”，是“苏区精神”的进一步阐述。

2011年11月，习近平在“纪念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80周年座谈会”上提出：“我们要始终大力弘扬苏区精神，推动创先争优，不断开创各项工作新局面。”并提出了苏区精神28个字的内涵。这是“苏区精神”的最新定位。

最近，2015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在江西代表团郑重提出：苏区精神要“世代传承”，“固根守魂”。

当前，大力弘扬伟大的苏区精神，让苏区精神“世代传承”，“固根守魂”，最重要的是要结合党的历史方位和历史任务的新变化，结合改革开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实践，不断赋予苏区精神以新的时代内涵，动员和激励广大干部群众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而不懈奋斗。

第一，大力弘扬苏区精神，就要坚定信念，矢志不移，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苏区精神的灵魂是坚定信念、矢志不移、高举旗帜、开拓创新。旗帜昭示前进道路，旗帜指引胜利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唯一正确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我们一定要按照党的十八大精神，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勇于变革、勇于创新，坚信“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光芒。

第二，大力弘扬苏区精神，就要求真务实，实事求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苏区精神的精髓是实事求是、敢闯新路，这是我们党始终保持生命力和战斗力的关键所在。我们一定要按照党的十八大提出的要求，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着力解决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把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

第三，大力弘扬苏区精神，就要艰苦奋斗，清正廉洁，坚持执政党的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艰苦奋斗、清正廉洁是苏区精神的本质特征。苏区时期，我们党为了夺取全国政权，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带领军民在剧烈的革命战争和极为艰苦的环境中，依靠群众浴血奋斗，反腐惩贪，廉洁奉公。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要传承和弘扬苏区精神，艰苦奋斗，清正廉洁。大道至简，当官不能任性。当官任性，百姓遭殃。权力出笼子，人就要进笼子。在当前“前腐后继”、出现群体性、家族性、塌方式腐败的情势下，一定要按照十八届四中全会的要求，坚持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依法治国，严惩腐败。腐败没有特区，反腐没有禁区，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老虎苍蝇”一起打，实行铁腕治吏，建构法治中国。

第四，大力弘扬苏区精神，就要关注民生，一心为民，坚持为人民服务的立党宗旨。在苏区时期，我们党和广大人民群众建立了血肉相连的密切关系，形成了一道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真正的铜墙铁壁”。当前，我们一定要按照党的十八大提出的要求，坚持以人为本，关注民生，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切实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真正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万事民为先”。中国梦就是人民的梦。只有根植人

民，造福人民，党才能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第五，大力弘扬苏区精神，就要争创一流，无私奉献，不断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苏区时期，毛泽东始终把党的建设放在极为重要的地位，着力从思想上建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一定要按照党的十八大提出的要求，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作为主线，不断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反腐倡廉建设。我们要大力弘扬苏区精神，使广大党员和干部获取精神养分，“升华思想境界，陶冶道德情操，完善思想品格，培养浩然正气”，以经受住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防止和克服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和消极腐败“四个危险”，使我们的党长治久安。

党的十八大郑重提出：“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权力观、事业观。”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说：“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苏区精神中蕴含了无限丰富宝贵的政治营养和红色基因。弘扬苏区精神的重要目的，是为了推进革命老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弘扬苏区精神，实现老区振兴，是时代的呼唤，人民的期盼，也是神圣的使命，历史的担当。原中央苏区和全国各地老区人民，一定要抓住国家支持老区振兴发展的历史机遇，坚持国家扶持和自力更生相结合，“输血”和“造血”相结合，实现革命老区的跨越式发展。

《苏区研究》，2015年第1期

苏区精神与红船精神

江西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红船精神与苏区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党的创立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孕育形成的伟大革命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政治本色和精神特质的集中体现，是中华民族精神新的升华。红船精神、苏区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链条上不可或缺的一环，一脉相承，既体现了各自鲜明的时代特色，又蕴含着中国共产党人革命精神的共性。无论现在还是将来，我们都要大力弘扬红船精神、苏区精神等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开拓进取、矢志不渝，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的正能量。

—

红船精神与苏区精神虽然同根同源、一脉相承，但是作为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所产生的精神形态，它们呈现出“阶段性、地域性和事件性”的特征，彰显出鲜明的时代特色。

红船精神、苏区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党的创立时期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孕育形成的。从时间上来说，红船精神在先，苏区精神在后。从二者的关系上来讲，红船精神是苏区精神的重要来源，苏区精神是红船精神的传承和弘扬。从这个意义上讲，红船精神和苏区精神孕育形成的历史内涵和实践基础是不同的。

红船精神是在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深刻变革中孕育的。近代中国的历史表明，中国的农民阶级和资产阶级都没有能力承担起领导中国革命的

责任，不可能领导中国人民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20世纪初，先后建立起来的不同性质的政党组织都未能提出正确的纲领并发动人民群众，以解决近代中国社会所面临的迫切问题，中国人民和中国革命呼唤着新的领导阶级和新的政党组织。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适应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进步和革命发展的客观需要，是近代中国历史选择的必然结果，是中国人民选择的必然结果。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近代中国革命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有了可以信赖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力量。

而苏区精神是“在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中，在建立红色政权、探索革命道路的实践中”“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领导创建了中央苏区、鄂豫皖、湘鄂西、湘鄂赣、湘赣、闽浙赣、左右江、陕甘边、鄂豫陕等十多块苏区，其中中央苏区是当时最大、最重要、最具代表性的革命根据地。中央苏区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党、政、军、群首脑机关所在地，是全国苏维埃运动的中心区域和大本营，是中国共产党人学习治国理政艺术和造就大批治国精英的实验基地。在苏区的创建和发展过程中，经过反复比较和选择，中国共产党逐步探索并成功开创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中国特色的民主革命道路。

关于红船精神和苏区精神的内涵，习近平同志都有精辟而科学的论述。红船精神的深刻内涵，是“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信念、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苏区精神的主要内涵，是“坚定信念、求真务实、一心为民、清正廉洁、艰苦奋斗、争创一流、无私奉献”。从二者内涵的表述来看，它们的侧重点有着明显不同。

红船精神独具特色的内涵，在于“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特质，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创新、勇于开拓的精神实质。开天辟地、敢为人先作为红船精神的精髓始终贯穿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并且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最终内化为共产党人的自觉行为。苏区精神在革命斗争和建设的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红船精神。其独具特色的内涵，在于“求真务实、清正廉洁、艰苦奋斗、争创一流、无私奉献”，充分体现在苏区干部好作风的精神风

貌和党的一系列优良作风。苏区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努力克服党内“左”倾错误的干扰，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成功地把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入农村；各级党和苏维埃政府非常注重干部作风和反腐倡廉建设，创建了“空前的真正的廉洁政府”，赢得高度赞誉；广大军民“有盐同咸，无盐同淡”，以蓬勃的革命热情、昂扬的革命斗志，创造了“第一等的工作”，推动苏区各项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蓬勃发展。

二

红船精神和苏区精神都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链条上不可或缺的一环。红船精神是苏区精神的先河、源头，苏区精神是红船精神的传承、发展。它们都蕴含了中国共产党人革命精神的共性。

都具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党的一大召开前，反动势力就视共产主义为洪水猛兽。党的一大正在召开时，遭到法租界巡捕房暗探的袭扰。但思想先进的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坚定的理想信念和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终于排除干扰，及时转移开会地址，在南湖红船上完成缔造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之后，我们党在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时期，历经曲折而不畏艰险，屡受考验而不变初衷，由小到大，由弱变强，靠的还是坚定的理想信念和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苏区时期，这种执着的精神得到了传承与光大。面对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实行白色恐怖的血雨腥风，面对敌人的重兵“围剿”封锁，苏区军民怀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信念，坚信中国革命必然胜利，不断战胜各种艰难困苦，前仆后继，勇往直前。实践证明，由坚定的政治信仰产生的百折不挠的革命意志，是中国共产党人战胜一切艰难险阻、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力量源泉。正如邓小平所说：“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

都把“人民利益作为最高标准”。中国共产党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党的一大就明确提出了要“把工农劳动者和士兵组织起来”的思想。苏区时

期，党和苏维埃政府十分关注群众利益，注意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群众疾苦，切实帮助解决群众生产生活的实际困难。毛泽东曾反复强调，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问题和工作方法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一切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正是由于党和苏维埃政府真心实意为人民群众谋利益，所以赢得了人民群众真心实意的拥护，因而能够拥有战胜强大敌人和各种困难的真正铜墙铁壁。历史昭示我们，只有植根人民、造福人民，党才能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都具有“超越时空的恒久价值和旺盛生命力”。红船精神、苏区精神不仅生动地诠释了中华民族精神的时代风貌，而且还鲜明地烙上了党的创立时期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历史印记。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物质条件极差，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从无到有、由小变大、由弱变强，最重要原因就是“有一种重要的因素起了重要作用，那就是精神的力量”。这种精神力量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作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红船精神、苏区精神具有超越时空的恒久价值和旺盛生命力。当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已进入决定性阶段。越是接近梦想，前进的道路就越是艰辛，我们就越是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作为支撑，这些精神就是推动我们不断前行的思想灵魂。

（执笔：陈安）

《光明日报》，2013年12月26日

长征精神



长征这一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

伟大长征精神，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

——习近平，《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6年10月21日

红军长征与长征精神

——纪念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 80 周年

石仲泉

内容提要：红军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创造的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史诗。长征的基本内涵，包括革命与反革命两种力量的搏斗、党内斗争、同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的生死博弈三方面的斗争。长征精神体现在对革命的无限忠诚和对党的坚定信念，不怕任何艰难险阻和不惜付出一切牺牲，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互助友爱的高尚品德，紧紧依靠人民群众等五个方面，是中国共产党人先进性之魂的集中反映，是中华民族精神之魂的最高体现，也是我们党取之不竭的宝贵的精神资源。

今年是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 80 周年。我本人有一个“走走党史”的理念，首先走了红军长征路。从 2003 年始，结合出差、讲学，不仅基本走完了中央红军、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长征路，同时走了红二十五军的部分长征路。2013 年还对西路军悲壮历程作了考察。这样，对红军长征历史就有了比较多的亲历、亲知的感受和体验。在纪念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 80 周年之际，我主要根据个人的实地考察，谈谈对红军长征和长征精神的一些看法。

一、红军长征的基本内涵和发展阶段

红军长征早已成为历史。对它的研究仍然是个常研常新的课题。

在走长征路的过程中，我萌生一个疑问：红军长征的基本内涵是什

么？怎样才能全面地、完整地把握它？这是过去讲长征的书上没有涉及的，因而成了“长征行”考察的重点。

经过考察，我感到红军长征的内涵很丰富，它不简单地是突围、转战、打仗等，应包括三个方面的严峻斗争：首先是革命与反革命两种力量、光明与黑暗两种命运的大搏斗；其次是在这场惊心动魄的搏击中，共产党内部的指导思想和政治路线有尖锐斗争；再次是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使红军一再面临着能否克服艰难险阻、经受饥寒伤病折磨的严重考验。这三方面的斗争和博弈，构成红军长征的基本内涵。

为了全面把握红军长征的基本内涵，正确说明长征历史，首先必须明确关于长征的若干基本概念，澄清一些模糊认识。

（一）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是“3 + 1”的长征。

红军长征，就最后到达陕北这个历史的主线而言，毫无疑问，以中央红军的长征为历史起点。但是，整个红军的长征是“3 + 1”的长征。即红一（中央红军）、二（最初称红二、六军团）、四方面军的长征，再加红二十五军的长征。红军长征开始的时间，以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离开中央苏区算起；长征结束以三大主力红军（红二十五军于1935年11月并入红一方面军系列）于1936年10月在甘肃会宁和今属宁夏的将台堡会师为标志。

红军长征历时两个寒暑，纵横14个省（四川省分出重庆市，按现在地域说为15个省市），进行了600多次重要战役战斗，渡过了近百条江河，越过了约40座高山险峰，经过了10多个少数民族地区。其历时之久，规模之大，行程之远，沿途自然环境之恶劣，敌我兵力较量之悬殊，在人类战争史上不说绝无仅有，也极其罕见。

关于红军长征的里程，过去比较多的是讲二万五千里。这是讲的中央红军走的长征路。现在既然明确了整个红军的长征是“3 + 1”的长征，那么仅仅讲二万五千里就不全面了。据军史资料统计，红二方面军的长征历时11个月，转战8省，行程两万余里。红四方面军的长征历时19个月，转战6省，有的三过雪山草地，行程1万多里。红二十五军的长征历时10个月，转战4省，行程约1万里。将上述四支红军的长征路，历经14个省的里程加在一起，长征的实际总里程为6.5万多里。因此，除了继续肯

定中央红军的长征里程两万五千里外，还应当广泛宣传整个红军长征的里程为六万五千里，要强化这个概念。这样比较完整。

(二)对红军为什么长征，要将进行战略转移的原因同作出战略转移的决策加以区别

战略转移的原因和作出战略转移的决策，这是两个有密切联系的问题，但又不能混为一谈。有如上述，红军长征首先从中央红军长征开始。而中央红军所在的中央苏区，在鼎盛时期的面积为8·4万平方公里，比现在的宁夏回族自治区还大，相当于两个半海南岛；人口450多万，是全国最大的革命根据地；中央红军曾达到13万人。以中央苏区为依托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先后拥有13个苏区，总面积达40余万平方公里（相当于4个江苏省），人口约3000万。这么大一个中央苏区和“红色中国”，怎么几乎丧失殆尽呢？从党的指导方面言，这主要是在中共中央占据统治地位的“左”倾教条主义推行错误的政治和军事路线的结果。由博古负总责的中央领导，面对国民党反动集团调集50万重兵发动空前规模的第五次“围剿”，不仅将毛泽东排斥出党政军领导岗位，还抛弃前四次反“围剿”战争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指挥下取得胜利所采用的战略战术，在许多方面听凭共产国际派来的所谓军事顾问李德的错误指挥，历经一年的消耗，中央红军遭受重创，中央苏区日益缩小，最后不得不实行战略转移。

在这里，往往被忽视但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即将进行战略转移的原因同作出战略转移的决策混在一起，不加区别。其实，这是两个问题，应区别开来。第五次反“围剿”在中央苏区的失败，从主观方面说，无疑要归咎于错误路线。但导致这个结果后怎么办？在当时只有两种选择：一是继续死守，与中央苏区共存亡；一是撤出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前者说白了，是死路，不仅国民党军重兵包围，而且苏区内的人、财、物等资源基本耗尽，再难以支撑一场需要大量兵员和物资的战争。进行战略转移，从理论上说是活路，只要指导思想正确，保存革命力量就能再图发展。这就是俗话说的，“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因此，错误路线的领导使红军招致严重失败，这是一个问题；在这个危急关头作出战略转移即长征的决定，则是另一个问题。对前者要否定，对后者要肯定。不能因为否定前者，就不作分析地认为：在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关头，作出战略转移的

决定也是错误的。

（三）红军长征出发地不是一个，而是多元的

这些年开展红色旅游，一些地方争着打“长征出发地”牌，对红军长征出发地的争论愈趋激烈。我在考察红军长征路后，形成了“长征出发地的多元论”概念，即各路红军长征都有自己的出发地，属于不同层面的出发地也不止一个。比如，就中央红军言，瑞金是中央首脑机关的长征出发地，带有标志意义；于都是中央首脑机关和红军主力四个军团的集结出发地。还有红军部队从其他地方直接出发作战略转移进行长征的，如红九军团就是从会昌出发的，因而也是长征出发地。属于这个层面的出发地，还有石城、长汀、兴国、宁化等县。讲红军长征出发地的多元性，并不等于说红军战斗过的地方都是长征出发地。其定位标准，就中央红军言，大体以1934年10月7日中革军委下达撤离战斗前线到集结地的情况来确定。各部队接到命令时所撤离的那个地方，均可视为长征出发地。上述所列，还只是中央红军的长征出发地。长征既然是“3+1”的长征，其他红军长征还有各自的出发地，如红二、六军团在湖南桑植，红四方面军在四川苍溪，红二十五军在河南罗山等。因此，红军长征出发地不只有唯一的一个，而是多元的。

（四）“长征”概念的最早使用和长征目的地的不断变化

红军长征，最初叫“战略转移”“西征”“远征”。使用“长征”一词，最早是在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的2月下旬，中央红军二渡赤水发布的《告工农劳苦群众书》中。

红军长征到陕北，这不是预先设定的。进行战略转移，开始并没有打算走很远。长征的路线和目的地是根据军事形势和作战情况而不断变化的。这是一个动态过程。红军长征目的地，据我初步统计，仅中央红军言，先后有8个设想：（1）在瑞金出发时是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发展复兴后再回来；（2）黎平会议决定到黔北的遵义地区建立新根据地；（3）遵义会议决定过长江到川西建立根据地；（4）会理会议决定到川西北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去建立根据地；（5）两河口会议决定去川陕甘一带开辟新的根据地；（6）毛儿盖会议进一步明确到甘南在洮河流域创建新根据地；（7）俄界会议决定到与苏联接近的地方创建根据地，将来向东发展；（8）在哈

达铺初步决定到陕北去，随后的榜罗镇会议正式决定陕北为长征的最后落脚点。中央红军到达吴起镇后，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批准了榜罗镇政治局常委会议的决定，宣告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结束。随后，中共中央将“红都”设在瓦窑堡，陕北成为中国革命大本营。

明确了上述问题，红军长征基本内涵包括的三方面斗争，就有非常丰富的内容，有助于我们来全面把握。

第一方面的斗争，即革命与反革命两种力量的搏斗。中央红军以湘江战役、四渡赤水、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最为惊心动魄。红四方面军以嘉陵江战役、名山百丈关战役和甘南的“岷（县）、临（潭）、舟（曲）战役”最为激烈。红二方面军的战斗以在云贵高原转战乌蒙山的大迂回作战和在陇南的“成（县）、徽（县）、两（当）、康（县）战役”最为著名。红二十五军以在河南方城独树镇和甘肃泾川王母宫塬的血战最为艰险。

第二方面的党内斗争包括两个内容，突出地表现在两个系列会议上。一是与博古、李德的“左”倾教条主义的斗争。这以中央红军长征途中召开的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和遵义会议最为关键。二是与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这又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从两河口会议开始，直到俄界会议，由以毛泽东为实际核心的党中央同张国焘的直接斗争；二是在红军总部随红四方面军长征后在阿坝会议和卓木碉会议上，由以朱德为代表的红军领导人进行的反对张国焘分裂党中央的尖锐斗争。

第三方面的斗争，即同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的生死博弈，以过雪山草地最为艰难。红一方面军以翻越四川宝兴夹金山，红四方面军以翻越四川丹巴至道孚的党岭山，红二方面军以翻越从云南中甸至四川乡城的系列雪山，牺牲的指战员为最多。过草地是长征途中遭遇的最大的艰难险阻。三个方面军都经过了“水草地狱”，牺牲者更多。

红军长征在上述三方面的斗争中既突破了反动派军队的围堵，又克服了党内错误指导思想招致的困难，还战胜了自然界的种种艰难险阻，实现了从东南至西北的战略大转移。

关于红军长征历程的基本阶段。红军长征，既然经历三方面的严峻斗争，而上述三方面的斗争又是交错发展的。这样，我将红军长征历程分为五个阶段。

（一）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出发至1935年1月遵义会议前。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之后实行战略大转移。其间，博古主导的党中央坚持错误军事指挥，使红军在突破国民党军队的封锁线时，在湘江战役中遭到惨重损失。它教育了广大红军将士，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实践基础。

（二）从1935年1月遵义会议至1935年6月两河口会议。遵义会议批判了以博古、李德为代表的错误军事路线，改组中央领导，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实际领导地位。此后，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中央红军四过赤水河，强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初步摆脱国民党的围追堵截，在小金（懋功）达维实现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两大主力会师。这5个月，中央红军长征尽管比较艰苦，但完全改变了此前的被动局面，是红军牵着蒋介石鼻子走而非常主动和顺心的一段。

（三）从1935年6月两河口会议至9月中央红军到达哈达铺。

在红军两大主力会师后，张国焘自恃人多枪多，野心逐渐膨胀，一方面不同意中央的北上方针，另一方面又伸手要权，直至另立中央，同以毛泽东为实际核心的中央分庭抗礼。从两河口会议始，以毛泽东为实际核心的中央对张国焘作了仁至义尽的规劝和争取工作，同他的分裂主义行径进行了反复斗争，最后坚持北上路线，克服了过草地的极端艰难困苦的环境。到哈达铺之后，明确了陕北为长征落脚点。

（四）中央红军从1935年9月到哈达铺至12月瓦窑堡会议。中央红军在通渭榜罗镇会议整编为陕甘支队后，行动更为便捷，进军打仗更为顺利，于10月下旬到达吴起镇，11月下旬取得直罗镇战役的胜利，为中共中央将西北作为全国革命新的大本营举行了奠基礼。12月召开瓦窑堡会议，根据国内形势发生的巨大变化，党的政治路线作了重大调整，为迎接历史转折的新阶段作了重要准备。

（五）从1935年12月中央瓦窑堡会议后至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陕甘宁会师。这一年，中央红军先后进行东征和西征，为巩固和扩大陕甘宁根据地作了很大努力。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在南下9个月后破产。在中共中央和在红四方面军工作坚持正确主张的领导干部以及红二、六军团负责同志的共同努力下，张国焘最终同意北上。红四方面军先是与红二、

六军团于1936年6月在四川甘孜实现会师；最后，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宁夏将台堡地区实现大会师。中国工农红军走完了长征路。长征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点。

二、红军长征史上的若干重要问题

（一）湘江之战和遵义会议

这是中央红军长征初始阶段的重大事件。中央红军突破前三道封锁线基本没打大仗，不是因为像有的网文所说蒋介石要放红军一马，而是因为红军与陈济棠达成了秘密协议，即只要不在广东建立根据地，而是借道西去，不布置重兵围堵。但蒋介石在判明中央红军西进的战略意图后，调集30余万兵力，组成5路大军，沿湘江、潇水两岸建起550多座碉堡，构筑第四道封锁线，妄图以优势兵力和精良装备，前堵后追，左阻右截，对红军“围歼”。面对严峻形势，博古、李德顽固坚持西进路线，再加上又是“大搬家”甬道式行军，一再耽误了抢渡湘江时间。湘江之战，从11月25日中革军委下达作战命令，到12月3日中央红军后卫部队被歼，共血战9天。红军广大指战员表现了顶天立地的英雄气概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前仆后继，神勇杀敌，虽然歼灭了不少敌人，但红军自己折损了3万多人。这是建军以后在一次战役中所遭受的最惨重损失。

湘江之战打得如此惨烈，教育了红军广大指战员，认识到中央的错误领导和指挥的严重恶果，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实践基础。

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召开了一系列会议，我在走长征路时作了考察。据不完全统计，属于中央政治局的会议、包括它的常委会和扩大会，从1934年底至1935年底，仅一年时间，比较重要的，有20多个。这些会议，按其讨论的内容和解决的问题来划分，形成三个系列。

一是中央红军在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前召开的中央系列会议。这个系列的会议有9个。它包括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鸡鸣三省会议、扎西会议、苟坝会议、会理会议，还有泸定会议。这些会议基本上是讨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指导思想、军事路线、行军方向和作战方案等。

二是中央红军在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召开的中央系列会议。它包括两

河口会议、卓克基会议、芦花会议、沙窝会议、毛儿盖会议、巴西会议、俄界会议等7个会议。这些会议都是讨论两大主力红军会师后的军事计划、战略方针、行动方向、作战方案，以及与张国焘的分歧，努力求得共识。其中的批评、斗争，也是希望求得团结，共同北上抗日，但没能实现这样的结果。

三是与红四方面军分道后，中央红军在单独进军陕北过程中召开的系列会议。它包括哈达铺会议、通渭榜罗镇会议、保安铁边城会议、吴起镇会议、下寺湾会议、瓦窑堡会议等6个。这些会议就是不断讨论中央红军对陕北的进军，以及到达陕北后随着形势的变化而调整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问题。

这三个系列会议，对中央红军实行战略大转移、经过长征到达陕北根据地，开辟新的革命局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这里主要讲遵义会议怎样实现党的历史的伟大转折。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随后成为党和红军的实际领导核心。对此，起重要作用的主要是三个人。

一是王稼祥。他首先提出召开遵义会议，要将博古、李德“轰下台”。

二是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上，他第一个发言对博古“开炮”作“反报告”，提出让毛泽东回到军队领导岗位，并起草了遵义会议决议。

三是周恩来。他的作用至少不在王、张之下，从某种意义上说甚至起了决定性作用。第一，周恩来负责会议的组织工作。原定是政治局会议，而不是扩大会议。博古最初不同意扩大到军团主要领导参加，但军团领导人纷纷要求，周便通知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前来与会，这为在会议中提出改组中央领导，让毛进入中央常委奠定了基础。第二，周恩来在会议上的主持和发言起了举足轻重作用。第一天会议博古作报告，由周主持。博古刚讲没多久，张闻天加以打断，抢先作了代表毛泽东、王稼祥和他的三人发言，周恩来没予制止，让其“开炮”；毛泽东对李德的战略战术进行严厉批判后，李德想反驳，又被周恩来制止。这个导向对会议产生重要影响。第三，周恩来的“副报告”，着重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主动承担责任，请求免去军事领导职务，全力推举毛泽东来领导红军。他的这个表态和提议得到了与会多数人的肯定和拥护。由于他的身

份和影响比张、王要大，他的这个态度对于遵义会议作出毛泽东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参与军事领导的决定，发挥了最重要的影响。第四，遵义会议后，周恩来与博古有一次长时间的谈话，对于顺利实现遵义会议没有解决的最高领导权力的交接起了决定性作用。

周博谈话的情况是这样的。遵义会议改变原定议题和程序，推举毛泽东参与中央核心领导的情况，博古在会前一点不知道。对会议批他也没有思想准备。会后，博古对会议上一些发言一直想不通。在1935年2月初中央红军长征一渡赤水到达“鸡鸣三省”的村子改组中央，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前，周恩来同博古作了谈话。他说：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失败，说明中国革命的源泉在农村，必须走农民战争道路。这以后，我就在考虑，我们党必须找一个熟悉农村革命的人当统帅。我虽然长期做军事工作，军队干部也拥护我，但我有自知之明。你虽然有才华，但不懂军事，很难领兵打仗。行伍出身的人不会服你。你和我都是做具体业务的人，不合适做领袖，当统帅。毛泽东擅长农民运动，深知在中国干革命，离开了农民将一事无成，农民战争是中国革命成功的基石。他经过井冈山斗争，总结出打游击战、运动战的经验，很适合驾驭目前的战争。他喜欢历史，善赋诗词，文笔豪放，是一个很有智慧的帅才。当然，人无完人，但战争需要他率领红军打败蒋介石，这是最重要的。我对他是到中央苏区后，才了解到他打仗很有一手，每仗全胜，很是佩服。宁都会议后，他离开军队，像一块石头一直压在我心里。红一方面军不能没有他。从红军长征开始，我就在想办法让他尽快回到军事领导岗位上来。黎平会议上，他有理有据地驳倒了李德的错误主张，使我下了决心要尽快“去李换毛”。我深信，以他的才能，一定能率领红军走出困境。所以在遵义会议上我力主他进入政治局常委，参与军事领导。你的讲话不检讨军事路线错误，招致很多人不满，促使我不得不站出来检讨反“围剿”失败的领导责任，批评你的错误。会议发展到集中批评你，是因为大家憋了一肚子话要说，你应想开些。对毛泽东，你要看大处，希望你能抛弃和他的前嫌，同心同德，一切为了打败蒋介石、建立无产阶级新政权这个大局。这一席谈话，使博古解开了思想疙瘩，服从革命事业的需要，顺利实现了博张交权。

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对于毛泽东进入中央常委虽然起了重要作用，

但毛泽东这时毕竟不是一把手，为什么说成了领导核心呢？这里有一个看问题的方法论，即不应从形式上看问题，而应从实质上看问题。周恩来对博古的那次谈话中说过：谁做“书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掌军权，谁来领导打好仗，只有在战争中不断得到军队拥护的人，才能真正成为党的领袖。周恩来的这个话是说到了实质。这个领袖无疑应是毛泽东。所以说，遵义会议实现了以毛泽东为党中央实际领导核心的转变。

（二）张国焘的“九九电报”即“密电”

在长征途中，张国焘的思想有一个变化过程。应当承认，在开辟川陕苏区和为迎接中央红军作战略策应的长征到建立松、理、茂红色区域这个时期，张国焘还是做了许多有益工作的，甚至是有功的。因为他是一把手。若他不赞成，那些成绩很难取得。但是，自两河口会议始，张国焘就开始打自己的算盘，与中央闹别扭了。一是在两军会合后到哪里去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上与中央意见相左，中央提出拟向东、向北去川陕甘开辟根据地，而张国焘却主张两军会合后，控制川西北地区，向南进攻；二是了解到中央红军不足3万人，而他有8万之众，便如前述，野心开始膨胀，一方面不同意中央的北上方针，另一方面又伸手要权。此后，与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对于党和红军的前途成为一个重要问题。在人烟稀少的川西北地区，红军与国民党的战争危机暂时不尖锐了，党内危机却逐渐严重起来。

所谓密电问题，是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研究红军长征史的一大热点。有争论的是两个问题：一是有没有1935年9月9日的“密电”；二是“密电”的内容究竟是什么。2003年走长征路，我专门到发生这个事件的巴西、阿西、潘州、班佑等地作了实地考察，了解当时中央研究处理此事的一些实际情况。在我看来：

第一，应当承认有“密电”。毛泽东1937年3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批判张国焘的错误时讲过此事。第一个看到“密电”的叶剑英，多次说过此事的具体情况。张国焘坚持“南下”的思想很顽固，电报很多，这不过是一个具体情节。当然，这是一个重要情节，进一步表明了它的坚决态度，是过去思想发展的逻辑使然。再则，张国焘的要害是另立中央，在延安批判他时没有必要杜撰此事去加害于他。当时也没有将此事作为批判重点。那种持没有“密电”说的，主要以在中央档案馆没有找

到这个电报为由。这是个技术性问题，不能因此说明没有此电。因为那个年代战事频繁，丢失不是没有可能的。还有，若要讲保存电报，首先应查收电人和发报机关。该电不是发给中央和毛泽东的，在党中央的文电档案里找不到“密电”没有什么奇怪。因此，这个论据很难成立。至于有的当事人否认此事，这不能简单地听信他们后来否认的说法，还要看他们此前又怎么讲承认之说的。对这种有反复的情况要作具体分析，慎重对待。还有，不妨设问，如果没有“密电”，怎么解释毛泽东率原中央红军部队和机关突然在半夜出走巴西和在俄界召开会议通过的关于批评张国焘错误的决议。目前归罪于毛的一些说法完全不符合历史实际，是纯主观的臆断。

第二，关键是“密电”内容。收电人员最初讲的“武力解决”之类的话，曾产生轩然大波。经过考证，这个说法没有文献根据。这样重大的事，不拿出确凿证据就讲是不合适的。现已得到澄清。目前都以毛泽东1937年3月下旬在延安批判张国焘的会议上讲的为准。其核心内容是“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有会议记录，比个人记忆准确。这是一个教训。凡是党史上的重大问题，都不能仅凭个人记忆，一定要查档案，找文字根据。这应当成为研究党史的一条戒律。

第三，对“密电”问题不宜“炒作”。张国焘主要是两大错误。首先是另立中央，搞分裂主义。其次是坚持“南下”路线，使四方面军遭受不应有的许多挫折，也影响了中央的北上进军。尽管从时序上讲，“密电”南下错误在前，另立中央错误在后，但像张国焘这样拥兵自重，公然扯起第二“中央”旗号的，在党的历史上还没有第二例。再则，“密电”只是坚持“南下”路线的一个具体情节。这不是“本”，而是“末”。有的同志往往本末倒置，对“本”不大关注，对“末”却兴趣浓厚。这是研究党史的“猎奇”倾向的反映。事实上，“密电”是密而不奇。杨尚昆对此事有个说明。他说：“密电”问题，凡军用电报“都是以专用的密码拍发的，而且不止一套密码，还有不同的密级，也可以说都叫密电。我虽然没有见到那份原电，但最早收阅电报的叶剑英当时亲口告诉过我，毛主席和周恩来多次讲到这件事，后来我又问过当年收抄这份电报的吕黎平，对有这样一份电报是没有疑问的。原电毛主席看过后，要叶剑英立刻送给陈昌浩他们，以后没有再找到。但中央北上后给张国焘等的电报中仍可找到证明。”

这说明，这份电报跟在此期间的其他许多电报一样，不是说只有它是“密电”，其他不是。“密电”说法，若不作正确理解，会给人产生误导。因此，我曾提议改用“九九电报”之说。以后就讲“九九电报”，不使用“密电”表述。这可以淡化“密电”之“密”给人的“猎奇”感。

（三）红四方面军的长征贡献

对红四方面军进行的长征和作出的贡献，过去的党史书讲得很少。因为张国焘分裂党、成立第二中央，是在四方面军长征途中发生的。这不能不影响对红四方面军长征的认识。我在2004年7月对红四方面军开辟的川陕根据地及随后的长征作了考察之后，深深感到：张国焘的错误对四方面军的长征无疑有很大影响，但不能因此就淡化乃至否定四方面军长征的贡献。过去的研究和宣传太失衡了。我初步将四方面军的贡献归纳为五点：

第一，对中央红军北进川西发挥了重要策应作用。红四方面军在1932年底开辟的川陕苏区，将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由东南引向西北，并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大区域。中央红军的长征，在遵义会议前几乎陷入绝境。为尽快改变这个局面，遵义会议后不久，中央发电红四方面军派兵南进，策应中央红军北上。红四方面军对挥师策应作了多方努力，于1935年3月集中主力西渡嘉陵江，开始了漫漫的长征路。那时，中央红军正在四渡赤水、转战黔滇，被国民党军前堵后追。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牵制国民党军，对中央红军摆脱困境起了有力的缓解作用。红四方面军在获悉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建立苏区的来电后，即向川西松潘一带前进，策应中央红军北上，实现了两大主力红军会师。因此，对红四方面军长征坚持策应中央的正确方针这一点，应予充分肯定。

第二，对中央红军克服物资匮乏、补充兵员起了巨大支援作用。红四方面军在进入松潘、理县、茂县地区时，中央红军已经过冕宁，正向大渡河挺进。红四方面军领导层将迎接中央红军作为首要任务。6月，两军先头部队在达维会师后，四方面军通过络绎不绝的马队、牦牛队，把大批慰劳品送至中央红军驻地。这包括数十万斤粮食，上千件衣服套装、皮衣、棉大衣、毛毯、鞋子等。后来，还给中央领导同志每人送了一套粗呢制服。中央红军也捐了不少钱给四方面军。中央红军长途跋涉，减员不少，出现官多兵少状况。经中央批准，四方面军调拨了3个团，近4000人，充实

中央红军。四方面军的大力支援，对中央红军增强战斗力、改善军需，起了重要作用。

第三，在所经过地区发挥了强大的“宣传队”作用。红四方面军有一个由20名石匠组成的钻字队，在砂石岩上将标语口号镌刻成大字。这就是有名的“红军石刻”。川陕根据地保留下来的红军石刻标语曾有4000多条，这在其他苏区罕见，目前已成为珍贵的文化景观。在长征途中，宣传队继续镌刻大字标语。仅苍溪就保存有1000余幅石刻标语和群众送亲人参加红军的生动图画。这些红军石刻标语，已成为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属于原川陕苏区的平昌县已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石刻标语园，收集了1600余幅以石刻为主体的标语，成为研究红军文化、弘扬红军精神、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基地。

第四，在所经过地区发挥了“播种机”作用。红四方面军所到之处，包括后来南下到一些地区，仍然宣传党的政策，坚持地方群众工作。张国焘搞分裂是在党内军内，并没有在广大群众中公开打旗帜。即使另立中央，也是打着马列旗号，蛊惑人心，进行蒙骗。广大指战员对党是忠诚的，对长征是坚定的，对群众工作是积极的。红四方面军三次进出藏区黑水县，驻扎150多天，多次派人与黑水各地头人会谈，宣传民族政策；帮助藏胞建立了区、乡苏维埃政权，还分别建立有游击队武装组织。在宝兴活动四五个月，不仅成立了县委，还成立了县、区、乡和村苏维埃，赤化了全县。红四方面军在这些地区播下的革命火种，对于团结藏族人民投入抗日战争、进行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第五，壮大了党领导的革命军队力量。红四方面军在达维同中央红军会师时为8万多人。这以后由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南下时牺牲1万多人；在甘孜整编时为4万余人；重新北上，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会师时为3.7万多人。随后，红四方面军一部奉命西渡黄河组成西路军，血战河西走廊，失散和牺牲2万余人。红四方面军另一部分到达陕北。结果在延安统计各方面军实有人数时，仍以红四方面军的人居多。抗日战争爆发后，基本改编为八路军第129师。解放战争时期又基本构成第二野战军的主力。新中国成立后授衔的将军，也以原红四方面军为最多。我国的三个将军县，其中两个县（湖北红安县和安徽金寨县）多为红四方面军的将军。红四方面

军的军史、战史，以光辉的实践证明：它们是党领导的能征善战的一支不可缺少的革命军队。

（四）西路军血战河西走廊

西路军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极其悲壮惨烈的一幕。它算不算红军长征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没有统一说法。在党史界，有不同看法。我们中央党史研究室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采取了基本上“算”的写法，将其放在“三大主力红军会师”一目中。但是，讲红军长征结束又是以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在1936年10月的会宁和将台堡会师为标志，这些年的纪念活动也是如此。而西路军血战河西走廊则发生在主力红军会师之后，它是从1936年10月24日在甘肃靖远虎豹口西渡黄河开始，到1937年3月14日在祁连山深处召开石窝会议宣布分兵活动为止，前后共有4个多月。如果以李先念率领的左支队在这一年4月底到达新疆星星峡为止，则有半年多。就此而言，它似乎被排除在红军结束长征之外了。因此，不少讲长征的书籍和影视都不讲西路军这一段历史。

我个人认为，如果讲红军长征全史，应当前后延伸。往前延伸，可将红七军团的北上抗日先遣队（后与赣东北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会合组成红十军团）转战闽浙皖赣，视为红军长征的序曲。因为组织这支先遣队就是为了调动和牵制敌军，既是为了减轻敌军对中央苏区“围剿”的压力，又具有为中央红军长征作战略准备的作用。这在前面已经讲到。往后延伸，就可将西路军视为红军长征的尾声。因为它一方面是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会宁会师后的重大决策，另一方面西路军本身就是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组成的原左路军和右路军的一部分。因此，不将其作为长征历史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它作为红军长征主脉延伸的一段支脉，无论从哪个方面说，都是不可否认的。这里要指出的是，将红军三大主力在1936年10月会师作为红军长征胜利结束的纪念日，与此不矛盾。因为那是标志性的，如同长征的历史起点以1934年10月一样。将1936年10月会师作为红军长征胜利结束的标志，并不是说红军长征到此就完全结束了。因此，西路军可视为红军长征的尾声。有序曲、有尾声，红军长征这个震天撼地、威武雄壮的大剧才算在历史上谢幕。

对于西路军问题怎么看，一直是党史、军史的热点和难点问题。我在

10年前集中走长征路时很想考察西路军的历程，直到2013年10月下旬才弥补了这个缺憾。我同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同志一起用10天时间沿西路军的行军和作战路线作了比较系统的考察，对过去不太清楚的问题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经过实地现场考察，我以为，对西路军问题要从两个层面来认识。这里讲四点看法。

首先，从战略层面来看西路军西进河西的决策。为什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会宁会师后要分兵西渡黄河呢？那时是为了实施宁夏战役。实施宁夏战役的核心是什么，过去不那么明确，这次清楚了。在上世纪30年代中期，苏联感受到德国和日本法西斯两个方面的战争压力，通过共产国际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决定从蒙古、宁夏方向给中国红军以物资援助。宁夏战役就是为了打通国际路线，获得苏联经蒙古运送的700吨军援物资。中国红军，无论是到达陕北的中央红军，还是在长征途中的四方面军和二方面军都极其困难，急需大量军事物资。在得到共产国际指示后，中央实施宁夏战役是可以理解的。从实施计划言，在靖远虎豹口西渡黄河，打通宁夏到内蒙古再去蒙古边境获取这批军火也有一定可行性。因此，中央决定组建西路红军去打通宁夏。但是，在1936年11月3日共产国际电告中共中央，军援物资改经霍尔果斯口岸从新疆方向运送，让红军到哈密去取1600吨军火后，无论是中央决定，还是西路军愿意再继续西进夺取河西走廊并建立根据地的这个战略决策，是很难实现的。其一，河西走廊是马家军的地盘，西路军通过它径去新疆，如像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借道粤北而不深入广东，与马家军达成这样的协议不是不可能的；但要在那里安营扎寨建立根据地，他绝不会容忍，会拼死争夺。其二，即使达成径去新疆的协议而去取了军火，但怎么运回千吨军火物资，也是难题。马家军决不会眼睁睁地看着这些军火物资通过它的地盘而不染指，世上还没有这样慈善的军阀。这就是说，即使径去新疆不会大打，但从新疆返回河西也必有生死决战。其三，河西走廊是千里荒漠大戈壁，没有高山密林之类的障碍物和回旋空间，利于马家军骑兵作战而不利于西路军，况且双方的兵力和装备悬殊，战斗力从总体上说不在一个等级上，尽管在局部战斗中能打些胜仗，但要根本打败马家军骑兵不那么容易。其四，这里物产本来就稀缺，再加上没有拥护红军的广泛群众基础，不用说建立根据地，就

是获得粮食等生活物资都很困难。在此长期作战，很难避免兵败河西这个结局。通过这次考察，我的初步结论是：从战略层面讲，红军西渡黄河前期实施宁夏战役还有可行性；在11月收到共产国际改由新疆方向取军援物资的指示电后，西路军再继续西进，夺取河西走廊并建立根据地的决策是脱离历史实际的。如果在得到共产国际电后命西路军早点返回，不再西进，损失肯定会小多了。只要坚持西进打通新疆，盘踞河西，即使在战术方面少犯错误，也很难从根本上改变大的结局。

其次，从一些重大方针问题和战术层面具体研究中央对西路军指示的是与非，研究西路军领导的作战部署的得与失，就总结经验教训进行历史反思而言，有重要历史价值。许多著述在这方面有很深入的研究，不必赘述。这里也讲四个问题：

(1) 关于建立根据地。有如上述，再补充几句。一方面，中央指示西路军在西进途中建立根据地，特别是在作战形势已很严峻的形势下还要建立临泽、高台根据地；另一方面，西路军主要领导也希望建立根据地后作为打通国际路线的战略后方，因而在西洞堡打胜仗后又重回倪家营子建立根据地。这样的决策无论当时有怎样的考虑，但历史结局证明是不适宜的。西路军领导对中央最初要求在河西创建根据地作为战略后方的指示有误读，以为中央意在将战略中心移至河西，因而在极端困难时还坚持创建根据地。但只要在河西建立根据地，马家军必聚集重兵围攻，将其消灭。因而，西路军血战高台和倪家营子必然遭受重大牺牲，这个结局很难避免。

(2) 关于前线指挥自主权。这也有两个方面。所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撇开这句古语的封建君权历史背景不言，就战争的统帅部与前线指挥员的关系来说，一是统帅部要放权授权前线指挥员根据战场形势决定战事部署；二是前线指挥员要有担当精神，根据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临机决断，灵活制敌。就这两方面来看，都有欠缺，不只是某一个方面的问题。我赞同这种看法：对于西路军作战的“自主权”问题，可以1937年1月24日军委主席团下达“你们的行动方针，以便利击敌、保存实力为目的，行动方向由你们自决”指示作为一个节点来分析。此前，延安方面没有给予西路军主要领导以这样明确、充分的“自主权”。这时明确这一点比较晚了。西安事变后不久，西路军在占领永昌后继续西进，马家军一路

穷追不舍，战争形势已转入被动。中央下达此指示时，高台已经失守，这是西路军开始下行的标志。当然这不是说中央此前的指示都是束缚前线指挥员的。逐一分析，许多指示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就西路军主要领导言，陈昌浩因犯过追随张国焘对抗中央的错误，自西进以来就有对中央指示不敢再“违抗”的思想包袱，不再从实际情况出发研究中央指示，也就不再履行“自主权”的责任。“1·24指示”以后，西路军的挫折和危局，就与中央给没给“自主权”无关了。应当指出的是，在明确“自主权”后，陈昌浩又为西洞堡战斗的胜利而头脑膨胀，不顾徐向前的坚决反对，作出了重返倪家营子的致命错误决策。这说明对“自主权”也有如何使用问题。只有正确使用“自主权”，才能取得战争胜利。

(3) 关于作战部署的指导方针。在战术层面上，西路军领导在最初有轻敌思想，其潜意识是长征转战那么困难都经历过，挺进河西打马家军算什么？再加上地势狭长、堡寨稀疏，因而在作战部署上没能牢固树立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思想，比较多的是采用“分兵进击”“分兵攻防”战术，特别是在夺取重要城镇和堡寨后拼命固守，以便建立根据地。由于兵力有限，防守要点也只能分兵。这样，阵地防御战成了主要作战形式。这就没能充分发扬我军擅长运动战克敌制胜的长处。中央对此有多次指示乃至批评，但这种状况在需要改变时没有明显改变。同时，由于敌强我弱、敌多我寡这一基本格局，就难免给敌人攻打我固守的要点以各个击破之机，使我军陷入被动挨打处境。红九军兵败古浪，红五军喋血高台，都与此有关。后来在西洞堡打的胜仗正是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结果。但为时已晚，主力消耗过多，无力挽回败局。

(4) 关于战胜极端困难的指导思想。自力更生，主要依靠自己力量战胜各种困难，这是我军能够取胜的一个重要法宝。但是从命西路军进抵河西，去新疆取军火这一决策来看，对获得这批军火抱有过多希望，对后来变数考虑欠周。事实上，直至西路军完全失败，李先念率400多人到达新疆后没有得到一吨军火。这个“水中月”招致两万多西路军健儿血洒河西的教训值得深刻总结。从西路军主要负责人来说，他们率部进军河西不久后就表现出缺乏依靠自己力量战胜一切困难的坚定信念，将希望寄托在外力援助上的思想非常强烈。1936年11月21日，他们夺取永昌后就提出：

希望“国际接济先期或按时到达”，无论如何要将“皮衣、子弹送来”；在形势逆转不利时，甚至希望“远方、新疆方面应援”。这都不切实际。因为“远方、新疆方面”，从未承诺过将军援物资运往甘肃，也不可能先期将“皮衣、子弹送来”。他们还多次建议河东主力西进，到1937年3月初围困祁连山下时还急电中央，“恳望援军星夜奔来，或以更迅速而有效的办法灭马敌”。此电说明西路军处境危险之极，是求生的呼唤。但红军主力不可能渡河西进，中央已成立的援西军也不可能立马赶到解除危急困境，以最快速度计，至少也需30天。而西路军在发出求救电后6天就再也坚持不住了，最后只能突围南进祁连山里。这个教训极为惨痛。

第三，应充分肯定西路军的历史功绩。西路军虽然失败了，但它的历史地位和功绩应充分肯定。具体来说，有这么几点：一是消灭了马家军25000余人。马家军参加作战的有9个旅3万余人，还有民团9万余人。敌军的这个损失是沉重的。二是牵制蒋军，策应了河东的红军作战和国内政局的变化。山城堡战役是在西路军向河西走廊进军之后展开的，它吸引了蒋军数万人进入河西，为山城堡战役歼灭胡宗南一部以难得之机。西安事变爆发后，西路军在河西的浴血奋战牵制了蒋军10余万人，中央令西路军东返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起了积极的配合作用。三是第一次在河西走廊建立了党的地方组织和苏维埃政权等革命团体，至少有3个县委、26个县级及其以下的苏维埃政权，扩大了共产党和红军的影响。四是保存和培养了部分军事骨干。经过党的营救，西路军失散和被俘将士的百折不挠的奋斗，有5000多人回到了党的队伍，成为党和人民军队的骨干。特别是到达新疆的400多名将士，经过培训，初步掌握航空、无线电通讯、装甲、汽车、炮兵等技术，为我军技术兵种的建立打下了基础。

最后，应高度评价西路军的革命精神。在对西路军现场考察时，听到西路军失散人员的幸存者、帮助过西路军的农牧民后代，还有省、市、县各级党史工作者讲了西路军的很多事迹，诸如广大指战员怎样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不畏艰险的英雄主义气概和坚持革命的英勇献身精神，失散人员和被俘将士坚持革命、受尽折磨的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等等，无不催人泪下。红五军军长董振堂奉命率2000多人孤守高台，无电台与总部联络，最后几乎全部战死。在敌军冲上城楼后，他还高喊：共产党员们，干

部们，敌人上来了，为了民族和人民的解放，我们要血战到底！他本人壮烈牺牲后被敌人砍下头颅悬挂城门示众。红九军军长孙玉清在古浪之战后被免职，董振堂牺牲后接任红五军军长，西路军分散游击后在酒泉南山被俘。他被押往西宁，鼓励被俘将士勇敢斗争，本人拒绝投降而被杀害。西路军妇女先锋团团团长王泉媛，我于2003年12月初到江西吉安泰和县城她的家里作过访问。先锋团有1300多名红军女战士，在作战中英勇顽强，遭受巨大牺牲，最后结局更为悲壮惨烈。她本人于1937年4月被捕，在狱中惨遭毒打，备受折磨和凌辱。但她坚贞不屈地说：活着要做共产党的人，死了要做共产党的鬼。她在西路军女战士中很有影响。西路军主要领导尽管有决策失误，但其革命精神也是高昂的。他们在最后几天电告中央说：我们无日无夜不战，弹药几尽，抱全部牺牲决心，在此战至最后一滴血。这也代表了西路军全体指战员在危急时刻视死如归的决心。

西路军出征时总人数为21800余人；战死者约7000余人；被俘后遭残酷杀害者约5600人；被营救返回延安者约4700人；失散流落在沿途的约4500人。最后仅存的左支队800人在李先念率领下，历经40余天，走出冰天雪地、没有人烟的祁连山，经过安西地区4场血战后，幸存的437人于4月底5月初到达星星峡，与前来接应的陈云、滕代远等相会。谁也未曾想到，西路军打通新疆的使命以这样的方式完结。

三、万古长存的红军长征精神

这些年来，中央一直重视宣传红军长征精神，并不断对它的内涵进行概括。1996年10月22日，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大会上，江泽民代表中央讲话，对长征精神作了进一步升华。他讲了红军长征精神的五个方面，即：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这个内涵非常丰富，上述西路军的革命精神也包括其中。当然，每个人对这个内涵都会有

自己的理解和感受。这里，根据我走长征路的体验和采访一些老红军的认识，对此作点解读。

（一）对革命的无限忠诚和对党的坚定信念，是红军长征精神的根本要义。前已指出，红军长征，首先是革命与反革命两种力量、光明与黑暗两种命运的大搏斗。在这场惊心动魄的搏击中，共产党内部的指导思想也有尖锐斗争。同时，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使红军一再面临着克服艰难险阻、经受饥寒伤病折磨的严重考验。红军长征，既要同围追堵截的几十万国民党军浴血奋战，又要与党内的错误思想展开斗争，还要克服无数道大川高山天然屏障的阻隔困厄，特别是爬雪山过草地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造成的那种世所罕见的艰难困苦。广大红军将士靠什么来战胜敌人、克服险阻、度过艰难？首要的一条就是对革命事业的无比忠诚和对党能够领导革命胜利的坚定信念。这是战胜敌人克服险阻、度过艰难的原动力，是派生长征精神其他要义的初始源泉，因而也可以说是整个长征精神的精神之源。2013年五四青年节时，习近平同志参加“实现中国梦、青春勇担当”主题团日活动，讲“理想指引人生方向，信念决定事业成败”。这一论断正是根植于对中国革命经验的认识。中国革命能取得胜利，从思想意识层面上讲，理想信念起了决定性作用，因为它是一切精神动力之源。

（二）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是红军长征伟大精神的集中体现。这是红军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基于理想、信念所铸成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和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有了这种精神状态，在正确思想路线的指导下，长征就能取得胜利。没有这种精神状态，长征不可能取得胜利，西路军的悲壮历程就不可能那样感天动地，也就没有整个长征精神。各路红军都遭受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与数倍于己的敌人进行过生死决战，尽管有巨大牺牲，但最后都摆脱了敌人的围堵。红一、二、四方面军都过了雪山草地，特别是红四方面军和编入其序列的原红一方面军部分指战员，有的是三次走雪山草地，每次都有不少同志长眠在那里，但幸存者都胜利地到了陕北，还有不少老红军活到今天。我问过一些老红军：你们在与敌人作战时，在过雪山草地时，想没有想过生死问题？他们回答说：在那种特殊环境下，早将生死置之度外。我们参加红军，最初是为了找条活路，以后受教育才懂得革命道理。我们现在吃苦，是为了子孙后代不再吃

苦。我们牺牲了，是为了解放天下穷苦人，这种牺牲值得。因此，打仗个个奋勇争先，不怕死。毛主席讲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当时就是这么做的。我们长征就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进行曲。

（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是红军长征精神得以发挥的正确指南。对革命的忠诚和对党的坚信，不怕艰难困苦和流血牺牲的这种精神，是红军将士作为革命军人的基本素质。仅有这种精神，并不能使革命取得胜利。在错误路线指导下，红军将士并不知道其错误，也能发挥这种精神，并能谱写出天惊地撼的英雄史诗，如湘江之战但是其结局是异常惨烈的。只有在正确的路线和战略战术的指导下，上述那种精神才能结出灿烂之果，引导革命取得胜利。因此，这是红军长征精神的题中应有之义。红军长征能够胜利会师陕北，找到开辟新局面的落脚点，要归功于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实际核心领导地位，从而红军长征才有了一套正确的思想路线、军事路线和战略战术，使红军最终摆脱几十万国民党军的前堵后追，变被动为主动，指战员的战斗力能得到充分发挥，仗打得虎虎有生气，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四）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互助友爱的高尚品德，是红军长征精神转化成凝聚力、战斗力的一个重要条件。红军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革命军队。这支军队与其他军队的重要区别在于它有严格的组织纪律性，能够顾全大局，服从整体利益，紧密团结，互助友爱。因而它具有其他军队所没有的巨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长征是四支军队先后进行的。这几支军队怎样互相接应、互相配合、互相支援，在整个长征途中的始发阶段和最后会师阶段表现得非常突出。没有这一点，就不可能取得红军长征的伟大胜利。当然，其间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由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致使红四方面军一度南下，不仅影响了中央的战略部署，而且红四方面军本身也受到很大损失。但是，由于以毛泽东为实际核心的党中央正确地把握了党内斗争原则，还有其他方面的努力，张国焘不得不回师北上，最后实现了三个方面红军的大会师，宣告长征胜利结束。再则，从广大红军将士来看，在整个长征途中，特别是在遇到艰难险阻，比如过雪山草地的过程中，这种团结互助、为了援救同志宁可牺牲自己的崇高品德，也表现得十分突出。这充分表现出红军的无私无我的阶级友爱。

(五) 紧紧依靠人民群众, 获得人民群众的支援与帮助, 是红军长征精神形成的重要外部条件。红军是人民的军队, 红军脱离了人民就无法生存, 红军进行长征也是如此。没有粮食, 没有必要的物资, 任何精神力量都难以发挥。红军在离开中央苏区踏上长征旅途时, 苏区人民给予红军巨大的支援。红军经过雪山草地, 很好地执行了民族政策和军队纪律, 得到少数民族群众的支持, 从而得以征服长征途中的艰难险阻。因此, 将“紧紧依靠人民群众, 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 作为长征精神的一个内容, 是完全必要的。

红军长征已成历史, 但红军长征精神是永存的。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创造的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史诗, 是党的 90 多年波澜壮阔历史中最惊心动魄、也最精彩感人的篇章。红军长征精神包括西路军将士的革命精神在内, 是中国共产党人先进性之魂的集中反映, 是中华民族精神之魂的最高体现, 因而也是我们党取之不竭的宝贵的精神资源。这种精神, 无论岁月如何更替, 条件如何变化, 都要发扬光大。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是正在进行的新长征, 尽管已取得很大成就, 但仍不过是新的万里长征第一步。因此, 仍需要弘扬红军长征精神, 使新的万里长征发出更加灿烂的光辉。

《苏区研究》, 2015 年第 1 期

论长征和长征精神

李洪峰

今年，2016年，是长征胜利80周年。

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9月23日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参观“英雄史诗 不朽丰碑——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主题展览”时强调，“红军长征胜利，充分展现了革命理想的伟大精神力量”，“我们要铭记红军丰功伟绩，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继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指明了方向。

一、长征创造了历史

长征是中国革命的百科全书。关于长征，我们党的最经典论述和最形象叙述，是由毛泽东完成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是毛泽东在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仅两个多月，1935年12月27日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所作的报告。这也是毛泽东在长征之后的第一篇文章。毛泽东这个报告是在1935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之后作的。就在这次政治局全会上，中央提出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先锋队，也是全民族的先锋队的重大论断。这也是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提出“两个先锋队”思想的历史源头。“这一次政治局会议批评了党内那种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和中国工人农民联合抗日的错误观点，决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是一次极关重要的会议。”毛泽东的这篇报告，虽然主题叫《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但报告阐述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对于党和红军乃至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命运来说，是有深远战略意义的。

就在这篇报告中，毛泽东讲到了长征。这是毛泽东关于长征的最完整论述。一般地说，诗用形象思维，理论文章用逻辑思维，而在毛泽东这里，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是贯通的。

毛泽东说，“讲到长征，请问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说，长征是历史记录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毛泽东首先把长征放到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中作比较。他说：“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个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没有，从来没有的。”需要说明的是，毛泽东这里只是讲的中央红军，而现在我们讲长征，是包括红军三大主力在内的。具体情况是，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战略转移。11月，红二十五军撤出鄂豫皖苏区，进行战略转移。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和川陕苏区党政机关撤离苏区开始长征。同年11月，红二、红六军团撤离湘鄂川黔苏区向西转移。据统计，红军各路部队的长征，共历时两年时间，行程六万五千余里，纵横十四个省。

毛泽东在当时只能做历史比较，不可能也没必要做国际比较。后来有的外国朋友把长征比作《圣经》中古犹太人出埃及，比作汉尼拔挥师跨越阿尔卑斯山，比作拿破仑从莫斯科撤退，比作希腊远征波斯后的色诺芬大撤退。但比较来比较去，他们认为这些人类的远征都不能与中国长征相提并论。埃德加·斯诺说，长征在人类历史上是无与伦比的，是一次震撼世界的行军。2000年，美国《时代》周刊把长征评选为一千年来影响世界的大事之一。

长征创造了历史，也创造了毛泽东长征诗词。毛泽东是伟大的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也是伟大的诗人。史诗般的长征和史诗般的毛泽东诗词相映生辉。长征期间，由于恶劣的环境所迫，毛泽东没有办法写文章。但是革命不幸诗人幸。艰苦卓绝、九死一生、跌宕起伏、千回百折的长征，极大地激发、碰撞了毛泽东的澎湃诗情。长征期间，从1934年10月到1936年10月，两年时间里，毛泽东写下了九首诗词。其中，《七律·长征》《念奴娇·昆仑》《沁园春·雪》则是毛泽东诗词的巅峰之作。我曾经

写过一幅联语：“史坛千秋两司马，词苑万古一毛公。”毛泽东诗词超绝古今，独步天下，开创了中华一代新诗风。其格局之大、襟怀之大、气魄之大，为古今中外所绝无仅有。毛泽东一生喜欢挑战，一生充满激情。他喜欢山、喜欢水、喜欢雪、喜欢梅花，他酷爱读书，尤其喜读历史和玩味记诵中国古典诗词，这些在毛泽东诗词中都有很自然的表现。大概由于长征主要是同山打交道的缘故，毛泽东这九首诗词几乎无一例外地写到了山，“苍山如海，残阳如血”是写山，《十六字令三首》是写山，“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是写山，“山高路远坑深”是写山，“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是写山，“横空出世，莽昆仑”是写山，“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是写山。《十六字令》是词牌中的小品，但这样的词牌也丝毫不能束缚毛泽东的如椽巨笔。毛泽东写道，“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山，倒海翻江卷巨澜。奔腾急，万马战犹酣。”“山，刺破青天锷未残。天欲堕，赖以拄其间。”虽然只有48个字，但在毛泽东的笔下，却绘就了如此波澜壮阔的壮丽画卷！这是跨越万水千山的英雄气概和冲天豪情，这是把一切困难踩在脚下的钢铁意志和乐观自信，这是迎接革命曙光的必胜信念和坚强决心。毛泽东诗词感染和激励了中国和世界的千千万万人、世世代代人。而毛泽东革命家的百折不挠、战略家的高瞻远瞩、理论家的博大精深和他作为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的历史视野和世界眼光，都在他的诗词中得到了完美体现。周恩来毕生喜爱毛泽东诗词，在二十六年总理生涯中，他散步的习惯就是背诵毛泽东诗词。由此，我联想到周恩来的工作精神和生命态度。一位外国友人曾经向周恩来总理请教养生之道。周恩来说，“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无数革命先烈牺牲了他们的宝贵生命，每当想起他们，我就加倍努力地工作。如果说养生之道，这就是我的养生之道。”毛泽东和周恩来是长征和中国革命贡献给中国的两位历史巨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他们的革命风范、伟大人格和高尚情操，永远值得学习。

二、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精神的胜利

毛泽东说，“长征又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

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

长征是由第五次反“围剿”全局性失败而不得不进行的战略退却开始的。著名英国传记作家、历史学家菲利普·肖特在1999年出版的《毛泽东传》中写道：“1934年10月，当蒋介石的部队为了扼杀他们而推进包围圈时，共产党领导内部在极其痛苦地争论了几个月之后，红军放弃了他们的根据地，开始绝望的冒险，以避免全面的失败。他们穿越中国两万五千里的艰苦跋涉，后来被赞美为‘长征’，这是逆境中的胆量、无私的纪律和不屈不挠的意志的史诗般的标志。那时候，这件事被说得更富有新意，称为‘战略大转移’，不久又说是向西部进军。至于当时的计划就是一个，向湖南西北前进。因为在那里，当地的军阀一直提防蒋介石的野心，不愿与蒋介石合作，红军到那可与另一股共产党的力量会合，创造一个新的中央红色根据地，以代替他们正在丧失的这一个。”这个叙述是大体客观的。战略退却不是胜利进军，这是一场革命与反革命的殊死斗争，胜负生死未卜、前途命运未卜。

但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精神的胜利。红军出发时，总人数约20万人，最后到达陕北时，只剩下不足5万人，牺牲15万人，平均四个人只有一个人到达陕北。牺牲最大的中央红军，出发时8.6万人，只有不到7000人到达陕北，平均十二个人就有十一个牺牲，而这批人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儿女。当时红军指挥员平均年龄不足25岁，战斗员平均年龄只有20岁。就是这样的一支正处在豆蔻年华的年轻队伍，在不到两年时间里，与敌人进行了600余次重要战役战斗，几乎每天都有一场遭遇战，而每前进300米就有一名红军献出他们宝贵的生命。长征中，红军先后跨越近百条江河，征服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

聂荣臻元帅生前回忆，红军打仗打的是干部，打的是党团员，每一仗下来，党团员伤亡数量常常占到总数的四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红军将士不知道战略转移何时结束，也不知道自己的生命止步何处，但他们坚定地跟党走，用生命和鲜血写出了不朽的精神传奇。

长征中，贺龙部队里担任师长的贺炳炎一条胳膊被打断了，半个身子被鲜血染红。他挺到了战斗结束，因为流血过多而昏迷。在一个小村子的打麦场上，卫生员抬了个大凳子，用绳子把贺炳炎捆在凳子上，什么麻药都没有，医生硬是踩着他的身子，用锯木头的锯子给他截了肢。在场的贺龙从凳子底下一摊脓血里扒拉出来一些东西。后来做战斗动员时，贺龙从怀里掏出手绢打开说，“同志们，这是你们师长的骨头渣。”这样的故事在长征中很多，几乎每个部队里都有。

美国著名记者、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1984年以76岁高龄、多病之躯，历时两个多月，跨越7个省，行程约1.2万公里，第一次完整地沿着红军长征路线进行了深度访问。通过访问，索尔兹伯里认为：“本世纪中没有什么比长征更令人神往和更为深远地影响世界前途的事件了。”对于红军为什么胜利，访问初期，他认为红军将领太能干，而国民党将领太腐败；访问中期，他认为红军的胜利因素很多，理想、智慧、政策、团结、纪律等皆转化为战斗力，“有信念的部队战无不胜”；访问后期，他明白了中国一句古话“兵之胜败，本在于政”的道理。索尔兹伯里动情地说：“阅读长征的故事，将会使人再次认识到，人类的精神一旦唤起，其威力是无穷无尽的。”

三、长征的胜利是人民的胜利

毛泽东说，“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从根本上说，长征的胜利是动员人民、依靠人民的结果，长征的胜利是人民的胜利。

长征中，红军做了第一等、第一流的民族工作、群众工作。红军曾经过苗、瑶、壮、侗、土家、水、黎、布依、仡佬、纳西、彝、藏、白、羌、回、东乡、裕固等十多个少数民族聚居区或杂居区，占红军长征经过地区的50%以上。红军经过少数民族地区时，积极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和红军

的纪律，提倡民族平等，反对民族压迫，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支持和帮助少数民族开展对反动政权的经济和政治斗争，帮助少数民族建立武装和人民政权，一路上留下了许多红军与少数民族团结互助的动人故事。经过彝族地区时，刘伯承与沽基部族首领小叶丹歃血盟誓，结拜为兄弟，团结了彝族上层人士，留下了彝海结盟的佳话。红军进入藏族聚居区后，中共中央发布《告康藏西番民众书》和《西藏民族革命运动的斗争纲领》，得到藏民的热烈拥护。哈达铺是红军进入甘肃遇到的第一个较大的镇子，回民占人口半数以上。红军秋毫无犯，严守群众纪律，赢得回族群众热烈欢迎。离开时把借用的东西照样归还，把地面打扫干净，向主人再三道谢，与人民群众建立起血肉相连、生死相依的关系。

红军的宣传工作、教育工作在长征中也没有丝毫放松。毛泽东早在1929年12月就指出：“红军宣传工作的任务，就是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由这个宣传任务之实现，才可以实现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政权，消灭反动势力，促进革命高潮等红军的总任务。所以红军的宣传工作是红军第一个重大的工作。若忽视这个工作，就是放弃了红军的主要任务，实际就等于帮助统治阶级削弱红军的实力。”1935年1月，中央红军攻占遵义城后，立即印发了《中共中央告民众书》《出路在哪里》等说明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主张。1935年5月，中央红军进入彝族聚居区时，张贴了《中国工农红军布告》，由红军总司令朱德签署发布。在有条件的地方，红军还采取多种形式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

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红军的报纸仍然办得有声有色。红军长征期间创办有多种报纸。《红星》报是中共中央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唯一报纸，由红军总政治部负责编辑出版。遵义会议前由邓小平负责编辑，遵义会议后由陆定一负责编辑。《红星》报不定期出版。最长15天出一期，最短2天出一期，4开报纸，长征中多数是每期两版。长征途中《红星》报工作人员，用两副扁担挑着4个铁皮箱子，跟随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昼夜行军。箱子里装着办报的全部设备。稿件边走边构思，休息时赶紧动笔写稿，宿营时马上打开箱子刻写、油印，4个铁皮箱子就是办公桌。每期印700份至800份，发至连队。《红星》报的社论和理论文章，大部分由党和红军的领导人撰写。写得最多的是周恩来，其次是博古、陈云、彭德怀、

聂荣臻、王稼祥、张闻天等，起到了很好的宣传鼓动效果。

尤其令人欣喜的，长征中各路红军都拥有一支鲜为人知的，在世界军事史上罕见的流动学校。如中央红军的干部团、通信学校和卫生学校；红二、红四方面军的红军大学、供给学校和步兵学校等。根据斗争需要，学校的组织形式几经变化，但红军学校的性质和宗旨并没有变化。它既是专门培养人才的场所，又是战斗队、工作队和宣传队、播种机，还是储备干部的战略预备队，在长征中发挥了极为重要和特殊的作用。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后，这些红军学校为抗日军政大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四、长征胜利最根本最宝贵的经验

毛泽东说，“长征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是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

长征中，党虽然遭受严重挫折，但更加坚强、更加正确了；红军虽然遭受重大损失，但更加统一、更加不可战胜了。正如中共中央在庆祝三大主力红军会师的通电中所说的那样：“我们的这一在抗日前进阵地的会合，证明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盗侵略是快要受到我们全民族最坚强的抗日先锋队的打击了，证明中国民族抗日统一战线与抗日联军是有了坚强的支柱了。证明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全国同胞是有了团结御侮的核心了，证明正在抗日前线的爱国工人、爱国农民、爱国学生、爱国军人、爱国记者、爱国商人，英勇的东北义勇军以及一切爱国志士是有了援助者与领导者了。”周恩来后来讲到长征时说过：“我们红军像经过了一场暴风雨的大树一样，虽然失去了一些枝叶，但保存下了树身和树根。”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长征，战胜了蒋介石围追堵截、张国焘分裂危险、人类生存极限的三重挑战，取得了战略转移、战略转变、战略转折的三大胜利。实现了中国革命根据地从东南到西北的战略转移，延安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实现了从国内革命战争向民族解放战争的战略转变；实现了中国革命从挫折到胜利的战略转折。

这三大胜利，具有决定意义的是战略转折。1935年1月，长征途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长

达四年的统治，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从而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重大问题的重要会议，是中国共产党政治上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我党终于在土地革命战争的最后时期，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和全党的领导。这是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的最大成就，是中国人民获得解放的最大保证。”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一九三五年一月党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且在这以后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长征开始前，中国共产党已走过了13年的历程，但作为一个年轻的党，却一直没有形成自己坚强的领导核心。长征的斗争和磨难，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熟提供了历史机遇，也为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在政治上、干部上、精神上准备了最重要的条件。而其中最根本的是，长征使中国共产党找到了自己的领袖，形成了自己的领导核心。正如曾重走长征路试图发现其中奥秘的著名美国战略家布热津斯基说的那样：“长征的意义绝不只是一部无可匹敌的英雄主义史诗，它的意义要深刻得多。”

历史和实践已经反复证明、充分证明，我们党找到并形成自己的领导核心并不容易。而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这是长征留给我们党的最根本、最宝贵的历史经验。对于这个带根本性的问题，邓小平曾经联系党的历史深刻阐述过。正是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在毛泽东的旗帜下，我们党创造性地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创造性地建设了一个用科学理论和革命精神武装起来的、同人民群众有着血肉联系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创造性地缔造了一支具有一往无前精神、能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的新型人民军队；创造性地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

社会主义新中国；创造性地探索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实践，为我们党和人民的事业胜利发展、为中华民族阔步赶上时代发展潮流创造了根本前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创造性地发扬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培育了革命和拼命、严守纪律和自我牺牲、大公无私和先人后己、压倒一切敌人、压倒一切困难、坚持革命乐观主义、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伟大中国革命精神，使中华民族从根本上改变了东亚病夫、一盘散沙、精神萎靡的形象，在政治上、精神上站立起来，以崭新的精神风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五、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

长征已经过去了80周年。长征创造了历史，历史也在不断地塑造长征。长征永远不会被遗忘，长征精神也永远不会过时。因为历史总是要前进的，历史从不等待一切犹豫者、观望者、懈怠者、软弱者，只有与历史同步伐、与时代同命运的人，才能赢得光明的未来。今天，面对新的历史条件和新的历史任务，面对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我们仍然需要时时回望长征，仍然需要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

第一，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必须始终高扬理想信念的旗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扬党的理想信念旗帜是根本。我们干事业不能忘本忘祖、忘记初心。我们共产党人的本，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对党和人民的忠诚。我们要固的本，就是坚定这份信仰、坚定这份信念、坚定这份忠诚。世界社会主义实践的曲折历程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政党一旦放弃马克思主义信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信念，就会土崩瓦解。共产党人如果没有信仰、没有理想，或信仰、理想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就必然导致政治上变质、经济上贪婪、道德上堕落、生活上腐化。在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上，全党一定要保持清醒头脑。”革命理想高于天。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和革命精神的武装，没有坚如磐石的政治信仰，就没有长征的坚持和胜利。我们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是一个连绵不断的历史进程，而理想信念是贯穿其中的灵魂和主线。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

本色，团结和凝聚全党，实现我们党战略目标，必须不断坚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奋斗终身的信念、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的信念、对马克思主义真理不懈追求的信念。领导干部为全党做表率，首先要在坚定理想信念上做表率。共产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树立先锋形象，首先要在坚定理想信念上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树立先锋形象。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必须坚定不移地高扬理想信念的旗帜，不折不扣地解决好理想信念问题。高扬理想信念的旗帜，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它集中体现在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这“四个自信”上。这“四个自信”，根本是道路自信，基础是文化自信。在当代中国，只有把“四个自信”的根基打牢了，才能从根本上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才能从根本上巩固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政治基础，我们党才能真正承担起历史和人民赋予的伟大责任。

第二，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必须时刻同精神懈怠的危险作斗争。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我们党已经走过了95年的历程，但我们要永远保持建党时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永远保持对人民的赤子之心。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面向未来，面对挑战，全党同志一定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这“一个不忘初心”“两个永远保持”“三个不能忘记”，语重心长，讲得多么好啊！

中国共产党是富有革命精神的伟大政党。我们党的精神成长，同我们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是紧密结合、相辅相成的。而迎着困难前进，在战胜困难中实现和完成自己的精神成长，是我们党的突出特点和重要经验。长征，是中国革命的一座伟大丰碑，也是中国革命精神乃至人类精神的一座伟大丰碑。长征挺起了中国人的精神脊梁。长征锻造了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积极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

难与共，艰苦奋斗的伟大长征精神，永远是鼓舞全国人民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我们要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全面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和巩固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既有坚实基础和许多有利条件，但也面临重大挑战、重大风险、重大阻力和重大矛盾。这就是困难。这些困难，同过去我们党曾经战胜和克服的困难相比，有许多共同点。但就其任务的艰巨程度、面临的国内国际环境的复杂程度和斗争的长期严峻程度来说，则是前所未有的。我们决不能有丝毫的故步自封，决不能有丝毫的贪图安逸，决不能有丝毫的骄傲自满，决不能有丝毫的掉以轻心。全党必须时时同精神懈怠的危险作斗争！要抓住纪念建党95周年和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的重大契机，大力弘扬包括伟大长征精神在内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使全党重新唤起和始终保持革命战争年代那样一股劲，那样一种拼命精神，走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的长征路。

第三，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必须永怀对人民的赤子之心。

中国共产党是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诞生的。共产党的初心，是救国家于危难，救人民于水火。长征的胜利，是党的胜利，也是人民的胜利。在那样艰难困苦的条件下，红军能够取得胜利，没有党的领导不行，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帮助和保护更不行。毛泽东后来讲兵民是胜利之本，讲人民群众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是包含着井冈山时期、长征时期刻骨铭心的血的经验教训在里面的。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根本工作路线，是党的根本宗旨三位一体的科学内涵，是我们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始终立于不败之地、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根本政治优势。但是，必须看到，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四大考验”时时进行，“四种危险”天天发生，而这种考验和危险，最大和最集中的表现就是能不能实现好、发展好、维护好人民利益。我们党执政近70年、实行改革开放近40年的实践证明，执政党面临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人民群众之所以对腐败深恶痛绝，归根到底，是因为腐败伤害人

民利益。除此以外，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执行中的偏差，国家法律法规制度的不完善，党和政府工作中的失误，干部作风上的问题，也都可能导致损害群众利益问题的发生。在现实生活中，也有种种复杂情况，群众的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这部分群众利益同那部分群众利益，也可能发生矛盾。这些情况说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权益、政治权益、文化权益、社会权益、生态权益等基本权益，仍然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主题，也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法治中国的题中应有之义，一切党政机关、党政干部，都要摆正自己同人民群众的关系，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都要充分尊重人民所表达的意愿、所创造的经验、所拥有的权利、所发挥的作用，都要珍惜和用好人民给予的权力，决不允许假公济私，公权私用，以权谋私。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底线思维。共产党执政的底线就是人心向背。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一定要念兹在兹，把党的根本宗旨落实到每个党员、干部的行动上，贯彻到我们党治国理政的全部活动中，使我们党永远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拥护。

第四，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必须切实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

要坚持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毛泽东讲过，红军之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败，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长征中我们党之所以能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逃跑主义，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党指挥枪的根本原则，坚持民主集中制的集体领导，是一个根本原因。1938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尖锐指出：“鉴于张国焘严重地破坏纪律的行为，必须重申党的纪律：（一）个人服从组织；（二）少数服从多数；（三）下级服从上级；（四）全党服从中央。谁破坏了这些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这“四个服从”，是党的纪律的核心内容，也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核心内容。当前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首先要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要认真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这一条至关重要。我们党95年走过来，一靠理想，二靠纪律。党的纪律是党的生命。要严格遵守党的纪律特别是政治纪律政治规矩，党内决不允许搞小圈子、决不允许搞团团伙伙。要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的立场、观点、方法。这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和根本法宝。长征中毛泽东运用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正确解决红军

的落脚方位、组织领导、军事指挥等重大问题，取得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等作战的重大胜利，创造了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争奇观，既源于他高超的战略智慧、军事智慧和政治智慧，更源于他实事求是的革命胆略。我们党过去靠实事求是吃饭，现在靠实事求是吃饭，将来也要靠实事求是吃饭。只有坚持实事求是，才能化解难题，迎接挑战，把握主动。任何对实际和形势的误判，都会造成政策和决策的失误。坚持实事求是，必然要求解放思想。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是内在统一的。要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深入研究我们面临的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社会的、生态的、军事的；国内的、国际的根本问题、重大问题、紧迫问题，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中扎实提高我们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要提高战略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底线思维水平。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也是做好各方面工作的现实需要。讲与时俱进，思维方式、思想方法的进步是重要的与时俱进。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特别要重视加强和改善党和国家的基层、基础工作，特别是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忘掉农村、不能忘掉农民，要正视并解决好极少数基层党组织、基层政权软弱涣散甚至被黑恶势力把持的问题，确保农村阵地牢牢掌握在党和人民手中。全党要继续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和提高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各项决策和部署上来，统一和提高到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上来，极大地调动起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始终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努力奋斗！

《党建》，2016年第10期

长征精神：中国共产党人的红色基因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指出，红军长征是20世纪最能影响世界前途的重要事件之一，是充满理想和献身精神、用意志和勇气谱写的人类史诗。长征这一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留给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伟大长征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红色基因和精神族谱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和灵魂，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丰富滋养，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

1. 革命理想高于天。长征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人理想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人信念的胜利。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革命道路是极端艰难困苦、曲折复杂的，但革命的正义性和人民性决定革命的胜利是必然的。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时，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红军以非凡的智慧和无所畏惧的英雄气概，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实现北上抗日的战略转移，在延安建立牢固的革命根据地，并义无反顾地奔赴前线，投身抗日战争的洪流。在风雨如磐的长征路上，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激励和指引着红军一路向前。正是靠着始终坚定执着的理想信念，中国革命走出困境、开创新局；也正是靠着始终闪耀着火热光芒的理想信念，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华民族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中流砥柱。

革命理想信念蕴涵着救国救民的真理、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指明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进步的道路与方向。革命越是艰难，坚定革

革命理想信念则愈加彰显信仰和精神的力量。正是胸怀崇高而伟大的革命理想信念，红军指战员即使在长征的行军途中也不忘学习文化。老红军王定国回忆说，当时，在长征的队伍中，走在前面不少战士的背上都写着字，而且每个人的字都不一样，这样可以一边行军，一边学文化。因为，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

革命理想信念是红军指战员坚不可摧的精神支柱，铸造了红军指战员高尚的思想境界、坚强的意志品质和坚忍不拔的战斗精神。张闻天在1938年4月12日发表的《论青年的修养》一文中分析长征胜利的原因时说：“中国共产党在这次长征中充分的表现出了它为了自己的理想而牺牲奋斗与坚持到底的精神。”不然，长征这一人间奇迹是不可能创造出来的，也是不可以想象的。

2. 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长征这一惊天动地的革命壮举，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中指出：“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中国共产党，它的领导机关，它的干部，它的党员，是不怕任何艰难困苦的。谁怀疑我们领导革命战争的能力，谁就会陷进机会主义的泥坑里去。”在长征中，中国共产党从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成熟起来，并开始独立自主地解决自身和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

长征坚持党的领导，克服了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左”倾路线错误，在遵义会议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这“是中共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并且在这以后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随着长征的胜利，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就开始了。面对中国人民、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抗日民族革命战线。

长征坚持党的领导，践行党的群众观点，紧紧依靠和组织人民群众。

长征二万五千里，纵横十一个省。红军在长征中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维护群众利益，为群众办事，帮助劳苦大众翻身解放，同时向群众广泛宣传革命道理，宣传“红军是共产党的军队”“共产党是为劳苦大众谋利益的党”等。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长征是“宣言书”“宣传队”和“播种机”，“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在少数民族地区，红军坚持党的民族平等政策，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加强民族团结。如刘伯承与彝族首领小叶丹歃血盟誓结为兄弟；又如在四川甘孜建立了革命政权“博巴政府”，成为其后民族区域自治的雏形。红军在长征途中一次次遇到险境，都是在群众的支持和帮助下脱离的。人民群众是长征胜利的坚强后盾，群众路线是长征胜利的生命线。

3. 发扬艰苦奋斗精神。伟大的长征是中华民族艰苦奋斗传统美德的一种生动写照，并且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红军指战员之所以能够克服千难万险，长征之所以能够胜利，既靠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和革命必胜的信念，又靠艰苦奋斗精神和一往无前、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革命理想与艰苦奋斗精神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转化并形成红军指战员发扬艰苦奋斗精神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漫漫长征，万水千山，千难万险，危机重重。红军指战员既身处国民党数倍于我的兵力的围追堵截，又要经受恶劣自然环境的严峻考验；既面临正确与错误路线的斗争，又面临团结与分裂的斗争。老红军王诚汉回忆说，长征最大的特点“就是打仗、走路”，“最让人心中没底的是不知道今天夜宿何地”。饥饿也是长征的大敌，毛泽东说：“红军长征过草地的时候，有五十天没有饭吃，吃树皮，这只有共产党能做到，别人是做不到的。”由于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红四方面军被迫三过草地，作为过草地的最后一批红军的张力雄回忆说，“左右1000米内能吃的野菜早被先头部队吃光了”。于是，他们就以枪皮带、皮腰带和土造牛皮斗篷等充饥。红军指战员在长征途中随时受到敌人、饥饿、伤病、雪山和草地等多重威胁，不仅遭遇生存极限的挑战，而且随时都有倒下去牺牲的可能。

毛泽东在《七律·长征》中，用“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的豪迈诗句，生动地描绘了红军指战员面对艰难险阻不畏惧的精神风貌和

战天斗地的革命气概。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在长征中，红军指战员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强渡大渡河，爬雪山过草地，平均每行进1公里，就有3至4名战士牺牲。中央红军到陕北时，从8万多人锐减到七八千人。红军长征惊天地、泣鬼神，冲破了“敌军围困万千重”，经受住了生与死的残酷考验，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中华民族艰苦奋斗的英雄赞歌。

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长久生存的灵魂，唯有精神上达到一定的高度，这个民族才能在历史的洪流中屹立不倒、奋勇向前。伟大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革命风范的生动反映，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的集中展示，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它根植于5000年中华文明，上承井冈山精神，下启并融入于延安精神，是中国革命史上、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座不朽的丰碑，并不断与时代特征相结合而丰富发展。继承和发扬好长征精神，必须与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紧密结合起来，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继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奋力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执笔：宋月红）

《红旗文稿》，2016年第23期

弘扬长征精神 谱写壮丽篇章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理论研究中心

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于中国西北的黄土高原，庄严地向世界宣告：长征这一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壮举以胜利而告终。长征的伟大胜利创造了可歌可泣的战争奇迹，谱写了豪情万丈的英雄史诗，铸就了彪炳千秋的长征精神。今天，我们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就是要大力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新的长征路上，谱写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壮丽篇章。

一、不朽的长征，壮丽的史诗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极其严重的白色恐怖中开启了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新征程，完成了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的历史性转变。在全党为挽救革命、探索革命道路的艰苦斗争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逐渐找到一条正确的革命道路，使党领导的革命力量不断发展壮大，建立了中央革命根据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川陕革命根据地、陕北革命根据地等。1933年9月，国民党当局以50万兵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党内“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最终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被迫撤出中央革命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红二、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也先后从长江南北各革命根据地撤出，开始了著名的长征。

自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踏上战略转移的征途，到1936年10月红一、

红四方面军和红一、红二方面军分别在会宁、静宁将台堡胜利会师，完成历时两年的长征。其间，党领导下的各路红军将士，在前有敌军堵截、上有敌机轰炸、后有敌军追击的情况下，战略上互相配合、互相支持，于数万里崎岖道路上，用双脚与敌人的飞机汽车竞赛，血染湘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先后与敌人进行了600余次重要战役战斗，跨越近百条浪涛汹涌的江河，征服约40座人迹罕至的皑皑雪山，穿越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以超凡的勇气和毅力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完成了人类战争史上绝无仅有的奇迹。

长征不但是中国历史的奇迹，也是世界历史的奇迹。毛泽东同志曾经豪迈地宣告：“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没有，从来没有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把红军长征誉为“军事史上伟大业绩之一”，是历史上最盛大的武装巡回宣传，是当今时代无与伦比的一次史诗般的远征。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赞颂长征是充满了集体英雄主义、献身精神和希望的举世无双的行动，将成为人类坚定无畏的丰碑，永远流传于世。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称长征是本世纪（按：指20世纪）最伟大的军事史诗，是一次体现出坚忍不拔精神的惊人业绩。

长征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博大胸襟和壮美情怀。长征中，党坚持把自己的命运与中华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把军事上的战略转移与政治上的战略转变联系在一起，把长征前进的大方向与建立抗日前进阵地联系在一起，指挥率领红军将士，以压倒一切敌人、踏平一切困难的英雄气概，奋勇前进，落脚陕甘。长征的胜利，掀开了中国革命历史的新篇章。长征的胜利，宣告了国民党妄图消灭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图谋的破产，实现了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长征的胜利，标志着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开始形成，为中国革命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提供了最为重要的保证。长征的胜利，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北上抗日的战略目标，使党的大本营由南部地区转移到西北地区，为将陕北确立为党中央领导指挥抗日斗争的中心创造了条件，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的到来。

二、宝贵的经验，深刻的启示

80年沧海桑田，风云变幻，但当年那条蜿蜒曲折的长征路如同一束永不褪色的“红飘带”，在人们心间飘舞，让人们不断领略长征为后人留下的宝贵经验和深刻启示。

红军长征的历史表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是长征胜利的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是具有远大政治眼光、高度组织性和纪律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党的正确领导，是战胜一切困难、战胜一切敌人最可靠的保证。长征初期，由于“左”倾的错误指挥，中央红军损失惨重。在残酷的事实面前，党和红军内部对错误领导的怀疑、不满和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迅速增长。在这样的背景下，1935年1月党中央召开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会议作出的一系列重大决策，是党在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作出的，这表明经过血与火的考验，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遵义会议后，在毛泽东等同志的正确指挥下，红军掌握了作战的主动权，摆脱了国民党几十万军队的围追堵截，并开展了对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加强了党的团结统一，将革命大本营奠基在西北地区，完成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转变，保证了各路红军一致北上，并最终取得了长征的胜利。

红军长征的历史表明，具有坚定革命理想信念的红军是不可战胜的。长征开始，没有人知道战略转移何时能结束，但红军将士坚信：只要跟着党走，就有前途，就会胜利。他们甘愿吃苦，宁愿牺牲也不掉队。“革命理想高于天”。坚定的理想信念，是红军战胜敌人和一切困难的力量源泉。正是这种崇高的革命理想和信念，使红军将士在艰苦复杂的斗争中始终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能够战胜各种艰难险阻；始终保持着高昂的斗志，对革命前途充满信心；始终保持强大的凝聚力，凝聚成无坚不摧的战斗整体。红军都是钢铁汉，千锤百炼不怕难。经过长征的考验和洗礼保存下来的红军将士，人数虽然不多，但这是党极为宝贵的精华，他们很多人成为领导中国抗日战争、全国解放战争和新中国建设的中坚力量。

红军长征的历史表明，人民群众真心拥护和支持是党和红军的力量之源。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与人民群众建立血肉相连的关系，是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根基。没有人民的认同和支持，党将一事无成。长征开始后，红军所处的环境和作战方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在这种情况下，能否像中央苏区那样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不仅关系到战略转移任务的完成，更直接关系到党和红军的生死存亡。为此，在长征中，党始终把遵纪爱民作为事关全局的重要工作来抓，无论党的领导人，还是红军指战员，都严格执行党的纪律和有关规定，秋毫无犯，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特别是在经过民族地区时，红军指战员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以自己的模范行动感化少数民族群众，著名的“彝海结盟”，就是红军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而谱写的中华民族一家亲的颂歌。红军的模范行动，赢得了各族群众的信任，把红军当作自己亲人，因此才有了人民群众冒死给红军当向导，才有了人民群众倾囊献出自己的活命粮，才有了各族群众踊跃参加红军的感人场景。长征的胜利，庄严地向全世界宣告，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的、深深根植于中国各族人民之中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是不可战胜的。

红军长征的历史表明，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胜利。在长征中，党能否保持高度的团结统一，几路红军能否完全置于党中央的绝对领导之下，是关系党和红军命运以及革命事业成败的重大问题。在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中央正确领导下，红军粉碎了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战胜了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克服了党内“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为长征胜利奠定了基础。各路红军尽管出发时间、地点、路线不同，但都能从革命的根本利益出发，同甘共苦、互相支持，密切配合、协同作战，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团结战斗的光辉篇章。正是这种团结协作、步调一致的精神，使红军不断走向胜利。红军三大主力的会师，是长征胜利的标志，也是革命团结威力的象征。特别是在张国焘公然与党中央对抗、妄图分裂党和红军的危急关头，红军将士尤其是红四方面军广大官兵坚决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和正确路线，与张国焘分裂主义展开了坚决斗争，最终避免了党和红军的分裂。

三、伟大的精神，永恒的价值

长征精神是红军长征留下的一份最珍贵的财富。长征精神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长征精神是党和人民军队优良传统和作风的具体反映，是中国共产党人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全面展示，是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它和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抗战精神、西柏坡精神等一道内化为中华民族的红色基因，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重要内容，并得到不断传承，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提供了强大精神支撑。

长征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以其卓越超凡的能力、坚忍不拔的毅力，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 100 多年来期待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使命，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消灭一切剥削制度，推进了社会主义建设；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极大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性，极大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极大增强社会发展活力，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际地位显著提高。特别是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

2016 年 7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回族自治区调研考察期间指出，我们党领导的红军长征，谱写了豪情万丈的英雄史诗。伟大的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革命风范的生动反映，我们要不断结合新的实际传承好、弘扬好。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长征要持续接力、长期进行，我们每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谆谆教诲，牢记

历史、不忘初心、继续前进，自觉把伟大的长征精神深深熔铸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当中，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努力奋斗！

《求是》，2016年第20期

遵义会议精神



遵义会议作为我们党历史上一次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走独立自主道路、坚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政策策略、建设坚强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等方面，留下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我们要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

——2015年6月16日至18日，习近平在贵州调研时强调

遵义会议精神的内涵

曲青山

今年是遵义会议召开 80 周年。我们纪念遵义会议的召开，学习和弘扬遵义会议精神，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在我们党的历史上，遵义会议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这是党的历史决议所下的判断和结论。因为，遵义会议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我们党领导人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奋斗了 28 年。28 年一分为二，中间的坐标正好是遵义会议，它成为我们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一个重要历史节点。以这个节点来分界，向前看是党早期 14 年的历史，向后看是党 14 年走向壮大成熟和不断取得胜利的历史。前 14 年，我们党曾遭受两次重大历史挫折，一次是大革命的失败，一次是中央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第二次失败使我们党和红军遭受了重大损失，几乎陷入绝境。正是以遵义会议召开为标志，中国共产党从这里重新站起，党的成熟的领导集体和核心从这里开始逐步形成，我们党有了正确的前进方向。从此，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克服一个又一个艰难险阻，先后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解放战争的胜利，最终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展现了历史的必然！正确解读这段历史，明确揭示历史现象背后的规律和必然，正是我们今天纪念遵义会议，从中获取智慧和力量的目的所在。

遵义会议为什么能成功召开，为什么能产生如此重大的历史作用和意义，我们可以从多方面、多角度去概括和总结，但实事求是、独立自主、民主集中制和党指挥枪是其中最主要、最基本的方面。

实事求是根本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是毛泽东思想三个活的灵魂之一。遵义会议的第一个鲜明特点，就是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作为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虽然这时我们党还没有对其进行概括和提炼，但是，遵义会议贯彻了这一精神，会议的各项决定是实事求是的产物，是实事求是的具体体现。实事求是成为我们党结束“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最有力的思想武器。遵义会议前党内曾一度出现了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如果继续照搬教条、照套本本，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呢？严酷的现实摆在党的面前。遵义会议前的湘江之战，红军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会后的四渡赤水取得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与之前形成鲜明的对照，活生生的现实深刻地教育了广大党员和红军将士。遵义会议的历史告诉我们，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只有坚持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才有活力、才有生命力；只有坚持实事求是，才能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过去，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坚持实事求是，取得了革命的胜利。今天，我们党要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也必须继续坚持实事求是，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

独立自主是关键

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来说，要不要坚持独立自主，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对此，我们有切肤之痛，有切身的感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独立自主，就要坚持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独立自主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立党立国的重要原则，也是毛泽东思想三个活的灵魂之一。为什么要将独立自主列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看一看党的历史，看一看遵义会议，我们就清楚了、明白了。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建立的，党的二大通过决议正式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其下属的一个支部。毛泽东同志对于共产国际与中

国革命的关系，有一个总的评价。他说：“两头好，中间差。”中间差就是指共产国际对我们党内部干预太多，尤其是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发生，正是与共产国际及其代表有关。遵义会议是在我们党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召开的，会议作出了一系列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重大决策和重大决定，这些成果都是我们党独立自主取得的。遵义会议的历史表明，“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中国共产党的事情要由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的实际自己来做决定。外国的经验可以学习，外党的经验可以借鉴，但不能照抄照搬。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民族、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通过依赖外部力量、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实现强大和振兴。那样做的结果，不是必然遭遇失败，就是必然成为他人的附庸。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党，在一个13亿多人口的大国长期执政，面临的世情国情党情十分复杂和独特，我们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民主集中制是保证

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它正确规范了党内政治生活、处理党内关系的基本准则，是反映、体现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利益与愿望，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制定和执行的科学的合理的有效率的制度。因此，这是我们党最大的制度优势。遵义会议之所以开得好、开得成功，是民主集中制起了作用。试想，如果没有民主集中制，会上张闻天能作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吗？毛泽东能对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展开批评吗？中央领导机构和军事指挥机构能够改组吗？不能。由于有了这样一个制度，党内开展了积极的思想斗争，解决了在战争时期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最急需解决的组织人事问题和军事领导问题，既纠正了错误，又团结了同志。有了正常的党内生活，我们党就开始逐步形成了党的稳定的领导核心。遵义会议的历史证明，民主集中制作为我们党的一个根本组织原则和组织领导制度，必须长期坚持。只有坚持民主集中制，我们党才能不断克服自身存在的问题，完善自我，提升自我，我们党才有凝聚力、战斗力，才能不断发展壮大，更加坚强。

党指挥枪是原则

党指挥枪是我们的人民军队在创建之初，由毛泽东同志在“三湾改编”时确立的原则，在古田会议上得到重申和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八十多年来，我军之所以能始终保持强大的凝聚力、向心力、战斗力，经受住各种考验，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最根本的就是靠党的坚强领导。这是我军的军魂和命根子，永远不能变，永远不能丢。”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体现在遵义会议对重大军事行动的决策上，体现在对军事“三人团”的改组和调整上。这个重要原则，保证了红军的转危为安，保证了人民军队能打仗、打胜仗。遵义会议的历史昭示我们，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关系我军的性质，关系我军的宗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人民军队要履行职责，完成好使命，以强军梦支撑中国梦，就必须铸牢强军之魂，继续牢牢地把握好党指挥枪这一根本原则，为保卫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务。

遵义会议召开至今已经80年过去了，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虽然，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们翻开了新的一页，迈出了新的脚步，但是，历史不可忘记。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历史的启迪永在，精神的价值永存。我们纪念遵义会议召开80周年，就要深入挖掘和整理、继承和发扬光大它的精神和价值，为我们今天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服务。

《光明日报》，2015年1月7日

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

中共贵州省委中心组

核心要点：

■ 遵义会议奠定了红军长征和中国革命胜利的基础，开创了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领导中国革命的先河，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征程，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

■ 遵义会议《决议》指出，中国苏维埃革命有着他雄厚的历史的泉源，他是不能消灭的，他是不能战胜的，并发出“胜利必然是我们的”豪迈壮语。正是凭着对崇高革命理想的矢志坚守，党中央和红军才得以转危为安，中国革命才得以化险为夷。

■ 遵义会议上，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在没有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干预下，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身在路线、方针、政策上面临的突出问题。大家掏心见胆、揭短亮丑，以“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创造性地在军事路线等方面进行调整，实行符合实际的战略策略，翻开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新篇章。

■ 一方面要把遵义会议精神作为党员理想信念教育的重要内容，强化遵义会议精神的“钙质元素”，在广大党员干部中起到震撼人心、净化灵魂、升华境界的效果；另一方面强化遵义会议精神的涵养价值，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团结奋斗，凝聚起广大干部盼发展、谋发展的正能量，激励广大干部群众同心共筑中国梦。

■ 党的红色基因是不能抛弃的传统、不能丢掉的根本。遵义会议深化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的认识，形成了宝贵的革命文化成果，它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血肉相连，对红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对革命精神的继承与

弘扬、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具有重大现实作用。

2015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到贵州视察指导，在参观遵义会议会址时强调，遵义会议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走独立自主道路、坚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政策策略、建设坚强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等方面，留下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我们要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长征途中，党中央召开的遵义会议，是我们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回顾那段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革命壮举，发扬光大遵义会议精神，对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遵义会议的伟大历史意义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历尽千辛万苦、艰难险阻，转战进入贵州。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了扩大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奠定了红军长征和中国革命胜利的基础。遵义会议明确回答了红军在战略战术方面的是非问题，指出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批判了“左”倾教条主义、冒险主义错误，重新肯定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同时，改变了中央的领导特别是军事领导，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为胜利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进而夺取全国革命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

开创了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领导中国革命的先河。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认识中国，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从此，中国共产党开始在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指导下，克服重重困难，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独立自主地确立了中国革命的基本方针原则，独立

自主地制定了一系列正确政治路线和政策策略，领导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

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征程。遵义会议实际上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把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确立了中国革命的基本方针原则，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思想政治基础。从此，我们党开启了独立自主探索中国革命正确道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征程。

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同时，开始从根本上改变党内生活不正常的状况，为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确立正确的领导制度和维护党的团结统一提供了宝贵经验，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

二、遵义会议精神的内涵及其当代价值

遵义会议是在历史洪流中应运而生的伟大事件，体现了我党我军在真理面前敢于坚定信念、坚持真理，在错误面前敢于承认失败、修正错误，在困难面前敢于攻坚克难、团结奋斗，在问题面前敢于实事求是、务实担当的精神。中国共产党用坚定的理想信念、复兴中华的担当，临危不惧、处变不惊的定力，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勇气，顽强不屈、愈挫愈勇的斗志，独立自主、敢闯新路的气魄，尊重群众、崇尚民主的作风，团结一心、顾全大局的胸襟，深刻诠释了遵义会议精神的内涵，即坚定信念、实事求是、独立自主、敢闯新路、民主团结。历经81年岁月沧桑，遵义会议彰显的革命精神历久弥新、熠熠生辉，具有重要时代价值。

实现中国梦的精神滋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并号召“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弘扬伟大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不断增强团结一心的精神纽带、自强不息的精神动力，永远朝气蓬勃迈向未来”。遵义会议《决议》指出，中国苏维埃革命有着他雄厚的历史的泉源，他是不能消灭的，他是不能战胜的，并发出“胜利必然是我们的”

豪迈壮语。正是凭着对崇高革命理想的矢志坚守，党中央和红军才得以转危为安，中国革命才得以化险为夷。大力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构筑中华民族的精神高地，既有助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又能为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凝魂聚气，提供丰富的精神滋养，不断增强人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树立“四个意识”的有力支撑。邓小平同志曾说，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在遵义会议上，大家从大局出发，捋问题、摆事实、讲道理、树标杆，表现出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巨大政治勇气，在客观矛盾和现实困难面前，冷静清醒地总结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的经验教训，刚毅果敢地与“左”倾教条主义作斗争，逐步确立了毛泽东同志的核心地位，从而开辟了中国革命的崭新境界。我们要大力弘扬遵义会议精神，秉承党的优良传统，切实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精神动力。建党之初，年幼的中国共产党尚不能独立自主地解决自身面临的问题和困难。面对滚滚而来的革命洪流，党内很多同志遇到问题总是希望从经典作家的论断里寻找答案，总是希望从共产国际的指示里寻找依据。这就难免会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致使革命伟业步履维艰、困难重重。遵义会议上，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在没有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干预下，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身在路线、方针、政策上面临的突出问题。大家掏心见胆、揭短亮丑，以“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创造性地在军事路线等方面进行调整，实行符合实际的战略策略，翻开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新篇章。遵义会议彰显的独立自主的气魄和敢闯新路的果敢，为我们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和宝贵思想方法。

深化“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的现实需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作为一个有8800多万名党员、440多万个党组织的党，作为一个在有着13亿多人口的大国长期执政的党，党的建设关系重大、牵动全局。党和人

民事业发展到什么阶段，党的建设就要推进到什么阶段。”“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是遵循党的建设基本规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举措。遵义会议发生在血雨腥风的革命战争年代，与会同志充分发扬民主，表达不同意见，最后达成基本共识，按组织程序推选党和红军的领导人，体现出纯洁的党性和博大的胸怀。当前，我们要用遵义会议彰显的民主团结作风来抓“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真正推动党内教育从“关键少数”向广大党员拓展、从集中性教育向经常性教育延伸。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中重温遵义会议精神，能够进一步推动我们学做同步，自觉锤炼忠诚品质，在知行统一、以知促行、以行促知上下功夫，夯实党的执政根基。

三、谱写伟大事业新篇章

长征是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遵义会议留下的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是我们牢固树立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坚定信念、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的传家宝。我们要从遵义会议历史中找到启迪、从遵义会议精神中找到力量，进一步丰富遵义会议精神的时代内涵，不断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坚持以遵义会议精神构筑精神高地。一个地方的精神风貌，镌刻着一个地方的历史底蕴和文化渊源，是衡量一个民族、一个地区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尺，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大力弘扬遵义会议精神，就是在以新发展理念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上发挥主观能动性，在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动力活力上激发出最持久、最深层的精神力量。一方面要把遵义会议精神作为党员理想信念教育的重要内容，强化遵义会议精神的“钙质元素”，在广大党员干部中起到震撼人心、净化灵魂、升华境界的效果；另一方面强化遵义会议精神的涵养价值，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团结奋斗，凝聚起广大干部盼发展、谋发展的正能量，激励广大干部群众同心共筑中国梦。

坚持以遵义会议精神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遵义会议精神包含了“善于转变、敢于突破、勇于胜利”等要素，其核心是根据不断

变化的情况做出重要选择。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的攻坚阶段，经济社会发展呈现许多新特征。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必须增强创新突破的政治勇气，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准确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科学认识、主动适应、正确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在新常态中实现新发展，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广大人民群众，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坚持以遵义会议精神深化党的建设。遵义会议精神蕴含了崇高的理想信念、高尚的道德情操、优良的党风党纪，对加强党的建设具有现实意义。弘扬遵义会议精神，就要在新形势下切实解决“四风”问题，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推进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确保党始终成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当前，要秉承遵义会议坚定信念、实事求是的精神品质，发扬遵义会议民主团结的优良作风，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结合“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使广大党员真正做到讲政治、有信念，讲规矩、有纪律，讲道德、有品行，讲奉献、有作为。

坚持以遵义会议精神推动红色文化传承。党的红色基因是不能抛弃的传统、不能丢掉的根本。遵义会议深化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的认识，形成了宝贵的革命文化成果，它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血肉相连，对红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对革命精神的继承与弘扬、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具有重大现实作用。新形势下，必须深入发掘遵义会议精神的时代价值，进一步传承红色基因，为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精神家园建设提供源源不断的养分，为实现中国梦凝聚强大动力、筑牢精神支柱。

《求是》，2016 第 21 期

延安精神



我们党是一个具有长期奋斗历史和优良革命传统的党，也是一个紧跟时代步伐、善于与时俱进的党。党的建设必须坚持继承和创新相结合，结合时代条件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老一辈革命家和老一代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留下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培育形成的延安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今天，全面从严治党要继续从延安精神中汲取力量。要把抓理想信念贯穿始终，提高辩证思维、系统思维能力，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为党和人民事业艰苦奋斗、不懈奋斗。

——2015年2月13日至16日，习近平在陕西考察时强调

延安精神的由来和体现

李 颖

2015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考察时指出：老一辈革命家和老一代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留下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培育形成的延安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

革命战争年代，各根据地尤其是陕甘宁边区的共产党人，通过领导人民进行民主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建设等经验的积累，形成了带有体系的观念和作风，即后来概括的延安精神：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

陕甘宁边区的“三三制”民主政治

实行民主政治，是陕甘宁边区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第一步工作是进行由乡到边区议会的选举。边区的民主选举并没有因为全国抗战的爆发而停止进行。凡居住在边区年满16岁的民众，“无男女、宗教、民族、财产、文化的区别，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在实际投票中，群众有许多创造，采取了投豆、画圈、画杠、燃香在纸上烧眼等办法。到1937年10月底，乡、区、县三级选举完成，有70%的选民参加了投票。12月选出500多名边区议会（1938年11月改称参议会）议员，进而组成了边区政府。

边区贯彻执行“三三制”政权，即共产党员、党外进步人士和中间派各占1/3。1941年11月6日至21日，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大会在延安召开，开明绅士李鼎铭当选为边区政府副主席。在选举的18名边区

政府委员会委员中，共产党员7名，超过了1/3，当选的边区政府委员徐特立（共产党员）立即声明，请求“退出”，得到大会的赞同和同意，并按原选得票多少，递补了一位非党人士，使边区政府委员会中的共产党员人数完全符合“三三制”原则。

李鼎铭先生是一位热衷于陕甘宁边区建设，积极拥护共产党领导的爱国民主人士。面对抗日根据地所遇到的严重困难，他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了精兵简政的提案，正好切中了边区内兵多粮乏、政繁赋重的现象，大会以165票多数通过并交政府速办。1941年12月6日，《解放日报》发表了题为《精兵简政》的社论，认为精兵简政“不仅在解放区，即在各敌后抗日根据地，也是非常恰合适宜的主张”。要求全党普遍地执行精兵简政。这样，精兵简政作为陕甘宁边区的中心工作之一实施起来。同时，为密切军政、军民关系，还开展了“拥政爱民”和“拥军优属”运动，都取得了良好效果。

“三三制”等民主政治方针的实行，使边区各级政权有了广泛的代表性，有力地调动了社会各界团结抗战的积极性，成为全国最进步的地方。毛泽东曾总结过陕甘宁边区的“十没有”：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花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这是对陕甘宁边区社会风貌的真实写照和热情称赞。朱德总司令也写诗赞颂当时的党政军民关系：

历年征战未离鞍，赢得边区老少安。耕者有田风俗美，人民专政地天宽。实行民主真行宪，只见公仆不见官。陕北齐声歌解放，丰衣足食万家欢。

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建设

1940年5月朱德从华北回到延安后，在协助毛泽东指挥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军事斗争的同时，十分关心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经济工作情况。朱德看到，边区的“财政经济建设虽有某些成绩，实在是入不敷出，以致几月来未发一文零用，各机关、学校、军队几乎断炊。”他深感如不采取重大措施，就很难扭转局面。

经过调查，朱德把注意力集中到陕甘宁边区蕴藏量很大、又是人们生活必需品的食盐上来。

边区境内有五个盐池，边区内部消费不了。当时，大家都没有想到用盐去换钱以积累资金。朱德想，如果把盐销到附近需要食盐的陕西、山西、河南各地，不是可以换回大量资金吗？朱德明确提出：“现在，自力更生是目前全党全军之极重大任务。”“我的意见先从盐下手。”“定边盐池为陕北经济策源地。”“我们下紧急令，派军队全体动员。首先从盐井来冲锋，冲破这些困难。”

毛泽东赞成朱德等提出的积极发展生产的方针，主要是投资盐业的发展。他说：“盐的第一个好处是解决出入口平衡的问题。出入口一解决，则物价、币价两大问题即解决了。”毛泽东、朱德雷厉风行地抓经济工作，措施有力，很快推动边区经济工作出现了新的面貌。

1941年和1942年，是各抗日根据地物质困难空前严重的时期。当时边区只有145万人口，又是土瘠地薄的高原山区。在国民党顽固派的封锁下，要担负数万名干部、战士以及全国不断奔赴革命圣地的青年学生的吃穿住用，实在成了一个大问题。为打开困难局面，各抗日根据地掀起了大规模的生产运动。

边区经济困难中最紧迫的是吃饭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朱德提出一个重要主张，就是在不妨碍部队作战和训练的前提下，实行屯田军垦。当时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的李维汉回忆说：“军队实行屯田是朱德倡导的。他从前线回延安后，非常关心部队的生产，主张以部队强壮众多的劳动力，投入到生产运动中去，以减轻人民的负担，密切军民关系，同时帮助边区的建设，也改善部队本身的生活。”

三五九旅是八路军的一支主力作战部队。遵照中共中央的命令，1941年3月起，王震率三五九旅官兵高唱“一把镢头一支枪，生产自给保卫党中央”的战歌，浩浩荡荡开进荒无人烟的南泥湾。七一八团政委左齐在战争中失去了一只手，开荒时拿不起锄头，便在营里给战士做饭，挑上山去给战士们吃。七一八团模范班长李位，在开荒大竞赛中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在一次全团组织的175名突击手的开荒竞赛中，他挥舞着一把4斤半重的大板镢，每分钟落地48次，经11个小时的激烈“战斗”，创造了日开荒

三亩六分七的最高纪录，被人们称为“气死牛”的英雄。

毛泽东既是大生产运动的组织者、领导者，又是大生产运动的参加者。他参加警卫班召开的生产动员会议，并且要求战士们在订计划时，给他分一块耕地。他告诉战士，我不能走远，你们在近处给我分一块。战士们劝毛泽东就不要参加劳动了，毛泽东坚决地说：不行，大生产是党的号召，我应该和同志们一样响应党的号召。他在自己住的窑洞周围开了一亩多荒地，播种、栽植、施肥、除草和收获都自己动手。对一些不懂的农业技术，就拜懂行的战士和农民为师。毛泽东衣着朴素，粗茶淡饭，经常废寝忘食，忘我工作。他使用的铅笔往往用到手都捏不住了还不忍丢弃，思考问题时总把小煤油灯的灯芯拨小，节省煤油。警卫人员见毛泽东总是穿着打着补丁的旧棉衣，就利用雪天打了一些银狐，做了一件狐皮大衣给他，而他却婉言谢绝，并建议把珍贵的大衣卖到国统区，为延安换回一些紧缺的物品。

年近花甲的朱德处处以身作则。他纺的毛线质量很好，还和身边几位勤务员一起组成生产小组，在王家坪开垦三亩菜地，种上白菜、水萝卜、菠菜、葱、蒜、韭菜、南瓜、黄瓜等十几种蔬菜。每天清早和工作之余，他就到菜地里浇水、施肥、锄草。朱德是位种菜能手，几位勤务员年纪轻，没有种过菜，他就手把手地教他们，还经常背着筐拾粪积肥。朱德种的菜质量好，产量高，品种又多，在当地很有名。老部下去看望他时，他常留他们吃饭，用自己种的蔬菜招待大家。朱德种的菜吃不完，经常用来送人。

1943年，中央直属机关和中央警卫团举行纺线比赛，任弼时夺得第一名，周恩来被评为纺线能手。中央领导人以身作则，给参加大生产运动的干部战士以很大鼓舞。

由于大生产运动广泛深入的开展，边区各机关、部队、学校自给程度竟达到财政总支出的84.44%，人民负担明显减轻，军民生活明显改善。到1945年，边区农民大部分做到“耕三余一”，部分做到“耕一余一”；农民所交公粮占粮食总收成比重逐年下降。

陕甘宁边区的文化建设

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的文艺界是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战胜敌人的一

个方面军。毛泽东曾风趣地说，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总司令的，一支是鲁总司令的。这里的“鲁总司令”的部队是指根据地的文化大军。

延安成为“红都”后，像一块磁石一样，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全国各地的文艺工作者通过不同的渠道奔向这里。在延安，他们呼吸着自由和民主的空气，焕发出巨大的创作热情。

到延安来的文艺工作者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就是想见见毛泽东，亲耳聆听毛泽东的教诲。毛泽东日理万机，日夜操劳，但仍挤出时间来满足大家的要求。曾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秘密绑架后关押在南京的著名女作家丁玲，1936年被释放后辗转到达保安。中央宣传部在一座大窑洞里开会欢迎她。毛泽东也来了。

会后，毛泽东问丁玲打算做什么，丁玲回答：“当红军。”随后，她到前方总政治部工作。毛泽东填写《临江仙》词一首送给丁玲：“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毛泽东同文艺界交往的另一条渠道，就是同文艺界人士建立广泛的通信联系。在毛泽东给文艺界人士的信中，既有体现个人情谊的私事，也有涉及文艺创作、文艺理论方面的意见。老同学萧三写信问可否提供一匹马作交通工具。毛泽东在回信中，一方面表示代他“查问一下”，同时答应，如果萧三“在边区范围内行动，那我可以拿我的马给你用一下”。1944年11月21日，毛泽东在给郭沫若的信中，告诉郭已将《甲申三百年祭》当作整风文件看待。他说：“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他希望郭沫若运用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教训的文章。他诚恳地告诉郭沫若：“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

1942年，整风运动逐渐在延安各单位展开。而这时的延安文艺界出现了“暴露黑暗”等问题。毛泽东感到有必要解决这些问题，通过文艺界的整风，澄清一些是非。为此，他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4月间，毛泽东约请艾青、刘白羽等几十位文艺界人士谈心。通过交谈，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文艺的方向、道路和未来，有了完整的构想。5月2日下午1时半，延安文艺座谈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会场气氛十分活跃，大家争相发言。5月16日召开了第二次全体会议。5月23日下午召开最后一次会议。在朱

德讲话后，毛泽东作总结讲话。由于听报告的人越聚越多，室内十分拥挤，便将会场移到室外广场，临时用三根木椽支个架子，吊上一盏汽灯。报告结束时，已是深夜。毛泽东的总结讲话，阐明了革命文艺为人民群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根本方向，系统地回答了文艺运动中许多有争论的问题，强调革命文艺工作者必须从根本上解决立场、态度的问题。

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广大文艺工作者纷纷奔向抗战前线，深入工厂、农村、部队，接触群众，体验生活，创作了《白毛女》《兄妹开荒》《夫妻识字》《逼上梁山》《王贵与李香香》等一大批反映现实生活的群众喜闻乐见的好作品，发挥了文艺在革命斗争中应有的作用。

党的“半独立性的”外交工作的开展

在抗日战争时期，许多外国人慕名来到延安，中国共产党也随即开始了“半独立性的外交”工作。

1936年7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踏进了中国红色区域的大门。虽然苏区曾有一个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但从严格意义上讲，斯诺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一位“外宾”，外交部是第一次从事接待外国人的具体活动。

7月15日，毛泽东请斯诺到他的窑洞里谈话。他们的谈话范围很广，内容极其丰富。正是在这种涉及面甚广的谈话中，毛泽东谈到了中国共产党和世界事务的关系，第一次面向一名外国人论述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外交政策。

红色区域的大门终于敞开了。

1944年2月16日，驻华外国记者联盟直接上书蒋介石，要求国民党政府允许外国记者到陕北及延安访问。几天之后，蒋介石出人意料地批准了外国记者的请求。3月4日，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给延安发来一份电报，详细报告了有关情况。对于外国记者的来访，党中央、毛泽东从一开始就很重视。收到八路军办事处的来电后，毛泽东当即批给十几位同志传阅。4月30日，记者团的行程大体确定，毛泽东又特地致电董必武，请他转告外国记者：“诸位来延，甚表欢迎。”

中外记者团5月17日离渝，于6月9日抵达延安。记者团共有21名成员，实际只有6名外国记者。这6人之中，一人是苏联塔斯社记者，名叫普罗岑柯；其余人差不多每人都兼任英美等国两三家有影响的报社的记者。

12日下午，毛泽东会见中外记者并解答他们提出的问题。毛泽东畅谈国际国内形势，并对记者们说，要战胜日本法西斯，中国必须实行民主。以后，毛泽东还抽空与一些外国记者进行深入的个别交谈。在谈话中，毛泽东除比较详细地介绍中国的抗战形势和中共的各项基本政策外，还根据每个记者的不同情况，有针对性地讲了一些问题。例如，向苏联记者普罗岑柯谈了中共的组织和发展等；向美国记者史坦因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方针，主张中国与美苏都保持友谊的关系，以便使中国在战后能成为美苏之间的一座桥梁。毛泽东有一段著名的话——“我们的权力是人民给的”，也是在同史坦因谈话时讲的。

外国记者还到晋绥抗日根据地和其他一些地方考察采访。经过几个月的访问，记者们发现边区是一个与国民党统治区完全不同的新天地。根据亲身经历，他们每人都写了不少描述根据地斗争生活的生动报道。特别是福尔曼写的《来自红色中国的报道》和史坦因写的《红色中国的挑战》，是两部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的书。夏南汗神甫也认为边区是好的，国民党想利用他反共，没有成功。外国记者访问的结果完全出乎蒋介石的意料，此后国民党当局重新对边区实行了新闻封锁。

1944年七八月，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部分两批派遣美军观察组18人抵达延安。期间，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亲自接见并设宴招待。美军观察组有关人员通过访问，写了许多调查报告，比较客观地反映了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情况。美军观察组这样评价延安人：“延安使得美国人不可思议的有三点。一是延安人对金钱不感兴趣，美国飞机经常往返印度、重庆和延安，延安没有一个人托过飞机乘务员带外面花花世界的任何东西。二是延安人待人接物不尚虚文，和一般中国人爱讲面子的传统不一样。三是延安人没有开口要美援。”

美军观察组团长驻华美军司令部包瑞德上校后来也回忆说：“许多人，包括我本人，对延安共产党政权基本上持赞赏态度的一个原因是，那里的一切事物所具有的外貌是绝大多数美国人都倾向于赞同的。在重庆，我

们所到之处都能看见警察和卫兵；在延安，我所见到的任何地方，包括第十八集团军总指挥部，都没有一个卫兵。在毛泽东朴素简陋的住处前面，即或有什么人在站岗，这对于一个偶然的过路人来说，也是不显眼的。”

延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也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今天，全面从严治党要继续从延安精神中汲取力量。要把抓理想信念贯穿始终，提高辩证思维、系统思维能力，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为党和人民事业艰苦奋斗、不懈奋斗。

《人民政协报》，2016年9月8日

弘扬延安精神 走好新长征路

徐新荣

核心要点：

■ 延安精神是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集中体现，是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集中体现。延安精神滋养和激励了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不畏艰难、英勇奋斗、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延安精神的灵魂，要始终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摆在第一位。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就是我们党代表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确立的正确的政治方向。

■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也是延安精神的精髓，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积极进取，勇于实践的务实精神和科学精神，是推动我们党发展前进的强大思想武器。

■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也是延安精神的本质。中国共产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

■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我们党的传家宝，也是延安精神的重要特征。延安时期，党员干部队伍普遍形成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艰苦朴素的优秀品质，保持了积极健康的精神状态，为战胜困难、争取革命胜利提供了坚强精神动力。

■ 今天，我们不忘初心、继续前进，走好新长征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必须继续从延安精神中汲取强大精神力量。

延安精神是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集中体现，是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的集中体现。延安精神滋养和激励了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不畏艰难、英勇奋斗、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今天，我们不忘初心、继续前进，走好新长征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必须继续从延安精神中汲取强大精神力量。

始终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摆在第一位。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延安精神的灵魂。要始终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正确的政治方向是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集中体现。延安时期，打败日本侵略者，实现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就是我们党代表中华民族根本利益而确立的正确的政治方向，吸引了成千上万革命者积极投身救国救亡的洪流。今天，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就是我们党代表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确立的正确的政治方向。要始终坚定理想信念。坚定的理想信念是战胜一切困难、经受任何考验的强大精神支柱。当年，我们党在延安这样艰苦的环境下，战胜各种艰难险阻，创造彪炳史册的伟大业绩，靠的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为的就是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习近平总书记当年不到16岁从北京来到生活条件极其艰苦的梁家河村插队，在7年时间里，先后写了8次入团申请、10次入党申请，终于被组织批准入团、入党，支撑他的就是坚定的理想信念。要始终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党的基本路线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我们要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要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以实际行动体现对党的绝对忠诚，争当向中央看齐的标杆、作践行“三严三实”的表率。

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也是延安精神的精髓。延安时期，我们党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开展整风运动，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成为全党思想共识和党员自觉行动，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立了毛泽东思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积极进取，勇于实践的务实精神和科学精神，是推动我们党发展前进的强大思想武器。历史证明，什么时候坚持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我们的革命就取得胜利、建设就取得成就；什么时候违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我们就会犯错误、受挫折。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习近平总书记在回忆梁家河岁月时说，陕北七年，最大的一个收获，就是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群众。我们要清醒认识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树立强烈的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奔着问题去，跟着问题走，确保我们的一切工作符合实际，经得起实践、历史和群众的检验。要突出实践观点，发挥历史主动性和创造性，锐意进取，大胆探索，敢于和善于回答现实生活中和群众思想上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要彰显改革精神，拿出刀刃向内、自我革命的勇气，真改实改快改，优化发展环境，进一步释放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要贯穿实干精神，真抓攻坚克难，实干梦想成真，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坚持新发展理念，注重做好打基础、利长远的工作，把一项一项工作落到实处，把一个一个既定目标变为现实。

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也是延安精神的本质。中国共产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在讲话中提到最多的就是人民群众，在基层调研中接触最多的也是人民群众，在决策部署中关注最多的还是人民群众。如提出共享发展理念，强调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新的增长点就蕴含在解决好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突出问题当中，中南海要始终直通人民群众等等，充分体现了人民领袖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和不变初心。习近平同志在梁家河插队时，与村民建立了深厚感情，1975年离开梁家河上大学，全村人送了他一程又一程，他也4次给梁家河乡亲回信。2015年春节习近平总书记回梁家河时满怀深情地说，“当年，我人走了，但我把心留在了这里”，“家乡每一点发展变化都让我感到高兴，家乡每次灾害事故也都让我牵肠挂肚”。群众在我们心里的分量有多重，我们在群众心里的分量就有多重。我们“要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走到群众中去，向群众学习，拜群众为师，找出解决问题、克服困难的办法，作出正确决策，推进工作落实。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

急、解群众之所困，认真解决好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突出问题，使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幸福更美好更有尊严，以实际行动赢得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保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激情。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我们党的传家宝，也是延安精神的重要特征。美国作家斯诺1936年到陕北采访时说，我发现了存在于共产党人之中的一种伟大力量，这种力量叫“东方魔力”，这是古老中国的“兴国之光”。斯诺所说的这种“东方魔力”“兴国之光”，就是我们党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延安时期，党员干部队伍普遍形成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艰苦朴素的优秀品质，保持了积极健康的精神状态，为战胜困难、争取革命胜利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习近平同志当年在梁家河村担任党支部书记时，同社员们一起住土窑洞，跟知青们一起吃玉米面窝头，带领群众打淤地坝、挖甜水井、修沼气池、建磨坊、办铁业社，锻造了他坚毅刚强的意志品质和顽强拼搏的奋斗精神。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幸福美好的生活，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从地下冒出来的，而是要靠艰苦奋斗创造幸福的生活。当前，延安经济社会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陕西、延安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不等不靠、主动作为，坚持用延安精神引领延安建设，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省委鼓励激励、容错纠错、能上能下“三项机制”为动力，加快实施“高端能化强市、特色产业富民、文化旅游带动、生态环境提升、城乡一体发展”战略，充分发挥特色资源优势 and 城镇化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空间大的后发优势，积极破解生态环境整体脆弱的明显制约，彻底摆脱油煤路径依赖，着力培育新动能、构筑新高地，努力实现转型发展、追赶超越，与全国一道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求是》，2017年第17期

从延安精神中汲取从严治党的力量

靳 铭

中国共产党人在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中所培育和形成的延安精神，是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集中体现，是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集中体现，也是共产党人从严治党的伟大成就，蕴藏着凝聚人心、战胜困难、开拓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

今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考察时强调：“老一辈革命家和老一代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留下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培育形成的延安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今天，全面从严治党要继续从延安精神中汲取力量。”

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汲取精神的原动力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延安精神的灵魂，它集中体现在共产党人坚定不移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上，而坚定的理想信念则是共产党人永不枯竭的精神原动力。延安时期，无数共产党人为了保家卫国，不顾抛妻别子、丧失亲友、家破人亡之危，全身心投入抗日救国斗争中。在共产党人的感召下，一些国民党人也舍去自己富裕安逸的生活条件和国民党方面给予的优厚待遇，义无反顾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是什么力量让他们放弃升官发财、发家致富、光宗耀祖、福泽亲友的机会，最终选择了为抗日救亡、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是理想信念，是坚定不移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为他们朝着民族救亡图存和人民独立解放的不懈奋斗，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精神原动力。

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性修养，坚定四个自信，补足精神之“钙”，

用信仰塑造灵魂，解决好理想信念动摇、信仰迷茫、精神迷失、党性修养缺失、不讲党的原则等问题，需要从延安精神中汲取这种精神上的永恒原动力。

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汲取真理的感召力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延安精神的精髓。坚持实事求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就是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来研究和解决问题，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来制定和形成指导实践发展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坚持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

延安时期，老一辈革命家们从客观存在着的事物出发、从实际出发而非从本本出发，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制定了《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成立了中央调查研究局和各类调查团，通过在陕甘宁、晋西北等地开展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及群众生活等的调查，掌握客观实际情况，提供科学决策咨询；他们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用马列主义之“矢”去射中国革命之“的”，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掌握了真理，团结了同志；他们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没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没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脱胎换骨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追随真理不断前行。

全面从严治党，坚持实事求是，坚持求真务实，做到从实际出发谋划事业和工作，使点子、政策、方案符合实际情况、符合客观规律、符合科学精神，不脱离实际。谋事创业求真务实，就要从延安精神中汲取这种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之巨大感召力。

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汲取行动的凝聚力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是延安精神的核心内涵，也是共产党人的终极价值追求。毛泽东曾经强调：“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

延安时期，共产党人清醒地认识到，“老百姓拥护共产党，是因为我

们代表了民族与人民的要求。但是，如果我们不能解决经济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建立新式工业，如果我们不能发展生产力，老百姓就不一定拥护我们。”因此，他们大力发展民主政治，全面开展大生产运动，努力创建自己的公营工厂，先后在边区兴办了1380余所各类学校，建立各级医疗卫生机构，真心诚意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活和生产问题。

全面从严治党，努力践行党的宗旨，牢固树立群众观点，教育党员尊重群众的意见与建议，急群众所急，想群众所想，解决宗旨意识淡薄、忽视群众利益、漠视群众疾苦等问题，永葆党同群众的血肉联系，需要从延安精神中汲取这种服务群众、赢得群众的强大凝聚力。

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汲取形象感染力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延安精神的显著特征，也是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和一贯的精神风貌。

延安时期，共产党的领导人住在寒冷的窑洞里，睡在冰冷的土炕上，吃着粗糙的小米饭，穿着打补丁的衣服，从他们的身上，人民群众看到了公仆与民众同甘共苦的感人形象；毛泽东亲自在杨家岭种菜，周恩来和任弼时变成了纺线能手，朱德背着肥筐积肥，国际友人在他们身上看到“兴国之光”，感受到了“东方魔力”，这种“魔力”就是形象感染力。

全面从严治党，坚守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坚决反对享乐主义与奢靡之风，解决不直面问题、不负责任、不敢担当等问题，就要从延安精神中汲取这种艰苦卓绝、奋斗不止形象的超强感染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指出，“历史使命越光荣，奋斗目标越宏伟，执政环境越复杂，我们就越要增强忧患意识，越要从严治党。”同时，他强调，“引导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全面从严治党，坚守精神追求，把作风建设不断引向深入，就应该不断汲取精神的力量，从延安精神中汲取原动力、感召力、凝聚力和感染力以增强党的创造力与战斗力。

《光明日报》，2015年11月3日

抗战精神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壮阔进程中，形成了伟大的抗战精神，中国人民向世界展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伟大的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永远是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强大精神动力。

——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9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2014年9月3日

不忘抗战历史 弘扬抗战精神

沈 强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的正义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近代以来抗击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中华民族同仇敌忾，浴血奋战，创造了弱国打败强国的光辉业绩。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在这特殊的时刻，重新审视抗战历史，弘扬抗战精神，对于我们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一场神圣的全民族抗战

在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空前团结，共御外侮，抗击日本法西斯的侵略。可以说，全民族抗战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重要法宝，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全国能够形成这种空前团结、全民族共同抗战局面的基本保证。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本的武装侵略，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大义出发，率先提出武装抗日的主张。在事变爆发后的第三天，中国共产党便发出《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明确提出联合全国工农兵士劳苦民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并随后组织东北抗日联军，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与日军进行殊死战斗。1935年，日本制造华北事变，企图将华北五省分离出中国，民族危机进一步加剧，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率先提出在国内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主张“联合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众（日本国内劳苦民众，高丽、台湾等民族）作友军，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民族和国家作同盟，与一切对中国民众反日解放战争守善意中立的民族和国家建立友谊关系”。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面对国内复杂的局面，中国共产党派出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奔赴西安，全力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迫使蒋介石答应停止“剿共”，联合红军共同抗日等六项条件。不仅如此，红军中的黄埔将领，也向国民党军中的黄埔同学发出呼吁：“当此民族危亡之生死关头，过去之皆怨嫌隙，均应为民族利益而一概扫除。今后之道路，应为恢复黄埔时代之革命精神，精诚携手，不分彼此，共赴国难”，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建立。

1937年7月7日，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挑起全面侵华战争。事变爆发后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便发出《中共中央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指出“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号召中华民族团结起来共同抗日。7月15日，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提交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这个宣言，再次显示了中国国民党以民族利益为重，促成国共两党正式合作抗日的诚意。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指出团结御侮的必要，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至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全国抗战爆发后，全国人民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不分阶级和党派，不分民族和地域，不分老幼和男女，同舟共济，积极投身抗日救亡的神圣事业。如在北平，长辛店的工人组织战地服务团，担任救护工作，还运来铁轨、枕木、麻袋等修筑防御工事，协助第29军固守宛平城；在上海，妇女团体开办救护训练班，一个月内训练妇女达1200多人，分配到各个伤兵医院做护理工作。不仅如此，香港、澳门、台湾同胞也积极参加抗战，1938年6月，宋庆龄领导的、由国内外知名人士发起的保卫中国同盟在香港宣告成立。保盟在港澳同胞配合下，广泛联络海外侨胞和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民主人士，从海外华侨和许多国家的援华团体募集到大量捐款、物资，为支援祖国抗战做出了杰出贡献。

抗战进入到相持阶段后，面对日本对国民政府采取的诱降方针，以及国民党愈演愈烈的反共摩擦，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适时提出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口号。在各抗日根据地内，中国共产党实行三三制政权和减租减息等政策，尽可能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努力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全民族抗战。可以说，在整个抗日战争中，由于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倡导、努力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得以建立和坚持下来。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国民党爱国官兵在正面战场坚持抗战；广大民众积极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为抗战做自己的贡献；台湾、香港、澳门同胞以不同的方式参加进来，海外侨胞也积极支援祖国抗战。正是由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确立，形成了全民族团结抗战、共同御侮的局面，从而在根本上保证了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

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世界上主要有四大战场：中国战场、太平洋战场、欧洲战场和北非战场。二战期间，中国率先开辟世界第一个大规模反法西斯战场，始终抗击着日本陆军主力，制约着日本的“北进”和“南进”，有力地配合与策应了其他战场的反法西斯战争。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中国人民展开全国性抗战，在亚洲首先开辟了大规模反法西斯战场。在日本战略进攻，中国战略防御期间，中日双方投入总兵力达400余万人，战线长达1800多公里，战火遍及中国10多个省区，战区面积约160万平方公里，中国直接或间接卷入战争的人口达4亿之多，至1939年欧战爆发，中国已独立全面抗击日本法西斯的入侵达3年之久。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后，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曾指令德国驻日大使奥托将军，令其说服日本参加对苏作战，但遭到日本军方的反对，时任日军参谋总长的杉山元指出，日本“大部分兵力现在正用于中国”，北进苏联“实际上办不到”。1941年底，德军兵临莫斯科城下，里宾特洛甫再次向日本提出联合军事行动，从东西两面夹击苏联，但再次被日本拒

绝，日本大本营统帅部决定，“按既定方针继续对中国作战”。中国的抗战不仅遏制了日本的北进计划，而且牵制了日本的南进步伐。欧战爆发后，1940年，当时的纳粹德国横扫西欧，法国败亡，英国退守孤岛，苏联和美国还没有参战，可以说此时正是世界反法西斯格局处于最困难的时期，也是日本南进的最好时机，但也就在这一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敌后发动百团大战，历时近5个月，毙伤日军2万余人，给予华北日军沉重打击。曾任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与八路军多次进行交战的寺内寿一大将，在出访德国时明确告知德方：“中日战争不结束，南进是办不到的。”可见，中国的抗战，不仅鼓舞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士气，而且在战略上为美英加强太平洋地区的防务，争取了宝贵时间。

中国战场不仅制约着日本的“北进”和“南进”，从战略上配合盟军的作战，而且给予盟军切实的援助。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抗战虽处于极为困难的境地，但仍根据国际反法西斯同盟的战略需求，毅然派出10万远征军，紧急开赴缅甸，与盟军共同对日作战。作为亚太地区盟军对日作战的重要战略基地，中国为同盟国提供了大量战略物资和军事情报。中国军民还对在作战中负伤的盟军飞行员进行救援，至1945年春，先后被营救的美军飞行员即达70余名，其中包括后来曾任美国总统的吉米·卡特，有力地支援了同盟国的反法西斯斗争。

在战争期间，中国是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积极倡导者和有力推动者，从根本上保证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

早在全面抗战爆发前的1937年3月，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的谈话中，就提出了中、美、英、苏、法建立太平洋联合战线的主张。中共中央在1941年12月9日公布的《中国共产党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中，明确指出：“中国与英美及其他抗日诸友邦缔结军事同盟，实行配合作战，同时建立太平洋一切抗日民族的统一战线，坚持抗日战争至完全的胜利。”在中国的推动下，1942年1月1日，由中、美、英、苏4国领衔26个国家，在华盛顿签署了《联合国宣言》，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正式形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的持久抗战，有力地配合了同盟国的反法西斯战争，赢得了国际上的高度赞誉与评价。美国总统罗斯福在1945年1月6日致国会的国情咨

文中表示，“忘不了中国人民在七年多的长时间里怎样顶住了日本人的野蛮进攻和在亚洲大陆广大地区牵制住大量的敌军”。苏联崔可夫元帅在其回忆录中也表示，“甚至在我们最艰苦的战争年代里日本也没有进攻苏联，却把中国淹没在血泊中。稍微尊重客观事实的人都不能不考虑到这一明显而又无可争辩的事实”。总之，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开始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抗击日军最多，付出代价最大，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亚洲主战场，对彻底战胜日本法西斯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三、伟大的抗战精神是实现中国梦的精神动力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虽然距离今天已经整整过去了70年，但抗战精神应当永久存在于每个国人的心中。在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弘扬抗战精神，勿忘国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时代赋予的重要使命。

2014年7月7日，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77周年活动上，习近平同志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新的历史条件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要大力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不断增强团结一心的精神纽带、自强不息的精神动力，继续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奋勇前进，不断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成就告慰我们的前辈和英烈！”同年9月3日，习近平同志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9周年座谈会上，进一步指出了抗战精神的内涵：“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壮阔进程中，形成了伟大的抗战精神，中国人民向世界展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可以说，伟大的抗战精神，是全国人民万众一心，百折不挠，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精神动力，对于当今时代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团结一心，实现祖国统一的核心力量。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共同对敌的一场全民族战争。抗战期间，全国各族人民不分党派，不分阶级，不分阶层，纷纷义无反顾地投入到保家卫国的滚滚洪流中，筑起了捍卫中华民族的钢铁长城。抗战精

神，仍然是当今沟通海峡两岸，包括海外华人的一条重要纽带。近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推动下，两岸的沟通、联系越来越多，各种学术交流也日益频繁，进一步密切了两岸关系。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始终领导中国人民团结一心，积极致力于祖国统一大业的早日实现。

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维护国际和平秩序的核心力量。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积极提倡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主张联合世界其他国家共同抗击德意日法西斯国家的侵略，以尽早恢复世界和平。不仅如此，中国共产党还在战争期间积极参与国际事务，1945年联合国制宪会议在美国旧金山召开，会议最终通过了《联合国宪章》，中共代表董必武出席了会议，并作为中国代表团正式成员之一在《宪章》上签了字，表明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支持并参加了新的国际安全组织的建立，参加了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二战后国际秩序的建立。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吸收了反抗日本侵略的历史经验，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主张在国际交往中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至今仍然是中国对外关系的重要准则，在国际上广受承认和欢迎。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努力维护国际秩序的和平与稳定。

不忘抗战历史，弘扬抗战精神，是当代每个国人的神圣使命，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言：“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当年，中国人民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用鲜血和生命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铸就了伟大的抗战精神！其后，从解放战争到改革开放，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又战胜了无数的曲折和困难，而蕴含于其中的伟大力量，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对抗战精神的继承。如今，抗战精神依然充满无限的生机与活力，是中华民族在伟大复兴征程上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和力量源泉。作为新时代的主人翁和建设者，我们应当从抗战精神中汲取营养，将伟大的抗战精神转化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强大动力，勤奋学习，扎实工作，奉献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追求之中，不断以新的辉煌成就来告慰抗战英烈和前辈！

《人民日报》，2015年6月17日

对“抗战精神”的哲学思考

刘庭华

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战争，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侵略斗争中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最辉煌的民族解放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战胜一个法西斯强国的战争。

这场战争，既是中日两国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的较量，也是中华民族与日本大和民族在意志和精神方面的一场较量。

“抗战精神”，是中华民族爱国主义传统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发展与升华，它为战胜日本法西斯发挥了强大的动力源泉和精神支撑的作用，是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抗战精神”有四个重要特点：一是从国家、民族、阶级与政党的关系上说，它是属于全民族的，而非某一阶级或政党的。二是从地理上讲，它是全国性的，而非某一区域的。三是从时间上讲，它是富于时代特点的，即中华民族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在20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的集中体现。四是从认识论的哲学层次上讲，它是中华民族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战争实践的思想认识的抽象与概括。

一、坚持国家和民族利益至上的爱国主义，团结御侮，共赴国难，是“抗战精神”的核心内涵，也是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决定因素

中华民族有着深厚的爱国主义传统，历来崇尚正义、热爱和平，不畏强

暴，勇于反抗外来侵略。1840年鸦片战争后，由于晚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以及后来封建军阀的争地盘混战，和投靠列强所采取的妥协投降政策，使中国屡遭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蹂躏，国家主权和领土不断受到侵蚀，中国因外敌入侵不断被迫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中国人民奋起反抗外敌入侵的斗争，一次又一次地遭受失败，地大物博的中国成为西方列强眼中的“唐僧肉”。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把中华民族逼到“亡国灭种”的危难地步，同时也唤起了全民族的危机意识和使命感。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较以前任何时代都表现得更强烈、更广泛、更持久、更具战斗性，它超越了阶级、阶层、政党、地方实力派和不同军事集团。抗日战争时期的爱国主义具体表现为：爱国须抗日，抗日即爱国；一切为了抗日，抗日高于一切。可以说，抗日成了全民族不同阶级、阶层、政党、派别、各军事集团的共同信念，是否坚持抗日成了区分是否爱国的唯一标准。各阶级、各政党、派别和各军事集团均能以民族国家利益为重、坚持民族国家利益至上，舍去历史上的旧有恩恩怨怨，自觉地使自己的利益服从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这个最高的民族利益，为祖国的危亡、民族的命运，捐弃前嫌，团结一致，万众一心，共赴国难。这也是伟大抗战精神的核心灵魂和本质。

近代反侵略斗争史告诉我们，光有爱国主义精神还不足以打败外敌入侵，只有以爱国主义精神凝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共赴国难，才能战胜敌人。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巩固和发展，是抗战时期爱国主义精神的核心体现，是爱国至上，团结御侮的最好明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基本保证。

国民党与共产党是近现代中国历史舞台上两支最为重要的政治力量。上世纪20年代初，为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统治，两党合作北伐，取得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胜利。国共两党虽然政治信仰和追求不同，并且由于十年内战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敌，但面对“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抗日救国成为两党共同的最高目标。

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成为凝聚人民力量的坚强组织者和鼓舞者。日军的主要对手，既不是甲午战争时期腐朽、软弱、无能的晚清政府，也不是签署二十一条的窃国大盗袁世凯政权，和九一八事变时采取不抵抗政

策的蒋介石国民党政府，而是一个团结起来的伟大的中华民族，其中特别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以国家和民族解放为己任的中国共产党。随着中日民族矛盾逐渐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从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逐步调整自己的斗争方针。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首先提出武装抗日的爱国主义主张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此后，中国共产党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了艰辛的努力，不断调整政策，将“抗日反蒋”改变为“逼蒋抗日”及至“联蒋抗日”，从而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推动了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最终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实现了全民族抗战。

国民党作为中国“最大和最有影响的党”，在九一八事变后仍一直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内战政策，丢失了东北三省和华北不少国土，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和谴责。1935年“华北事变”后，蒋介石面对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迫近，和华北即将成为第二个“满洲国”的危险，也开始逐步调整政策，由对日妥协转向强硬，内政上逐渐变“攘外必先安内”为“攘外”与“安内”并举。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后，国民党采取联共抗日的政策。七七事变后，国民党政府承认了共产党和其他党派的合法地位，接受并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从而促进了空前的全国性团结救亡高潮，形成了举国一致全民族抗战的新局面。

中国的民主党派，抗战前大都既反对国民党蒋介石的一党独裁专政，又不赞成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一直从事第三条道路的斗争。但是，在七七事后，他们纷纷改变了自己的政治主张，或放弃反蒋，或放弃反共，都把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当国共两党结束了十年内战实现了第二次合作时，各民主党派都表示坚决支持和拥护，并积极加入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

国民党中的政治、军事集团及地方实力派，在七七事变前，为争权夺利，一直明争暗斗，上演了一幕幕军阀混战的闹剧。但随着中日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他们逐渐认识到，只有全国团结一致共同抗日，中国才能免遭灭亡，因而公开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内战政策，主张联共抗日，力促团结抗战。到全国抗战爆发后，各政治、军事集团和地方实力派全都归顺国民政府，团结一致共同抗日。

在八年全国抗战中，国民党顽固派先后发动三次大的军事摩擦，使全国抗战的大好局面出现分裂、倒退的危险。对此，中国共产党始终没有放弃同国民党的合作抗日，提出“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方针，并适时采取既联合又斗争的策略，始终把自己的斗争目标限制在不破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底线上，处处以民族大义为重，从而有效地阻止了时局的逆转，维系了国共合作、团结抗战的局面，并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各民主党派对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限制民主运动发展的行径十分愤慨，但也从民族利益的大局出发，配合中国共产党自觉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参加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的各阶级、各政党、派别、各军事集团，虽然也为各自的利益斗争过、磨擦过，有时甚至矛盾十分尖锐，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却始终没有破裂，一直坚持到抗战最后胜利。空前的民族团结，是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大觉醒的生动体现，是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决定因素。

二、发扬自强抗争、敢于同敌人血战到底的信念，是“抗战精神”的显著特点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是各国人民相互支持，共同战斗所取得的成果。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曾经得到过有关国家的援助（比如，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援外租借物资共 485 亿美元，其中英国所得占 63.71%，苏联所得占 22.76%，中国所得占 1.8%，约 7.48 亿美元），但主要是中国人民自强独立抗争，不畏强暴，敢于同敌人血战到底；发扬开拓创新精神，坚忍不拔，坚持持久抗战，长期浴血奋战的结果。

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时间最长。从 1931 年九一八事变中国人民揭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序幕开始，到 1945 年 9 月 2 日日本战败投降，前后达 14 年之久。从九一八事变到 1941 年 12 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在长达 10 年的时间里，中国人民独立坚持抵抗日本法西斯侵略军，是东方唯一的反法西斯战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战场仍然是东方反法西斯战争的主要战场。从 1937 年七七事变中国全国抗战爆发，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爆发点后，中国人民开辟了世界上第一个大规模的

反法西斯战场，独立坚持抗战也有4年多的时间。

据日本防卫厅战史研究所战史室资料载：1937年，日本陆军共24个师团，其中21个师团投入侵华战争，占其陆军总兵力的88%以上，还有50%的空军和40%的海军用于侵华战争。1938年日本陆军共34个师团，其中32个师团用于侵华，占其陆军总兵力的94%。1939年，日本陆军共41个师团，其中34个师团投入侵华战争，占其陆军总兵力的83%以上。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陆军共51个师团，其中用于侵华战争的有34个师团、44个独立混成旅团，仍占其陆军总兵力的80%，而用于南太平洋战场的日本陆军只有10个师团，不及其侵华兵力的20%。

在八年全国抗战期间，中国战场始终抗击和牵制100万左右的日本陆军主力，和五分之二日本海空军力量，使其既不能回援太平洋战场和日本本土“决战”，也无力在中国大陆或参加东北地区支援关东军决战，最后不得不在中国放下武器，无条件投降。1945年9月，日军向中国战区投降的兵力达128.3万余人，这个数目超过了在东南亚及南太平洋各岛投降的日军的总和，大约相当于全部海外日军（不含向苏联投降的日军人数）的50%以上。中国战场毙伤俘日军155.9万余人，占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军队伤亡人数的75%以上。历史证明，中国抗日战争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中国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四强（苏、美、中、英）之一，成为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是世界各国人民对中国抗战地位作用的认可。

在空前惨烈的抗日战争中，面对武器精良的日本法西斯军队，不管是正面战场打破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速战速决神话的淞沪、忻口、徐州、武汉会战，还是在山区平原广泛开展游击战的八路军、新四军的敌后抗战，中华大地到处涌现出不畏强暴、勇于同敌人血战到底的民族英雄气概。誓死不投降坚守四行仓库的国民党军八百勇士，浩气长存的八路军狼牙山五壮士和新四军“刘老庄连”，宁死不当亡国奴而英勇献身的东北抗联八女投江……中国军民以血肉之躯筑起了捍卫祖国的钢铁长城，用同敌人血战到底、同归于尽的英雄气概，谱写了自强抗争的爱国主义新篇章。涌现出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戴安澜、杨靖宇、赵尚志、左权、彭雪枫等抗日名将，他们是中国人民不畏强暴、英勇抗争的英雄集体和杰出代表。

为什么中国人民具有如此强大的自强抗争的民族信念和敢于同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

这是自强不息民族精神的传承与升华。“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自强不息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显著特点。从春秋战国至今的近3000年里，特别是从宋、明以后，中国大地上，战乱、贫困、天灾、人祸，连年不断，中国人民的生活经常处在没有安全感的饥寒交迫困境中，“多难兴邦”，中华民族素有在亡国灭种的危境中开辟出民族复兴新道路的精神，从而造就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坚忍不拔的品格。

在20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的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精神得到充分展现，并发展成为自力更生，开拓创新的民族品格，成为抗战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依靠自力更生，百折不挠的民族勇气，开辟弱国打败强国的中华民族复兴的新道路，是“抗战精神”的独有特色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的生产力、军力、民力，都远不如日本，敌强我弱的国情军情，要求中国人民必须开拓新的理论思维和作战形式，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首先，实行全面全民族的人民战争的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及作战原则，创造游击战与正规战相配合的作战形式。

制定正确的抗战路线和战略方针，是取得抗战胜利的基本保证。实行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是指导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成功战略，弱国要战胜强国，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不断削弱敌人；积小胜为大胜，逐渐壮大自己的力量，从而达到转换敌我力量的对比，夺取反侵略战争的最后胜利。为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抗日战争敌强我弱、敌退步我进步、敌小我大、敌寡助我多助四个基本特点，科学预见抗日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并认为相持阶段是抗战时间最长、最艰苦，但它是转换中日力量的“枢纽”。持久战三阶段理论的提出，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信心和决心。

同时，全国抗战一开始，中国共产党就提出了实行全国总动员，全民、

政府和军队团结一致抗战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为此，提出建立主力军、地方军和民兵游击队三结合的抗日武装力量体制，是进行人民战争的最佳组织形式，以激发广大军民的爱国主义热忱，发挥全民族抗战的自觉能动性，“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兵民是胜利之本”，（《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11、509页）从而形成陷日军于灭顶之灾的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以弥补中国军民武器装备落后等不足。

决定战争的胜负，除了要有军事、经济实力和精神支撑外，还必须有正确的战略战术指导方针。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特别是敌后战场的开辟和发展，正是按照毛泽东的持久战思想和游击战理论，一步步走向胜利，创造了以弱胜强的战争史奇观。战后，日本著名学者伊藤宪一把毛泽东的持久战思想归结为“以动员人民的战略和游击持久的战略，来实现弱者对付强者的战略理论”。（伊藤宪一：《国家与战略》〈中译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94页）原日本大本营参谋山崎重三郎认为“世界上虽然有各种各样的游击战争，但只有毛泽东率领的中国共产党军队在抗日战争中进行的游击战堪称历史上规模最大、质量最高的游击战。他的游击战和运动战相结合，在中国打败了日本人”。（[日]《丸》杂志，1965年12月号）基辛格在1957年所著《核子武器与外交政策》一书中评价：《论持久战》的显著特点是善于作敌我情况的对比，善于将列宁主义的原理运用于中国的实际情况。……中国打败日本的最大优点，就是它的持久战思想。

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历史说明，先进的军事理论，对于弱国战胜强国，有着不可估量的指导作用。由于抗日战争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悟和团结的程度，从而最大限度地唤起了全民族的危机意识和使命感，中国军民以正规战与游击战、前方与后方、武装与非武装、公开与非公开、军事与经济、文化等手段，密切结合，特别是敌后战场的广大军民广泛开展伏击战、破袭战、地雷战、地道战等战术，使日本侵略军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14年浴血奋战，终于打败了凶残的日本侵略者。

其次，开辟敌后战场，与正面战场相配合，对日军形成战略夹击的战略格局，是中国人民的独特创举。

中国抗日战争是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条件下进行的，在反对日本侵略的统一战略目标下，国民党军队担负着正面战场的作战，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担负敌后战场的作战，形成相互配合，相互依存的两个战场。这一特殊的战争形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乃至中外战争史上都绝无仅有。这是中国抗日战争的显著特点。正面战场起主战场的作用，而敌后战场的开辟，也可以独当一面，它打乱了侵华日军前线与后方的区分，变战略内线为战略外线，变战略包围为战略反包围，与正面战场相呼应，对日军构成两面夹击的有利战略态势，这是中国能坚持持久抗战，最后战胜日本法西斯的有效作战模式。这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开拓创新的民族精神。

《红旗文稿》，2015 第 10 期

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柳建辉 李庆刚

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反抗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是中华民族由衰落走向复兴的伟大转折。中华民族英勇抗战的历史惊天地、泣鬼神，伟大抗战精神昭日月、铭青史。今天，我们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就要大力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神聚力。

习近平同志指出：“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壮阔进程中，形成了伟大的抗战精神，中国人民向世界展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昨天的硝烟已经散去，但沉痛的历史不能遗忘，伟大的抗战精神必须代代相传。

弘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精神。抗日战争是一项伟大的民族解放事业，它与鸦片战争以来历次反侵略战争的最大区别在于实现了全民族的广泛参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旗的召唤下，抗日战争成为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社会各界、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各抗日团体、各社会阶层和海外侨胞等广泛参与的全民族抗战。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民团结起来，中国人民的力量凝聚起来，实现了百年来不曾有过的举国奋起，拥有了开展人民战争的无穷力量。在这场救亡图存的伟大斗争中，母亲送儿打日寇，妻子送郎上战场，男女老少齐动员，由涓涓细流汇聚成势不可挡的救国洪流，亿万中国人民形成了举国御侮的生动局面。当前，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迫切需要每一个中华儿女行动起来，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承担应有责任、奉献聪明才智。

弘扬“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精神。从古至今，中国的仁人志士崇尚舍生取义。“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等诗句，就是这种价值尺度和道德标准的反映。这是千百年来积淀于民族血脉之中的中华之魂，是中华民族历经劫难而不衰、饱经沧桑而永葆生机的内在基因。在抗日战争中，许许多多中华儿女“是争着死，抢着死，因为大家有绝对的信仰，知道牺牲自己，是换取中华民族子子孙孙万代的独立自由”。当前，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没有外敌入侵，无须时刻面临生死抉择的考验。但我们仍然需要这种“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精神，能够为理想而奋不顾身去拼搏、去奋斗、去献出自己的全部精力乃至生命。

弘扬“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精神。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毛泽东同志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指出：“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这是何等的勇气和气魄！七七事变爆发时，日本侵略者狂妄宣称三个月灭亡中国。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甘愿征战血染衣，不平倭寇誓不休。”在抗日战争中，中华儿女以爱国相砥砺、以救亡为己任，以不畏强暴的英勇抗争打败了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者。杨靖宇、赵尚志、左权、彭雪枫等一批抗日将领，八路军“狼牙山五壮士”、新四军“刘老庄连”等众多英雄群体，就是中国人民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杰出代表。当前，如期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是一场新的攻坚战。我们要继承抗战时期中华儿女“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精神，敢于迎难而上、攻坚克难，为实现民族复兴而不懈努力。

弘扬“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精神。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抗击法西斯侵略的国家。日本侵华战争的凶恶性和残酷性，决定了中国军民必须进行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从九一八事变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国以落后的武器装备独立抗击日本法西斯达10年之久。在抗日战争中，中华民族能够克服千难万险并坚持到底，没有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精神是做不到的。这种精神，使中国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和同盟国中的重要一员，自始至终抗击着日军主力，先后粉碎了日本“北进”与“南进”计划，有力配合了盟军尤其是太平洋战场盟军的作战。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抗

日战争的胜利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当前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托举实现中国梦的伟大理想。我们必须继承和弘扬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精神，奋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

《人民日报》，2015年8月19日

太行精神



结合新的实际与时俱进地大力弘扬太行精神，坚定正确的理想信念，始终保持对党对人民对事业的忠诚；坚持执政为民的政治立场，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锤炼坚忍不拔、百折不挠的品格，始终保持知难而进、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坚守党的政治本色，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为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2009年5月24日至26日，习近平在山西调研时强调

太行精神的内涵与由来

胡 玥

太行精神，是以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聂荣臻、徐向前等老一辈革命家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而形成的民族精神，是中国共产党领导英雄的太行军民用鲜血和生命谱写的革命精神。太行精神的实质与要义就是：不怕牺牲、不畏艰险；百折不挠、艰苦奋斗；万众一心、敢于胜利；英勇奋斗、无私奉献。巍巍太行山孕育的中华民族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和革命的英雄主义精神，光耀千秋，彪炳史册。

“太行浩气传千古”。2009年5月25日，习近平同志在视察八路军太行纪念馆时，对太行精神做出了最新的诠释和解读：“结合新的实际与时俱进地大力弘扬太行精神，坚定正确的理想信念，始终保持对党对人民对事业的忠诚；坚持执政为民的政治立场，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锤炼坚忍不拔、百折不挠的品格，始终保持知难而进、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坚守党的政治本色，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为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不怕牺牲不畏艰险

太行精神是不怕牺牲、不畏艰险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以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己任，领导八路军和太行儿女，与凶残的日本侵略者进行殊死的斗争，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不朽的民族之魂，在人们心中树立起一座永恒的丰碑。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战略部署，朱德总司令率领八路军强渡黄河，挺进太行。八路军总部和中共中央北方局长期驻扎在太行山区，领导和指挥敌后抗日军民建立了晋绥、晋察冀、晋西南、晋冀鲁豫等抗日根据地，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八路军将士前赴后继，浴血奋战，有力地打击了日军的疯狂进攻，大量地杀伤并牵制了敌军，有效地迟滞了日军对中国全境的侵略，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谱写了中华民族万众一心、同仇敌忾的光辉抗战篇章。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转战太行，115师首战平型关，120师设伏雁门关，129师奇袭阳明堡，打出了八路军的雄威。1938年3月神头岭伏击战歼敌1500人，是抗战初期歼灭日军最多的一场战斗。1939年11月黄土岭战役击毙日军“名将之花”阿部规秀中将，开创中国抗战后首次在战场击毙敌军中将的纪录。1940年8月至1941年1月进行的“百团大战”，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战斗志。1943年10月韩略村伏击战，全歼日军“战地参观团”少将以下军官120多名。从1942年10月至1945年4月，八路军对日伪军进行了长达两年半的沁源围困战，先后作战2730多次，毙伤日伪军4000多人，创造了“敌后抗战的模范典型”。

“捐躯赴国难”，八路军将士奋战在杀敌战场，以身殉国，血染太行。他们当中有八路军的普通一兵，也有共产党的高级将领；有投笔从戎的大学教授，还有爱国归侨的巾帼英雄……1937年9月25日，在平型关战斗中，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曾贤生再上战场。外号“猛子”的他率领五连首先冲入敌阵，以大刀、刺刀打出了八路军的威名，在拼杀10多个日军后，不幸被刺，壮烈牺牲。在整理遗物时，悲痛的战友们发现：在曾贤生连长的军衣口袋里，用鲜血写就的决心书中尚紧紧包裹着准备交给组织的最后一次党费。

杨裕民早年赴美国赛瑞术斯大学学习造纸专业并获博士学位，回国后任河北省立工学院教授，成为著名的造纸专家。1938年11月，朱德总司令电召杨裕民到八路军总部。频繁的战斗和行军，使杨裕民的胃病日益严重。1939年夏，日军集中兵力向晋东南进行“九路围攻”，任冀东抗日联军第1路政治部主任的杨裕民在随部队转移途中，他的心脏永远停止了跳动。50岁的杨裕民，把一腔爱国情怀融入太行深处。

祖国的灾难，深深牵动着海外赤子的心，李林、黄登保、谢宾元等，怀着炽热的爱国之情踏上回国的征程。归国女华侨李林练就了百步穿杨的好武艺，她率领独立支队骑兵驰骋太行，屡建战功，贺龙称赞她是“我们的女英雄”。1940年4月，日伪军集中万人兵力对晋绥边区进行“扫荡”，为了掩护机关和群众突围，已任雁北支队支队长的李林不顾怀有3个月的身孕，率骑兵连勇猛冲杀，身负重伤后仍英勇抗击，毙伤日伪军6人。陷入重围的她宁死不屈，用最后一发子弹射进喉部，年仅25岁的李林牺牲在她最美的年华。

巍巍太行山上，痛失了我党、我军一位杰出的高级将领——左权。1942年5月，日军对太行根据地进行“铁壁合围”大“扫荡”，为掩护机关突围，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将军率部出征，在突破敌人最后一道防线时不幸中弹牺牲，一位才华横溢、智勇双全的八路军高级将领为了拯救民族的危亡，献出了年仅37岁的宝贵生命。朱德总司令沉痛赋诗悼念：“名将以身殉国家，愿拼热血卫吾华，太行浩气传千古，留得清漳吐血花。”太行军民为了永远缅怀和纪念左权将军，将他的牺牲之地辽县改名为左权县，从此左权县的名字便永远地镶嵌在中国的版图上。

八路军将士英勇奋战，无数先烈血洒太行。从1937年10月到1944年10月，根据地129师主力部队对日伪军作战共19777次，毙伤日伪军120241人；太行区民兵自卫队共作战33716次，毙伤俘伪军11409人。在8年的全面抗战中，八路军将士付出了巨大牺牲，据不完全统计，晋绥军区指战员牺牲1.3万多人，晋察冀军区指战员牺牲7.1万多人，晋冀鲁豫的太行区和太岳区将士牺牲1.3万多人。“我以我血荐轩辕”，他们为雄壮的太行山脉增添了血染的风采。

百折不挠艰苦奋斗

太行精神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百折不挠、艰苦奋斗的精神。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里，党领导广大军民开展生产自救和互助运动，使太行山区成为党领导敌后抗战的坚强堡垒，成为中国革命不断取得胜利的前进基地。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者狂妄叫嚣“一个月拿下山西，三个月灭亡中国”，先后发动了“三路围攻”“八路围攻”“九路围攻”，实施“囚笼政策”“蚕食政策”“三光政策”，发动“百万大战”“铁壁合围”，对根据地进行了疯狂的“扫荡”和反复的“围剿”。仅1941年和1942年的两年间，日军对晋冀豫边区的大“扫荡”就有19次，中、小扫荡高达500多次。日本侵略者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许多村庄被毁，无数民众被害，粮食被抢，庄稼被毁，凶狠残忍，令人发指。

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里，面对敌人的扫荡围剿以及严重的自然灾害，我党积极组织军民一边战斗一边生产，开展生产运动和纺织竞赛。从八路军的总司令、部队首长、地方干部到普通士兵，都和老百姓一道艰苦奋斗开荒种地，纺线织布，结下了深厚的军民鱼水情谊。八路军将士勒紧裤带，把自己从牙缝里省出来的粮食拿出来救济群众，甚至冒着生命危险，把自己最后的粮食送给最需要的老人和儿童。可亲可敬的太行民众宁可自己挨饿，也把粮食源源不断地送给八路军。

太行军民一边杀敌，一边生产。“一等杀敌英雄”马应元把身边的民兵和群众组织起来，进行劳力和武力结合的“游击生产”。在1943年5月的反“扫荡”中，他一次布雷13处，炸死炸伤日军90多人，缴获步枪11支，子弹500多发，成为山西抗日根据地家喻户晓的抗战英雄。在1944年举行的太行山区第一届群英大会上，马应元获得“一等杀敌英雄”光荣称号。后来马应元在突围中被俘，敌人抓来他的妻子等亲人胁迫他投降，都被他严厉拒绝，最后宁死不屈，英勇就义。

抗日烽火，巾帼风采，面对日军的猖狂进攻和残酷杀戮，太行民众“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纷纷投入到抗击日寇的伟大战斗中，用大爱和辛劳撑起了根据地半边天。石榴仙、赵月娥、宋月兰、李秀莲等，都是心灵手巧的纺织能手。纺织英雄石榴仙参加了妇救会，带动广大妇女纺纱织布，制作军鞋，支援抗战军民，使马堡成为全县发展生产、支援抗战的模范村。她以每日纺纱十两、织布两丈的高超纺织技术，被评为太行一等劳模，荣获“纺织英雄”锦旗一面。

“送儿打东洋”的母亲李改花，是太行山深处武乡县人，这位深明大义的母亲，先将自己的二儿子送出山外去寻找八路军。1943年在一次日军

的“扫荡”中，她的丈夫被日军用开水活活烫死，在含泪掩埋了丈夫的遗骨后，她又把三儿子送到八路军当了工兵。数月后，在爆破敌人的碉堡时，三儿子英勇牺牲在安阳城下。噩耗传来，李改花正在为支前纺线织布，从此之后，李改花将仇恨和悲痛深深埋在心底，没日没夜纺纱织布、缝制军鞋。1945年初，已是60多岁白发苍苍的李改花，又把最后的一个儿子也送上了战场。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人民，才有了战无不胜的军队，抗日战争是人民的战争，离不开人民的参与和支持，太行人民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太行山每一个地方、每一块土地，都留下军民同仇敌忾、艰苦奋斗的事迹。在太行山区遇到了前所未有灾难的1942年，129师与太行人民生死与共，同舟共济，刘伯承、邓小平、杨秀峰在黎城和涉县一带，亲自与当地军民一起修建了漳南大渠，浇灌沿途4000多亩土地。129师刚进太行山时，只有3个旅9000多人，经过8年的浴血奋战，到1945年已经发展成为30万铁骑的浩荡大军，踏上解放的征程。

万众一心敢于胜利

太行精神是为民族解放万众一心、敢于胜利的精神。党和八路军在山西和整个华北敌后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抗日民主力量，组织游击队、农救会、青救会、妇救会、儿童团、国际友人等，形成万众一心、团结一致的全民抗战热潮。

抗日的烽火燃烧在太行山上，在反“扫荡”作战和反“蚕食”斗争中，太行人民创造出许多战术，如伏击战、麻雀战、破袭战、围困战、窑洞战、地雷战等，使敌人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广大群众组织起担架队、运输队、警戒队，运送物资，救护伤员，打扫战场，维持治安，使战争的军需供应和战勤服务得到了充分保障。妇女和儿童也纷纷组织起妇救会和儿童团。整个太行山区，“村村像军营，人人都是兵，抗日根据地，一片练武声”。

国难当头，由120多名太原成成中学教师和学生组成的抗日义勇军走出课堂，投笔从戎。他们在参战宣言中写道：“捍卫祖国的责任是我们的，

我们应当为了祖国的生存流最后一滴血。”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他们为创建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作出了特殊贡献。他们从容赴死，共赴国难，50多名师生血洒青山，他们大都十八九岁，小的只有十三四岁，被誉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青年运动的一面旗帜”。他们中有父子刘墉如、刘海清，有兄弟焦国鼎、焦国柱……

抗日战场巾帼不让须眉，广大妇女不仅成立了妇救会，还组织起妇女自卫队。她们与男自卫队员一样学射击、练投弹，一道埋地雷、割电线。有着“当代花木兰”之称的王九焕是太行山区武乡县人，抗战初期，强烈的爱国热情驱使她剪掉长发，女扮男装投奔八路军。在部队6年的时间里，她作战勇敢，出生入死，无人知晓她是一名巾帼英雄。1944年在辽县的一次战斗中，为保护受伤的连长，王九焕自己也身负重伤，在做手术时才真相大白，被誉为“八路军中的花木兰”。

自古英雄出少年，在民族危亡时刻，他们用年轻的生命，化作太行山脉最灿烂的霞光。王朴机智勇敢，11岁时被大家推选为儿童团团长，牺牲时只有13岁，面对死亡，他毫不畏惧，大声高呼“打倒日本鬼子！打倒狗汉奸！”抗日小英雄李爱民也是抗日儿童团团长，一天，八路军让他去送一件“火急”信。到了敌人的封锁区，他灵机一动，抓起一把稀牛粪涂在身上，鬼子看见他满身是粪以为是放牛郎，一脚把他踢倒调头而去，小爱民忍着剧痛顺利完成送信任务。后来他为了保护乡亲而落入敌手，倒在了鬼子的屠刀下。那年，这位抗日小英雄年仅12岁。

太行山高，漳河水长，太行母亲的情义山高水长。她们不顾生死，不畏艰辛，甚至冒着生命危险，用她们甘甜的乳汁哺育着八路军将士的后代，她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太行奶娘。一天，日寇进村扫荡，村民们纷纷逃往山上，生死关头，赵引弟抱起八路军的两个孩子就走，把自己的两个孩子留在家中。等敌人走后回到家里，赵引弟发现自己的两个孩子已经被日寇杀害。还有一位奶娘，在鬼子大扫荡时为保护革命后代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太行山的奶娘谱就了可歌可泣的母亲之歌，她们付出的不仅仅是乳汁和生命，更有大写的母爱，她们的名字叫郭金梅、武巧凤、赵志珍、王改云、王巧鱼、张招弟、赵引弟……

英勇奋斗无私奉献

太行精神是为人民利益英勇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在领导太行人民坚持抗战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表现出为了人民的利益敢于牺牲的精神，不屈不挠的斗争气概，热爱民众的高尚情操，充分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

巍巍太行山上，八路军将士和根据地人民谱写了百折不挠的英雄华章，铸就了中华民族英勇不屈的太行魂。他们血战沙场，并肩作战，人民军队和人民群众结下了深厚的鱼水之情，凝聚起全民抗战、共同杀敌的坚强力量。八路军将士和老百姓休戚与共，同仇敌忾，涌现出无数的支前模范和太行山母亲，许多群众为了掩护八路军战士而付出自己的生命，不少将士为了群众的安危而壮烈牺牲，把生命永远留在太行山上。

国破家亡无佳节。1942年2月春节期间，敌人纠集武乡县的4000多名日伪军，疯狂向大有镇扑来。为了掩护大有镇附近50多个村庄的老百姓安全转移，八路军太行军区第3军分区的司令员郭国言进行严密部署，亲自指挥这场战斗。他率部打退敌人一次又一次的疯狂冲锋，恼羞成怒的敌人密集火力狂轰滥炸，稠密的炮弹呼啸而来，瞬间硝烟弥漫，弹片横飞。突然，一颗炮弹飞来，年仅29岁的优秀指挥员郭国言不幸中弹，壮烈牺牲。

夏收刚刚结束的1943年，敌人纠集了200多名日伪军向枫子岭发动袭击。担任八路军新编第10旅第30团政委的马定夫果断下达战斗命令：“同志们，我们的口号是：有我们就有群众。我们决不能让群众受到鬼子的伤害！”马定夫带领部队顽强地抵抗敌人的进攻，直到枫子岭的1000多名干部和群众安全转移。马定夫在这次战斗中腹部中弹，年仅29岁的他因伤势过重不幸牺牲。为了永远怀念这位太行抗日英雄，太谷县将枫子岭村改名为“马定夫村”。

“子弟兵的母亲”胡春花送军粮、做军鞋、抬担架、洗血衣，把自己全部的爱都献给了八路军，献给了抗击侵略者的人民战争。1941年著名的黄崖洞保卫战打响，胡春花带领一支由当地妇女组成的担架队，一次又一次地从战场上救下伤员。一次，在敌人的飞机俯冲下来的一瞬间，她用自己的身体掩护担架上的伤员，被敌人的炮弹炸得鲜血淋漓。一天，她去黎城送军粮，只能把得了急病的女儿放在家里，等她回来时女儿昏迷不醒，在

送往分区医院的路上，4岁的女儿在她的怀抱中永远停止了呼吸。

在这片英雄的热土上，伫马太行的八路军高级将领们身经百战，战功卓越，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立下不可磨灭的丰功伟绩。这些共和国的将帅们走后魂归太行，他们的英灵与太行山脉一起绵延，成为中华民族不屈的脊梁。在河北省邯郸市涉县赤岸村北，刘伯承、徐向前、黄镇、李达、王新亭等八路军129师领导人长眠在太行山上，凝视他们曾经并肩战斗浴血奋战的地方。太行人民亲切地把这里称为“将军岭”，表达了他们对这些共和国将帅们的深切缅怀和不尽思念。

红日照遍了东方，千山万壑，铁壁铜墙，以巍巍太行为依托的晋冀鲁豫边区是八路军坚持抗战的坚强堡垒，八路军指战员和广大人民群众百折不挠、浴血奋战、不怕困难、团结御侮的民族精神和英雄气概永驻太行。太行精神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座丰碑，书写了中国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的壮丽史诗，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从历史走到今天，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抗日战争艰苦环境中所产生和形成的太行精神将与新时代同行。

《人民政协报》，2017年12月21日

抗日烽火铸就太行精神

王 科

太行精神铸就了英雄的太行军民，太行军民孕育了英雄的太行精神。

太行精神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八路军和太行儿女展现的不怕牺牲、不畏艰险，百折不挠、艰苦奋斗，万众一心、敢于胜利的精神。

弘扬太行精神，是保护国家主权、维护世界和平的需要；是激发民族自信、保障经济发展、实现全面小康的需要；是传承传统文化、彰显民族气节、实现中国梦的需要。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70 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民族抗战在中华历史和世界史上谱写了光耀的篇章。特别是我党领导的八路军，同太行人民共赴国难，浴血抗敌，在八百里太行山上奏响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辉煌赞歌，并凝聚成伟大的太行精神。

太行精神孕育、形成于艰苦卓绝的抗战时期，是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我们党以民族独立和解放为己任，领导全国人民不屈不挠、奋勇抗争的伟大壮举，是八路军与太行根据地人民同甘共苦、浴血奋战的英雄史实的真实写照，是我们党、人民军队和中华民族抗战精神的体现，是我们中华民族取得民族独立和解放的精神法宝，更是我们推进“四个全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动力。

太行精神的形成

1937 年 7 月，日本侵略者大举向中国进犯，开始了全面的侵华战争。“卢沟桥事变”之后，日本增兵 50 万来华，做出了“欲占领中国，必先占

领华北，欲占领华北，必先占领山西”的战略部署，并提出了“一个月拿下山西，三个月灭亡中国”的战略目标。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发布了《关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宣布将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总兵力4.5万人，兵分三路挺进太行。八路军开赴山西前线，挺进太行山，用八路军的军魂点亮了太行之巅的烽火，为太行精神的产生播下了火种。

女娲补天、神农尝百草、后羿射日、精卫填海、愚公移山，太行山上的这些神话传说，向世人言说着太行儿女与生俱来的“精神天赋”。这些久远的神话传说，铸就了太行人民粗犷豪放、疾恶如仇、刚毅坚强的性格，这正是太行人民斗天斗地斗敌人的遗传基因和精神源泉。八路军挺进太行山，唤醒了这些久远的传说，激发了中华民族的战斗意志。八路军的军魂与太行儿女骨子里流淌了几千年的英雄气质，在这八年的艰苦抗战中相互激发、渗透、交融，最终孕育形成了伟大的太行精神。

太行精神是太行儿女无畏、不屈、敢于抗争的民风，是八路军敢战、善战、勇于胜利的军魂，是太行儿女与八路子弟兵的鱼水情深，是民风与军魂的完美融合。太行精神铸就了英雄的太行军民，太行军民孕育了英雄的太行精神。

太行精神的实质

太行精神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八路军和太行儿女展现的不怕牺牲、不畏艰险的精神。据统计，抗日战争中，太行山区有1200万石粮食被抢劫，22万间房屋被烧毁，17万人被日军打死打伤，15万名优秀儿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60万名热血青年参加了八路军，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村村住过八路军，家家都有子弟兵。太行山区敌后抗日战场歼灭日军人数占侵略华北日军总数的1/3。共产党领导太行军民开展的敌后抗战，有力打击了日军的疯狂进攻，激发了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正是太行军民作出的巨大牺牲和奉献，使日本法西斯在快速占领东北、华北之后陷入了太行山区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在中华民族面临亡族灭种的危急时刻，是太行儿女的这种甘于奉献、勇于牺牲的大无畏精神挺起了民族的精

神脊梁。

太行精神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八路军和太行儿女展现的百折不挠、艰苦奋斗的精神。日军在太行山接连受挫之后将战略重点由正面战场转向敌后根据地，并先后发动了“三路围攻”“九路围攻”，实施了“囚笼政策”“蚕食政策”“三光政策”，发动“百万大战”“铁壁合围”，对太行抗日根据地进行了疯狂的扫荡。特别是1941年—1943年抗日战争进入关键时期，根据地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旱、蝗、洪灾，造成大片土地绝收，数十万灾民流离失所，根据地的生存遭到了严重的威胁。在生死存亡之际，太行军民没有气馁，积极开展互助和自救运动，农民自愿组织起生产和参战相结合的民兵组织。民兵们一手拿锄、一手拿枪，敌来打仗、敌走种田。根据地军民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充分发扬中华民族勤劳勇敢、吃苦耐劳的优秀传统，与天地争，与敌人斗，使根据地坚如磐石，有力地捍卫了抗战成果。同时，党也在领导大生产中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从而催生和锤炼出百折不挠、艰苦奋斗的太行精神，把优秀民族传统提升到了新的境界和高度。

太行精神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八路军和太行儿女展现的万众一心、敢于胜利的精神。许多影响抗战全局的重大历史事件都发生在太行抗日根据地。平型关大捷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百团大战使日军惊呼对华北应有再认识；黄崖洞保卫战以敌我伤亡6:1的辉煌战绩，开创了中日战况史上敌我伤亡对比空前未有之纪录。在太行山上取得的一场又一场战争的胜利，敲碎了日军“一个月拿下山西，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言，充分展现了太行军民不畏强敌、敢于胜利的“太行精神”。8年艰苦抗战，日军始终未能撼动800里巍巍太行。正是这座大山培育出来的太行儿女用自己挺直的脊梁扛起了将覆的河山，正是八路军挺进太行的八年里激发、孕育、形成的英雄的“太行精神”击溃了日本皇军无往不胜的“武士道精神”，唤醒了我们沉睡千年的民族斗志，雪洗了我们百年的国耻家仇。不畏强敌，敢于胜利是太行精神最为核心的精髓所在。

太行精神的意义

弘扬太行精神，是保护国家主权、维护世界和平的需要。太行精神升

华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伟大的抗战精神——太行精神，是中华民族长期处于沉睡中的刚健精神基因被激活唤醒的标志，它以强大力量荡涤了近代以来的精神积弊。当前，美国提出亚太再平衡、日本安倍政权集体右转，中华民族再次面临帝国列强的觊觎和挑衅。在这样的历史时刻，我们要大力弘扬太行精神，加强军队建设，使我们的人民军队紧紧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为维护国家主权、地区稳定、世界和平时刻做好准备。

弘扬太行精神，是激发民族自信、保障经济发展、实现全面小康的需要。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发展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复杂严峻，全球经济复苏艰难曲折，主要经济体走势分化，国内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多重困难和挑战相互交织。面对经济全球化和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我们还有很多困难要克服、还有很多挑战要应对。只有大力弘扬太行精神，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集合振兴中华的巨大凝聚力和自信心，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形成万众一心的强大动力。

弘扬太行精神，是传承传统文化、彰显民族气节、实现中国梦的需要。文化是民族的血脉和灵魂。弘扬太行精神，就是要凝聚民族向心力、激发国民创造力、提振民族战斗力，直面挑战，迎难而上，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支柱，就等于没有灵魂，就会失去凝聚力和生命力。一个前进的时代，总有一种奋发向上的精神；一个民族的发展，总有一种积极进取的意志。太行精神就是那个年代中华民族反抗外族侵略的民族最强音。70年后的今天，我们以国之名向胜利致敬，再次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太行精神，就是要更好地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山西日报》，2015年9月15日

沂蒙精神



在沂蒙这片红色土地上，诞生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儿女，沂蒙六姐妹、沂蒙母亲、沂蒙红嫂的事迹十分感人。沂蒙精神与延安精神、井冈山精神、西柏坡精神一样，是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不断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发扬光大。

——2013年11月24日至28日，习近平在山东考察时指出

沂蒙精神的形成及发展

胡晓青

沂蒙精神最早见诸报道是在1989年末，首次被概括为“团结奋斗、无私奉献、艰苦创业、求实创新”。当时，为落实党中央关于充分发挥党的政治优势、大力加强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优势的要求，临沂地委号召全区继承和发扬沂蒙精神，这一举动得到了山东省委的肯定和支持。

1990年春，由临沂地区5位基层党支部书记组成的“沂蒙精神”报告团赴山东济南先后作了7场报告，引起强烈反响，沂蒙精神走进了齐鲁大地人们的心中。

随着沂蒙精神宣传及影响的扩大，1990年9月，中办调研室赴临沂对此进行为期半个月的调查，写成了调查文章并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精神支柱》为题发表在《人民日报》上，沂蒙精神为全国人民熟知。

1997年，中共临沂市委、市政府广泛吸纳各界的研究成果，将沂蒙精神概括为“爱党爱军、开拓奋进、艰苦创业、无私奉献”。

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临沂时指出“沂蒙精神与延安精神、井冈山精神、西柏坡精神一样，是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不断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发扬光大。”这是对沂蒙精神的最高肯定和认可，对新时期弘扬沂蒙精神提出的新要求。

革命时期：积极参军支前

沂蒙精神孕育于战火纷飞的革命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临沂人民积极参军支前，以实际行动表达永远跟党走坚定信念。“最后一

碗米，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块布，送去做军装；最后一个娃，送去上战场。”这是临沂人民支援革命战争的真实写照。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沂蒙根据地始终是我们党和军队重要的根据地之一。从1938年山东省委领导抗日武装起义开始，到1949年解放战争胜利，在长达12年的革命斗争岁月里，据统计，蒙山沂水间发生过大大小小的战斗4000余次，在当时根据地420万人口中，有120万人拥军支前，20多万人参军参战，10多万人血染疆场。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临沂人民用参军参战表达了对党的忠诚，诠释了普通民众对民族独立和解放的向往。

其中流传最广的是“一门三英烈”的故事。1939年，党中央建立了山东抗日根据地，随后，八路军115师挺进沂蒙山，开辟沂蒙革命根据地，驻地临沂莒南县成为党领导下的红色圣地。县里的普通村民刘永良积极参加抗日活动，接受党的领导。1940年，他把长子刘福林送到了抗日战争的战场，成为一名出色的八路军战士；1942年，抗日战争到了艰苦卓绝的相持阶段，他又将年仅17岁的次子刘孟林送到了区中队，参加地方抗日武装；1946年，为夺取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人民解放军急需补充兵源，他的小儿子刘洪林也走上解放战争的最前线。战争是残酷而无情的。1947年春，刘永良的长子在敌作战中不幸牺牲，1948年夏，次子刘孟林也血洒疆场。1950年冬，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三儿子刘洪林也壮烈牺牲。

巍巍青山埋忠骨，滔滔沂水洒碧血。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年代，为支持党和人民军队为民族独立和解放的事业，像这样“一门三英烈”的事迹在临沂地区发生得太多，“父送子”“妻送郎”“谁第一个报名俺就嫁谁”，临沂人民用这些朴实无华的语言和实际行动表达了对党和人民军队的支持。

参军支前是临沂人民直接支援革命的真实体现，更伟大的是沂蒙人民参与革命、支援革命的实际行动。粟裕将军在他的战争回忆录中描述沂蒙群众，“他们是那样地坚定勇敢，不怕困难，奋不顾身，竭尽全力地支援子弟兵”。的确，沂蒙人民用实际行动写下了中国革命史上最精彩、最感人至深的篇章，其中最感人的就是“沂蒙红嫂”的事迹。

“蒙山高，沂水长，我为亲人熬鸡汤……”这段来自现代京剧《红嫂》的唱词在上世纪70年代一度风靡全国，妇孺皆知。沂蒙红嫂，是这样一

个伟大的母性群体，她们用善良和大爱，谱写出了一曲曲感人至深的乐章。

临沂市沂南县马牧池乡背靠蒙山支脉北大山，前依汶河。70多年前，这里曾是山东抗战的中心，革命歌曲《跟着共产党走》在这里唱响并传唱全国；影视剧《沂蒙》《红日》《地道英雄》都在这里取景拍摄。位于该乡常山庄村的“中国红嫂革命纪念馆”，一尊年轻妇女一手搀起伤员、一手掀开衣角用乳汁救护的塑像，深深地震撼着每一位来访者。它反映的就是“红嫂”明德英用乳汁救伤员的真实故事。

明德英，出生于山东省沂南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两岁时因病致哑。21岁时，嫁给了既无土地、又无房屋的贫苦村民李开田。乡亲们让他们去看墓林，林边零星地块可供种粮，林里的树木可供柴草。从此，一个茅草窝棚架在了墓地边。1941年冬，大批日伪军包围了驻沂南马牧池村的八路军山东纵队司令部。11月4日，八路军一名小战士在反“扫荡”中负伤，跑到马牧池村西河岸边，敌人不停地寻找、追赶。明德英看见了小战士的处境，迎上去将他拉进自家窝棚里，盖上破烂不堪的被子。不一会，两个日本兵追赶过来，窝棚门矮得低下头都难走进去。日本兵发现她是哑巴，就比划着战士的身高、衣着，问她见到小战士没有。明德英毫不犹豫地朝西山指了指，两个日本兵急忙朝西山追去。日本兵走后，明德英上前揭开被子，发现小战士因伤口流血过多，已经昏迷过去。正在哺乳期的明德英来不及烧水做饭，毅然将乳头塞进小战士嘴里，乳汁一滴一滴滴进战士的嘴里……小战士终于得救了。随后，她又和丈夫宰了家中仅有的两只鸡，做成鸡汤，一口一口地喂给小战士，半个多月后，小战士伤愈归队。

这样的事迹太多太多，抚养50多个将帅子女和烈士遗孤、自己孙子却饿死4个的“沂蒙母亲”王换于，组织乡亲们烙煎饼、送弹药、救伤员的“沂蒙六姐妹”，带领姐妹跳进冰凉的河水中扛门板架“人桥”的妇救会会长李桂芳。她们都是普普通通的农村妇女，她们用自己的方式表达了对党、对人民军队的无比热爱。一组来自临沂市妇联的数据显示：抗战期间，沂蒙老区15.5万余名妇女先后以不同方式掩护了9.4万余名革命军人和抗日志士，4.2万余名妇女参加了救护八路军伤病员的工作，共救助伤员1.9万余人。她们用柔弱的肩膀与沂蒙的汉子们成为革命时代最可靠的后援力量。独轮车、担架队成为革命最坚实的支持。陈毅元帅曾深情地回

忆这片故土：“我就是躺在棺材里也忘不了沂蒙山人。他们用小米供养了革命，用小车把革命推过了长江！”

建设时期：战天斗地改变恶劣生存条件

新中国成立之初，沂蒙山区山高土质差，河水经常泛滥。沂蒙人民怀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继续发扬革命战争时期的精神，战天斗地，把革命精神转化成改变生存环境、整山治水的强大动力，使沂蒙山区成为上世纪60年代全国农业先进地区之一。这其中的典型就是被毛泽东同志称赞为“愚公移山，改造中国”的厉家寨。

厉家寨位于临沂市莒南县境内，处于三山五岭两河之间，自然条件恶劣。上世纪50年代初，全村6000多亩可耕地被山岭、河沟分割得零零碎碎，有的十几块地才能凑成一亩。加上水土流失严重，这些土地既不抗旱又不耐涝，粮食产量很低。当年，厉家寨是全区72个村中最落后的。

1951年12月，厉月坤担任厉家寨党总支书记，开始带领大家改造家园。他组织互助组搞深翻地，到1957年6000多亩地基本深翻一遍。随后又打水井建水库，挖了一条长800米的深沟，用水车提水浇地400多亩，从此结束了厉家寨没有水浇地的历史。1955年，厉家寨由13个初级社合并成大山农业社，厉月坤任总支书记，掀开了整山治水、战天斗地的新篇章。经过几年奋力拼搏，厉家寨累计凿通三道岭，搬掉11个岭头，填平21个大水塘、300多道水沟，改修12条小河，把上千块横七竖八的小块地削高填洼，深翻整平118块大地，增加耕地面积192亩。1956年，厉家寨粮食亩产达到550斤，提前8年实现农业发展计划纲要的目标。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同志在《山东省莒南县厉家寨大山农业社千方百计争取丰收再丰收》的报告上批示：“此件值得一阅。愚公移山，改造中国，厉家寨是一个好例……”当时，中共中央八届三中全会正在北京举行，这份批示印发给了所有与会代表。厉家寨成为被毛泽东同志作出批示的屈指可数的几个村之一。

毛泽东同志的批示引发了全国性的“愚公移山，改造中国”的大生产运动，引领了当时农业发展的模式。上世纪60年代，中国工农业同时树

立了两面大旗，“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口号响彻南北。而“大寨现象”的成功缘起便是厉家寨整山治水改变自然的壮举。1958年、1965年山西大寨人前后两次前来厉家寨参观学习。1964年陈永贵在山东济宁作报告时称“有了厉家寨以后才有大寨，厉家寨治山治水整地是我的老师”。厉家寨的典型，鼓舞了当时全国人民改造自然的士气。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沂蒙儿女以艰苦创业的精神和创造性的劳动，在穷山恶水中展开了大规模的整山治水运动。到1964年，兴建大中型水库30多座，小型水库2433座，塘坝15600多座，改变了恶劣的自然条件，为以后的经济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至今，这些水利设施仍在沂蒙大地发挥着重要作用。

改革开放时期：加快发展实现整体脱贫

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共产党富民惠民政策的指导下，沂蒙人民继续发扬沂蒙精神，以开拓奋进、无私奉献的精神面貌，实现了临沂地区发展的新突破。

1984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的通知》，把当时的沂蒙山区列为全国18个连片扶贫地区之一。沂蒙人民以敢为人先的精神，抓住扶贫开发的机遇，把自力更生、苦干实干与扶贫支持紧密结合起来，打响了扶贫攻坚的战役。经过10年的艰苦努力，到1995年底，临沂在全国18个连片贫困地区率先实现整体脱贫。这其中在全国熟知的村党支部带领群众致富的典型——平邑县九间棚村。

九间棚村地处沂蒙革命老区腹地，位于640多米高的龙顶山上，曾经是一个出了名的贫困村，荒山秃岭、缺水没电，村民们一直过着艰难贫困的生活。1985年，青年党员刘嘉坤任村支部书记，他带领乡亲们全面实施架电、筑路、整山、治水工程，发扬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拼命地干，靠着这种干劲，九间棚人用5年的时间，投入义务工10万多个，平均每个劳力每年出义务工达310个，动用土石方25000多立方，修建三级扬程269米高的扬水站一座，砌石渠4000多米，连接38个蓄水渠，实现了“路跟渠、渠带路，田水池满天布，灌溉田园绕果树，自来水送到户”的高山水利化，

2000多亩荒山得到了治理，初步改变了九间棚村恶劣的生产生活条件。

这种改变引起了关注，一组关于九间棚事迹的、长达一万余字的调查报告，以《背水决战穷村巨变》《九名党员九根擎天柱》为题被新华社内部刊物刊发，提供给中央政治局领导。宋平同志深受感动，当即写信给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姜春云，他说：他们在那么穷困落后的地方，依靠自己的双手艰苦奋斗，改变了家乡的面貌，人均收入达到七八百元的水平，实在是了不起的成绩。现在我国类似这样的地方还不少，农村富余劳力很多，这是我们的一大优势。如能有像九间棚这样公而忘私的党员干部带头，党员又能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把人民群众组织起来，就什么样的困难也能克服，什么奇迹也可以创造出来。

同年8月，在全国村级组织建设工作座谈会上，宋平同志听取了刘嘉坤关于九间棚人战天斗地、脱贫致富的汇报后称赞道：“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共产党的威信也是干出来的。”并号召全国学习九间棚。由此，九间棚村的名字传遍神州大地。2016年底，已经百岁高龄的宋平老人，仍然关心九间棚村的发展。他对前来看望他的九间棚村书记刘嘉坤说：“要把农村发展好，非常不容易。九间棚村现在发展好了，很难得，要继续保持九间棚艰苦创业的精神，不断总结提高。”

沂蒙精神的传承和发展

沂蒙精神的形成是一个总结提炼升华的过程。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在这里播撒革命火种，领导沂蒙人民不怕流血牺牲，创建了沂蒙革命根据地。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沂蒙人民战天斗地，开拓进取，取得了伟大的成绩。中国共产党领导临沂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的伟大实践，为沂蒙精神注入了新的元素，赋予沂蒙精神更加丰富的内涵。这种精神经过革命战争年代的洗礼、和平建设岁月的陶冶、改革开放时期的升华，成为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强大精神力量。

沂蒙精神已经成为临沂人民的精神支柱。近年来，沂蒙人民奋勇争先、艰苦创业，加快经济社会发展，革命老区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是沂蒙人民发扬沂蒙精神、奋发拼搏的结果。

蒙山沂水，沃土清波。临沂人民在既不靠海、又无大城市可依托的条件下，苦干实干，2004年实现GDP过千亿元，人均过万元，这里建起了老区第一个飞机场和全国地级市通车里程最长的高速公路，建起了闻名全国的临沂批发城、中国现代物流城，赢得了“南有义乌、北有临沂”的美誉。

据统计显示，临沂每年到位外来资金200多亿元，全市年物流总额超过1500亿元。临沂市先后被评为浙商最佳投资潜力城市、中国最具投资价值十大城市。在世界银行发布的中国120个城市竞争排行榜中，临沂市荣获政府效率第一名；2006年首次进入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综合实力百强名单，跃居鲁南五市第一名。涌现出一个个为发展经济无私奉献的典型，时代楷模赵志全就是其中之一。

2016年9月26日，中宣部在中央电视台向全社会公开发布“时代楷模”赵志全的先进事迹。赵志全生前是鲁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兼总经理，他一生致力于振兴民族医药，坚持改革创业，注重科技创新，勇担社会责任，把一个濒临倒闭的小厂建设成现代化制药集团公司，为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带领群众脱贫致富作出了突出贡献，曾获得全国劳动模范、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等荣誉称号。

如何弘扬和坚守沂蒙精神，成为新时期临沂人民新的思考。2005年，“沂蒙精神展”在北京国家博物馆展出，引起强烈反响。2011年，临沂人继续总结升华经验，建成并投入运行了以马克思主义群众观教育和群众路线教育为主要内容的沂蒙党性教育基地。短短几年时间，教育基地建成13处现场教学点，形成六大特色教学模块，被确定为全国首批13家地方党性教育特色基地之一。

实践已经证明，一种优秀的精神可以给经济发展以强有力的支撑。新时期大力弘扬沂蒙精神，凝聚起老区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强大精神力量。当前，我国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面对着新形势新任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弘扬沂蒙精神，对于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人民政协报》，2017年8月24日

弘扬沂蒙精神 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王玉君

沂蒙精神孕育形成于以沂蒙为中心的山东抗日根据地。对山东抗日根据地，1962年毛泽东曾这样评价：“山东的棋下活了，全国的棋也就活了。山东把所有的战略点线都抢占和包围了。只有山东全省是我们完整的、最重要的战略基地。北占东北，南下长江，都主要依靠山东。”共产党八路军和沂蒙人民之所以能创造这一彪炳史册的历史功勋，跟当时的政治、文化、社会等方方面面的因素有关，但从根源上来讲，主要还是党的建设发挥了先导性、引领性、决定性的作用。

沂蒙精神蕴含“忠诚看齐”元素

沂蒙根据地的发展壮大，最根本在于党的正确领导，在于党政军民对中央的忠诚，在于坚决、全面、创造性地贯彻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从整体看，根据地的发展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星星之火渐成燎原之势。根据地党组织忠诚地贯彻我们党在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时期的政治主张，发动党员开展活动，努力扩大党的影响。尤其是大革命失败后，先后发动了苍山、龙须崮、沂水和费城暴动等武装斗争。这一阶段的发展为大规模创建根据地奠定了坚实思想、政治和群众基础。同时，由于根据地与中央相距较远、联系不畅，在这个时期，中央的精神没能全面得以贯彻执行，根据地斗争的方向还不够鲜明、策略还不够科学、经验也不够丰富，在反动势力的包围封锁下，处境异常困难，发展相对缓慢。

第二阶段战略决策引领战略发展。1938年4月，时任山东省委书记黎玉到延安向中央汇报工作后，毛泽东敏锐把握山东的战略地位、斗争基础和沂蒙山多崮险的特点，高瞻远瞩地作出了“派兵去山东”的决策，分三批派去200多名干部后，1939年3月陈光、罗荣桓率领八路军一一五师一部东进山东，1939年6月徐向前、朱瑞率领八路军第一纵队挺进沂蒙。这些重要的战略举措，不仅壮大了根据地党和军队的力量，而且直接带来了中央的精神。在之后的4年中，根据地党的建设、军队建设、政权建设、文化建设以及经济生产、群众工作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发展起来。到1941年初，山东抗日根据地人口已达1200万，面积3600平方公里。这期间，根据地在发展中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问题，中央电报曾明确指出“目前山东工作处在比以前更加艰苦的阶段”，“不仅由于敌人残酷‘扫荡’，地区缩小与分割，主观上亦存在相当严重弱点”，没有利用良机大量地争取政权，没有充分发动群众进行民主民生斗争，统一战线工作缺乏独立自主，党内存在本位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等。这些问题集中起来，就是还没有很好地领会和贯彻中央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这些都使得根据地的发展还没有完全达到中央的战略构想。

第三阶段高度看齐推动成熟壮大。为进一步巩固发展山东抗日根据地，毛泽东专门委派刘少奇于1942年4月到根据地指导工作。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根据党中央精神，刘少奇重点抓了以下工作。一是深入开展整风运动，组织根据地党员在紧张的战斗环境中，认真学习中央规定的整风文件，严肃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在理论和大的方针政策上深入统一思想。二是开展群众运动，更大规模、更加扎实地减租减息，并由经济斗争逐步吸引人民群众转到政治斗争、军事斗争。三是进一步巩固各方面干部的团结，为根据地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奠定了基础。这些重大措施，使毛泽东思想在政治、军事、政权等方面具体化的路线方针政策得到正确、坚决地贯彻执行，使根据地面貌焕然一新，迎来了发展壮大的新时期。到1945年大反攻前，沂蒙山区的鲁中、滨海、鲁南三个战略区连成一片，全部消灭了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对日军形成了局部战略优势和进攻态势，山东抗日根据地已建立起27万人的主力部队、50万人的民兵、150万人的自卫团；拥有人口2400多万，面积125000平方公里。

近代中国在民族复兴道路上所经历的无数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必须在政治上建立一个代表真理和正义、具有强大权威的领导核心。沂蒙根据地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只有坚定地和党中央站在一起，始终不退缩、不动摇、不偏离、不彷徨，自觉和党中央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保持高度一致，才能确保革命事业不断取得胜利。可以说，忠诚看齐，是沂蒙精神最重要的政治品格。这启示我们：旗帜鲜明讲政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要求，政治建设是根本性建设。广大党员要坚定执行党的政治路线，强化“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向党中央看齐，向习近平总书记看齐，向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看齐，坚定不移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沂蒙精神蕴含“献身信仰”元素

信仰是一个人、一个组织、一个集团的思想灵魂和精神支撑。信仰坚定，不唯认知，唯在践行。唯有信仰崇高并甘愿为之奋斗牺牲，个体生命才能升华和永恒，一个组织才能坚不可摧，迸发出推动历史前进的强劲力量。沂蒙精神生动诠释了共产党人对理想信念的坚守，在沂蒙根据地的斗争史中，一切感动和震撼也都源于献身信仰。

早期沂蒙共产党人为追求光明而献身。上个世纪20年代的中国积贫积弱，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封闭落后的沂蒙山区更是灾难深重。为了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沂蒙地区的一批有志青年走出大山，在济南、青岛、上海、广州等地广泛接触各种社会思潮，最后坚定清醒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成为我们党的早期党员，其中就包括中共一大代表王尽美。之后，根据党的“安排”，不少人带着“火种”回乡传播共产主义思想，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开展党的活动，沂蒙山区成为中国北方觉醒最早的地区之一。到1929年，仅沂水一个县就有党员200多人。白色恐怖之下，沂蒙山区的党组织和共产党员，高举打倒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旗帜，发动贫苦农民，打倒土豪劣绅，举行武装暴动，取消苛捐杂税，建

立红色根据地，“创造北方苏维埃”，开展了可歌可泣的斗争。许多优秀的共产党人为此献出了宝贵生命，他们中，有在瞿秋白培养下加入党组织的李清漪；有遇难时分别担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共青团山东省委书记的刘晓浦、刘一梦叔侄，就义前，他们留给家人的遗愿是“革命不胜利决不下葬”；有刚刚入党、哼唱着“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这一句国际歌从容就义的年轻党员张星。一个个土生土长的沂蒙汉子能成为让历史铭记的共产党人，就在于他们从马克思主义中看到了光明，坚信自己担负着实现共产主义这一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而艰难的任务，在信仰和生命面前，他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

根据地的党和军队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献身。我们党的信仰是远大而具体的。全面抗战爆发后，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历史地成为我们党的现实任务。1938年5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山东省委进驻沂蒙山区。此后，八路军山东纵队、一一五师、八路军第一纵队、抗大一分校等先后开赴沂蒙，点燃了抗日的烽火，团结带领沂蒙人民与日伪顽匪开展了艰苦卓绝、不屈不挠的斗争，用鲜血浸红了沂蒙大地的山山水水。在1941年大青山突围中，陈明，曾经的红军总政治部宣传科长、当时的山东战工会副主任兼秘书长，两膝负伤被日军包围，打倒3名敌人后以身殉国；抗大一分校女生队中的20多名战士被数百名日寇包围，每人仅靠两枚自制小手榴弹在3间石屋坚守，最后全部壮烈牺牲；程克，抗大一分校五大队二中队指导员，带领战士们坚守阵地、掩护突围，最后40多名战士全部壮烈牺牲，他牺牲时嘴里还咬着鬼子的耳朵；辛锐，山东姊妹团团团长，受伤后用3颗手榴弹与包围的日军同归于尽。抗日战争，10万名共产党员和八路军战士怀着坚定的理想信念，冲锋陷阵、血战到底、英勇牺牲。他们不仅用血肉之躯筑起新的长城，释放了一个民族的血性，更把信仰的力量转化为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担当。

千百万沂蒙人民为铁心向党而献身。沂蒙普通百姓虽然不懂高深的理论，但献身是最好的教育，他们从身边倒下的一个个共产党员，一个个牺牲的战士身上，明白了共产党、八路军是“为中国人打仗”“为穷人打仗”，跟着共产党走才能改变自己的苦难命运。这才有了千千万万沂蒙儿女“铁了心跟着党走”的执着，演绎出的一个个故事才那么荡气回肠。这里面，

有广为人知的沂蒙母亲、沂蒙红嫂、沂蒙六姐妹，还有冒死帮助4名抗大学员躲过日军搜查的戚大娘、为掩护5名八路军伤员故意暴露和牺牲自己的高大娘、手持菜刀斧头誓死保护妇女队干部的韩大娘、因为没能抢到八路军伤病员和村干部“吵起来”的普通群众。这就是被唤醒后的沂蒙人民爱党爱军，一心跟党走自觉行动。

历史证明，有信仰的人骨头最硬，对信仰忠贞不渝的灵魂最高贵，有科学理论引领的信仰最有远见。这启示我们：信仰信念是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思想上的清醒是政治上坚定的前提。必须坚持不懈抓好理论武装，坚持和创新党内学习制度，教育引导广大党员把信仰信念作为毕生追求，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不断改造主观世界，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问题，不断增强政治定力，自觉成为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践行者。

沂蒙精神蕴含“党群一心”元素

中国共产党坚信历史唯物主义，十分清楚地知道，人民才是真正的英雄，是创造历史、改造现实、走向未来的客观物质力量，离开人民将一事无成。

沂蒙山区素有敦厚朴实、重情重义的民风。抗战之始，沂蒙人民对国民党沈鸿烈部也曾寄予期望，但他们却在沂蒙山区的东里店大兴土木、歌舞升平，消极抗日、鱼肉百姓，很快失去了人心。共产党八路军一开始虽然力量弱小、装备简陋，但却真心实意地对待老百姓、真刀真枪地打鬼子，他们就像种子一样在沂蒙山区生根开花。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最后一块布做军装，最后一粒米做军粮，最后一个儿子送战场”，这种史上少见的军民“水乳交融、生死与共”，说到底共产党坚持性质宗旨、践行群众路线的伟大实践。

政治上。领导劳苦大众翻身解放做主人，通过“豆选”让千百年受欺压的群众登上政治舞台。1941年前后，山东抗日根据地有统计的71个县政府中，民选县长占94%、区长占80%、乡长占70%。开展妇女解放运动，让妇女同胞获得了生命尊严和应有权益；广泛建立农救会、妇救会、青救会、儿童团等群众组织，发动群众配合党开展工作。根据地颁布了历史上

第一部《人权保障条例》，旗帜鲜明地宣布人民群众享有选举、罢免、言论、集会等权利。这种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彻底改变了人民群众长期被剥削被奴役被压迫的悲惨历史，扬眉吐气、意气风发的根据地人民自觉站到共产党、八路军的旗帜下。

经济上。一方面紧紧抓住土地问题，在抗战时期减租减息，显著改善了贫雇农的生活。抗战后又开展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彻底废除封建土地制度，满足了中国农民几千年来“耕者有其田”的渴望。另一方面发展根据地经济，开展大生产运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精兵简政、减轻负担，部分部队自给率达到50%。1947至1949年沂蒙山区遭遇严重自然灾害，华东局号召“不荒掉一亩地，不饿死一口人”，发放救济粮4500万公斤，贷款14亿元，帮助群众渡过难关。这些代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经济制度变革，不仅给群众带来具体实在的利益，而且坚定了群众跟着共产党走的信心和决心。

军事上。赢得民族解放战争和建立新中国的浴血奋战无疑是宏大的，这种宏大有着鲜明具体的为民本质。譬如：1941年11月，八路军一一五师经过留田突围后，已经跳出了日寇的包围，但罗荣桓和朱瑞研究认为，在取得第一阶段胜利后，不能置中心区人民于不顾，随即断然决定率军返回中心区开展反“扫荡”斗争。这种本质还体现在无数八路军战士“甘以我血换民生”中。1942年秋，为解救被日军胁迫的红石崖村村民，夏蔚区区委委员武善桐主动承认自己的八路军身份，把日军引到村外后跳崖牺牲。正是有了八路军为人民甘洒热血、以命相换，才有了沂蒙人民全力以赴拥军支前、舍生忘死救护伤员。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的十几年间，沂蒙地区的妇女动员39万人参军，救护伤员5.9万人，掩护革命同志9.4万人。

文化上。以文化人、启发民智、唤醒觉悟，推动政治斗争和经济发展，党群一心更加巩固。根据地不仅办了普通教育，而且办起了各种形式的冬学、夜校、“庄户学”“识字班”等，前一小时教农民学认字，后一小时讲抗战的道理。同时，每个专区都有地方性报纸，很多县还有油印的小报，出现了“村村办学、户户读书、抗日救国、人人争先”的生动景象。这些文化工作不仅让昔日的“泥腿子”变成了“文化人”，而且有效地宣传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传播了革命的新文化新思想，鼓舞了革命斗志，形成

了“齐心协力打东洋”的生动局面。

作风上。传承着红军基因的八路军来到沂蒙山，不仅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对群众秋毫无犯，还主动帮助群众挑水、砍柴、扫院子、拾粪、拉犁、干农活，很快和老百姓打成了一片。党和抗日民主政府的干部率先垂范、以身作则，徐向前把自己的棉大衣送给生病的房东大爷，深情地说大爷就像他的父亲。

组织起来的群众才是真正的力量，没有一种力量比人民更强大，没有一种根基比人心更坚实。党群一心，是成功应对各种危局困境的根本保证、夺取革命胜利的力量源泉，是沂蒙精神最重要的表现形态。这启示我们：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只有真正为民，人民才会跟随响应。广大党员必须牢固树立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站稳群众立场，增进群众感情。不断改进和创新联系群众方法，坚持和完善调查研究、群众满意度测评、民意调查等制度，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以党心换民心，以党心聚民心。

沂蒙精神蕴含“奋斗到底”的元素

一部艰苦卓绝的沂蒙革命斗争史，就是根据地党政军民用鲜血、汗水、泪水书写苦难和辉煌、曲折和胜利、付出和收获的共同奋斗史。奋斗源于对崇高信仰的践行，是应对挑战、抵御风险、克服困难、解决矛盾的一贯精神状态，是沂蒙精神的永恒主题。

坚持的力量。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沂蒙党政军民始终坚信红旗不倒，执着追求信仰，虽九死而不悔，生命不息、奋斗不止。大革命失败后，沂蒙山区处在腥风血雨中，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与组织失去联系的党员千方百计、千辛万苦寻找“母亲”，“揩干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继续战斗。在抗战最艰难的时期，山东分局号召抗日军民：“紧急动员起来，为建设坚强巩固的山东民主抗日根据地而斗争”！鼓励大家咬紧牙关，苦战苦熬，顽强作战，奋斗到底，1942年11月在对崮山战斗中，山东军区特务营战至最后仅剩14位战士，在营长严雨霖带领下纵身跳崖，宁死不做俘虏，这种和狼牙山五壮士一样的壮举在沂蒙多达11处；抗战期间，

拥有 20 万军队的国民党消极避战，放弃山东，共产党八路军始终保持着克服一切困难而不被困难压倒的旺盛斗志，一一五师从来山东时的 1 万人发展到 27 万人。解放战争之初，“还乡团”配合国民党正规军对沂蒙解放区疯狂“反攻倒算”，鲁南区 90% 的村庄被洗劫，14 万干部、群众被杀害，“灰死火灭人烟稀”没有吓倒解放区军民，更加坚定了摧毁旧世界的决心。这种坚持，源于大无畏的革命气概、忠贞不渝的坚强党性、不屈不挠的意志品质、军民一心的强大力量。

担当的品格。共产主义的崇高信仰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使共产党八路军挺进沂蒙，带领沂蒙人民抗日救国、救亡图存，这是民族大义的担当。渊子崖保卫战中，300 余名村民与 1000 多名来犯日寇殊死搏斗，牺牲 147 人，歼敌 121 名，当时这种群众自发性抗战不下 5 例，这是保卫家园、抵御外辱的担当。遵照中央指示，刘少奇指导山东工作，直面问题矛盾，迅速扭转被动局面，这是勇于负责、不辱使命的担当。陈毅、粟裕抓住稍纵即逝的战机，于敌重兵密集并进中发动孟良崮战役。战斗中，廖政国师长率领仅有 4 个团并且两个还是刚由地方部队改编的 1 师，坚决执行防御国民党 25、65 两个整编师的命令；本该参加总攻的华野第 4 纵队 28 团的一个营，从实际出发，支援 1 师防御，堵住了即将撕裂的防线，这些都是顾全大局、勇挑重任、敢于胜利的担当。根据地军民不缺担当，国难家难面前挺身而出、“不畏死、不怕战”，展示了中华民族奋战到底的决心，撑起了中国人的脊梁。

纯洁的面貌。纯洁是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是克敌制胜的法宝，在根据地表现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当年在沂蒙山抗战的共产党八路军来自五湖四海，其中不乏赫赫有名的高级干部、军事将领，他们带头吃苦，以身示范。罗荣桓不顾严重的肾病和尿血，吃着用开水滤掉绿毛的发霉煎饼，带领大家挖盐田；刘少奇穿着补丁擦补丁的褂子和裂开了口子的布鞋，坚决不领新军装和鞋子；朱瑞为帮群众春耕生产，用绳子拉犁，磨碎了褂子。共产党人的纯洁本色还体现为对党员干部违法乱纪、贪污腐败的“零容忍”，1942 年 6 月，费南县政府二科仓库主任贪污田赋税收 1250 元，秘书处军用代办股股长贪污 1340 元，均判处死刑。纯洁凝聚意志、催生行动，成为根据地生生不息、发展壮大、奋斗到底的力量之源。

沂蒙山是一座精神高山。沂蒙革命斗争史，集中显示了以中国共产党人为代表的爱国主义的蓬勃伟力，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生动展现了沂蒙党政军民不忘初心奋斗到底的顽强毅力。共产党八路军带领沂蒙人民不懈奋斗的历史征程和光辉业绩，犹如一幅气势磅礴、雄浑壮丽的画卷，展现着中国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这启示我们：改变历史的只能是坚定者、奋进者、搏击者，广大党员要自觉加强党性修养，涵养道德情操，铭记初心使命，保持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学习时报》，2018年6月25日

沂蒙精神：涵养中国精神的重要话语资源

徐东升

中国精神是实现中国梦的内驱动力，沂蒙精神是中国精神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把“沂蒙精神与延安精神、井冈山精神、西柏坡精神”并称为“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深刻指出党政军民“生死与共、水乳交融”是沂蒙精神话语语义的鲜明特质。这一重要论述，对于深刻理解沂蒙精神在中国精神话语体系中的历史地位及其话语内涵的高度契合性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一、沂蒙精神与中国精神之脉相通

精神是人区别于物的存在特征，是任何个体与群体生存和发展的观念支撑，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因素就是历久弥新的中国精神。中国精神作为一种话语存在从未失踪，不仅记载在经史子集等传统典籍内，而且贯穿于仁人志士的生命轨迹里，还扎根于乡土中国亿万人民群众的家国情怀中。沂蒙精神是中国精神在齐鲁之乡、沂蒙大地的具体存在形态，脉动于东夷文化、莒郯古国、琅琊古郡、孔孟之乡、齐鲁文化之地，发轫于中国共产党人在山东革命根据地局部执政时期，发展于新中国艰苦奋斗、全面建设的火热岁月，传承于改革开放时代号角下艰苦创业、创新发展的伟大实践之中。

从话语语义来看，沂蒙精神与中国精神浑然一体。沂蒙精神体现了先进性和人民性的高度一致，其中为民、忠诚、担当是先进性的基本要求，爱党、爱军、奉献是人民性的具体体现。这一基本内涵，与中国精神中的

爱国、信义、民本、自强、进取、务实等具有高度的契合性，体现了民族性和时代性相统一的话语特色。

从话语形态来看，沂蒙精神与中国精神并行不悖，是个体与整体、特殊与一般的关系。中国精神具有一般规定性，从抽象层面来说是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统一体，从具体层面来说是中国人民时间上历时性精神、空间上地域性精神的高度概括，具有特定的主体性、内涵的确定性、形式的多样性等基本属性。沂蒙精神作为沂蒙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形成的精神品质，具有空间地域的特指性、时间流传的长期性，是沂蒙地区党员干部与人民群众具有的稳定的群体性心理特征和行为倾向。对沂蒙精神基本内涵的界定具有双重视角，从中国共产党的视角沂蒙精神体现了人民的主体地位、价值指向、责任担当等含义，从人民群众的视角沂蒙精神体现了追求进步、自强不息、务实求功、乐于奉献的精神品质。

从话语定位来看，沂蒙精神的基本内涵与中国精神的民族特质和时代特征高度一致，沂蒙精神是具有时代特色的民族精神，是民族精神在沂蒙大地的彰显。它始终以其与时俱进的特殊品格，紧跟时代发展步伐，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不断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沂蒙精神的话语存在是中国精神话语接地气、彰显精气神的具体表现形式，以鲜明的个性特征诠释着中国精神的具体话语魅力，是滋养中国精神的重要话语资源。

二、沂蒙精神与中国精神之根相连

沂蒙精神与中国精神文化同宗、思想同源、精神同体。沂蒙精神诞生在沂蒙大地，沂蒙热土浸润在中华文明儒家文化发祥之地，因而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沂蒙地区也是马克思主义星星之火较早燎原之地，具体而言：

其一，传统文化是中国精神的文化之基也是沂蒙精神的文化之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儒家文化的忠孝仁义、仁者爱人、诗书礼乐，不仅整体上塑造了中华文化的灵魂和性格，也使得沂蒙地区近水楼台先得滋养，沂蒙文化资源

浸染在儒家文化之中，沂蒙地区才人不断、名家辈出，宗圣曾子、书圣王羲之与颜真卿、经学家匡衡、智圣诸葛亮、算圣刘洪、孝圣王祥等等，这些丰富的地域文化是中华整体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其二，革命文化是中国精神成长的重要一环也是沂蒙精神生成的关键所在。革命精神是革命文化的集中体现，通过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的火热实践，中国精神从传统向现代成功转型、升华，沂蒙地区较早接受革命火种的洗礼，马克思主义在沂蒙地区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沂蒙地区的建立，对于沂蒙人民的觉醒和沂蒙精神的生成具有“助产婆”的历史功效。

其三，时代文化是中国精神发展的助推器也是沂蒙精神传承的发动机。任何事物都处在一定的时空之中，精神也不例外；时代的发展不断给实践提出新的课题，来源于实践的精神具有稳定性也具有时代性；从革命到建设再到改革，中国精神不断获得新的内涵和表现形式，沂蒙精神也具有与时俱进的品格，经历了爱党爱军、支援革命，自力更生、艰苦创业，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开拓创新、加快发展的时代变迁，展现出多姿多彩的话语演进脉络。

三、沂蒙精神与中国精神之魂相融

中国精神的话语谱系异彩纷呈，涉及时间、地域、人物、事迹等，但中国精神有其确定的话语内核。沂蒙精神与中国精神的话语内容不容失语、割裂、裁剪、泛化，应该从多维性、时代性、民族性、地域性等方面审视其话语内核，从统一性视野出发凝练其话语实质并揭示其话语结构。沂蒙精神与中国精神的灵魂相互交融，具有话语内核的一致性：

第一，爱国情怀。沂蒙精神的创造主体沂蒙人民具有中国人民一般意义上的优秀品质，沂蒙人民吃苦耐劳、勤劳勇敢，在国家遭遇外来入侵时，毅然决然揭竿而起、奔走呼号，意欲救国救民于水火之中，表现出追求真理、爱憎分明、向往光明、充满正义的爱国主义精神。爱国情怀是中国精神在宏观视域和微观视域的首要内涵，是地域化精神形态沂蒙精神的第一要义。

第二，群体精神。马克思认为，“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沂蒙精神的创造者沂蒙人民及其英模群体，具有自觉的集体主义思想和大爱精神品质，富有舍小家顾大家、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把爱洒满人间等中国精神的人文关怀情结。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已经证明，沂蒙人民面对国家和集体发展的关键时刻，能够以高度的主动性挺身而出、舍生忘死、前赴后继、勇于奉献，其中著名的“沂蒙六姐妹”就是践行集体主义精神的时代标兵和英模人物。“这种顾全大局、公而忘私、乐于奉献、不计回报的价值取向是沂蒙精神的核心”，“沂蒙精神的真正生命力在于万众一心”。

第三，奋斗观念。毛泽东同志指出：“根本的是我们要提倡艰苦奋斗，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沂蒙人民自古以来特别是在战争年代就血性刚勇、不畏强暴、敢于斗争、不怕牺牲，具有强烈的革命精神和斗争意识，为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打败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政府，经历了血与火的战争洗礼；新中国成立后，为改变落后的生存状况，在整山治水、战天斗地，治穷治愚、开山修路，绿化荒山、治理生态，艰苦创业、战胜贫困等方面，表现了中国人民天道酬勤、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

第四，创新意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创新是“中华民族最鲜明的民族禀赋”。沂蒙精神以个案形式彰显了中国精神鲜明的“日日新”的实践底蕴，沂蒙人民在战争年代就不乏创新的智慧，在支援前线方面曾经自发把家家户户的门板拆下来搭建了“火线桥”供渡河部队顺利通过，在教育方面创办了沂蒙“庄户学”崭新的学习模式；新中国成立后，厉家寨以创造性的精神整山治水、高家柳沟村以创新的精神举办的记工学习班均获得毛泽东的批示，特别是把南方的水稻和茶叶引种到沂蒙大地并获得巨大成功，成为举国关注的重要新闻和建设战线的重大亮点；改革开放以来，九间棚人以创新的思维、艰苦创业的事迹传遍大江南北，成为新时期创新发展的先进典型，赋予沂蒙精神崭新的时代内涵。

总之，从话语逻辑来看，沂蒙精神与中国精神的思想之脉相互连接、文化根基相互联通、内在灵魂相互交融，体现了个体精神形态与整体精神形态的有机统一。从中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谱系的视野正确理解沂蒙精

神的话语逻辑，对于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具有重要话语资源价值，对于实现中国精神大众化以及筑牢不忘初心、不懈奋斗的价值理念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群众观视域下的沂蒙精神研究》(项目编号:14BDJ064)、山东省社科规划重大项目《沂蒙精神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项目编号:16ALJJ1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大众日报》，2017年11月20日

西柏坡精神



西柏坡我来过多次，每次都怀着崇敬之心来，带着许多思考走。对我们来讲，每到井冈山、延安、西柏坡等革命圣地，都是一种精神上、思想上的洗礼。每来一次，都能受到一次党的性质和宗旨的生动教育，就更加坚定了我们的公仆意识和为民情怀。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多重温这些伟大历史，心中就会增加很多正能量。

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之际，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向全党郑重提出“两个务必”，是经过了深入思考的。这里面，包含着对我国几千年历史上治乱规律的深刻借鉴，包含着对我们党艰苦奋斗历程的深刻总结，包含着对胜利了的政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对即将诞生的人民政权实现长治久安的深刻忧思，也包含着对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深刻认识，思想意义和历史意义十分深远。

——2013年7月11日至12日，习近平在河北省调研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时指出

西柏坡“立规矩”的启示

——写在党中央进京赶考66周年之际

中共石家庄市委

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调研时指出：“这里是立规矩的地方。党的规矩、制度的建立和执行，有力推动了党的作风和纪律建设。”西柏坡时期，正是党的工作重心由战争转向建设、由农村转向城市的历史转折点。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制度治党”，为从革命党转向执政党奠定了基础。

战争年代，由于我党我军长期处于被敌人分割包围状态，各地方党和军队的领导机关保持着很大的自主权，容易出现地方主义、山头主义和独立王国现象。随着革命的胜利，一些同志出现了骄傲自满、无组织无纪律等现象。不解决这些问题，就既不可能夺取革命的胜利，更不可能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因而立规矩就成为党的一项迫切任务。

西柏坡时期主要立了哪些规矩呢？

建立请示报告制度，维护中央权威。在解放战争转入进攻阶段后，毛泽东同志在陕北杨家沟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从今年起，全党各级领导机关，必须改正对上级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不良习惯”。1948年的九月会议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军委分会及前委会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分清了哪些事项由中央决定，哪些事项由地方事前请示中央并经中央批准后实施，哪些事项事后报中央备审。凡决定权完全属于中央的事项，中央已有决定的，各地必须严格遵守并正确执行。

健全党委制，完善党内工作和决策机制。1948年9月，毛泽东同志为

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健全党委制》，开篇就指出：“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党的重要制度。”强调应注意“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二者不可偏废”，实现民主与集中的有效统一。这个决定尽管只有500多个字，却总结了我党实行集体领导的成功经验，对于建立党的民主集中制，加强党的集体领导起了重要作用。

规范各部门工作制度，确保机关高效运转。中央办公厅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制定了一系列制度。从目前能查到的公开资料看，制度有20余项，涉及范围广，要求细致，程序合理，涉及秘书处工作的方方面面。在党中央领导下，中央各部门加强了制度建设，规范了部门之间、部门与上下级之间的运行机制，提高了工作效率。

提出“两个务必”和“六条规定”，在全党敲响警钟。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毛泽东同志分析了因为巨大胜利可能出现的四种情绪——骄傲的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提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全会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提议通过了六条规定：一不做寿、二不送礼、三少敬酒、四少拍掌、五不以人名作地名、六不要把中国同志与马恩列斯平列。

制定入城纪律。党中央和解放军总部在离开西柏坡进驻北京前夕，制定了《机关、部队转移前后应该遵守的事项》。其中入城守则的“四不”明确提出：一是不乱讲。有关秘密的不说；党报上没有公布的不说；在机关以外之公共场所、公开集会、坐车乘船时，不得谈论机关内部及其他党内情况。二是不乱跑。非经组织允许、取得正式手续不得外出；有事外出不得乘机闲逛。三是不乱动手。非分之物不要；非组织分发的不要；未经组织允许不得私装电话、电灯、自来水、收音机等；私人送的不要。机关以外人员请酒、请客进馆子不参加；不吃老百姓任何东西。四是不乱收人。面目不清、来历不明的人不收。

党中央在西柏坡时期立规矩的历史经验，为从严治党提供了重要启示。

要牢记“两个务必”，严守纪律规矩。党的纪律是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遵守的行为规则，是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完成党的任务的保证。西柏坡时期正处于大决战的前夜，党和军队工作千头万绪，毛泽东同志紧

紧抓住纪律建设这个中心环节，加强党中央的领导和权威，制定了一系列党内外的制度规定，及时纠正了各种违反纪律的错误思想和行为，维护党中央的权威，政令畅通，令行禁止，增强了全党全军的执行力战斗力，保证了革命的胜利。

领导干部要起带头作用。古人云，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西柏坡时期，党的领导核心带头遵守纪律，率先垂范，产生了强大的示范效应。毛泽东同志的儿子毛岸英准备和刘思齐结婚，由于刘思齐差几个月不到结婚年龄，毛泽东让他们再等一等。当时，毛岸英想不通，找毛泽东商量，毛泽东很严厉地说，你找谁结婚由你做主，但是结婚年龄不到你做得了主吗？制度和纪律要做你的主！直到1949年10月，到结婚年龄后，毛岸英和刘思齐才举行了简朴的婚礼。一代伟人的崇高风范永励后人。

要加强制度建设。西柏坡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认真总结了革命战争年代党的纪律建设经验，并针对建国前夕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系统地制定了一系列党的纪律规定，这么短的时间，制定这么多的规矩，是党的历史上少有的，充分体现了党的老一辈革命家对纪律建设制度化的重视，为我党的纪律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对执行纪律规矩要及时进行监督检查。为把纪律规矩落到实处，中央加大了督促检查的力度。中央关于请示报告的指示发出后，有的部门没有落实，毛泽东同志以中央名义发电报提出严厉批评，该部门做出了检讨，改正了错误。由于党中央带头坚决维护党的纪律，全党上下对纪律工作高度重视，强化了党的纪律的严肃性。

温故而知新。回顾党的历史特别是西柏坡时期党中央加强纪律建设的这段历史，有利于我们进一步深化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从严治党，守纪律、讲规矩重要论述的认识，能促使我们更加自觉地把守纪律讲规矩摆在重要位置。领导干部要始终把坚定政治立场摆在首位，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必须对党的纪律和规矩心存敬畏，真正使守纪律、讲规矩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成为一种行为自觉。必须带头守纪律、讲规矩，以身作则、以上率下，绝不允许有不受约束的“特殊党员”。要切实强化党纪党规的执行力，不论是谁，

只要违反了纪律、破坏了规矩，就要追究、问责、查处，不能姑息迁就，不能搞下不为例、法外开恩，使纪律和规矩真正成为“带电的高压线”。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在党中央进京赶考66周年之际，只要我们汲取宝贵的历史镜鉴和启示，“坚定政治立场，严守纪律规矩”，自觉做到“三严三实”，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向党和人民交出优异的答卷。

《求是》，2015 第 19 期

在弘扬西柏坡精神中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

刘 月 贾玉娥

习近平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强调：“全党同志一定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始终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继续在这场历史性考试中经受考验，努力向历史、向人民交出新的更加优异的答卷！”这是全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向着“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迈进的政治宣言。西柏坡精神作为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等革命精神的传承和升华，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涵育着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情怀和执政理念。新形势下，我们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继续在历史性考试中经受考验，努力向历史、向人民交出新的更加优异的答卷，必须大力弘扬西柏坡精神。

坚持敢于斗争，不断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推向前进

西柏坡时期，人民解放军不断发展壮大，但同国民党军队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尽管如此，我们党还是取得了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的胜利，为建立新中国奠定了基础。当时，无论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国民党反动派，还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都不相信中国共产党能这么快取得胜利。然而，我们党正确把握战略机遇，领导军队和人民发扬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精神，坚持将革命进行到底，最终推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新中国，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

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弘扬西柏坡精神，就要坚持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不断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推向前进。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我们接续奋斗。今天，我国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综合国力显著提升，国际地位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日益改善，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民族复兴这个伟大目标。但是，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途上，面对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大调整、科技革命酝酿新突破的发展形势，面对转方式调结构、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加快科技创新步伐、攻克体制机制顽疾的艰巨任务，面对意识形态斗争日益复杂、外国势力围堵打压的严峻挑战，我们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进行伟大斗争，努力向历史、向人民交出新的更加优异的答卷，必须弘扬西柏坡时期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精神，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以非凡的胆识和气魄、强烈的紧迫感和使命感，努力与历史同步伐、与时代共命运，从而创造新奇迹，赢得中华民族的光明未来。弘扬西柏坡精神，做到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就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动摇，无论顺境还是逆境，都不背离或放弃马克思主义；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不动摇，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践行者；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坚持勇破善立，不断把全面深化改革推向前进

西柏坡时期，正处于革命战争向和平建设转变的时期。面对新中国成立后必然面临的艰巨建设任务，我们党必须善于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建设面临的各种矛盾，善于学习一切对社会主义建设有用的经济知识、管理知识和科技知识等。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坚持勇破善立，我们党创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崭新国家制度，确立了全国胜利后在经济、社会、文化、外交等方面的基本政策。弘扬西柏坡精神，就要坚持勇破善立，不断把全面深化改革

推向前进。

改革开放就是勇破善立的过程，它推动中国创造发展奇迹、标注当代中国鲜明特色。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推进改革，以全局观念和系统思维谋划改革，推动新一轮改革大潮涌起，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不断完善、经济社会发展活力不断迸发。站在“十三五”新的历史起点上，面对改革进入攻坚期、深水区，我们要努力向历史、向人民交出新的更加优异的答卷，必须勇破善立，全面深化改革。强调全面深化改革，不只是为了应对挑战，更是为了把握机遇；不只是为了短期目标，更是为了图之长远；不只是时代要求，更是历史责任。我们要在勇破善立中正确处理各种重大关系，切实增强辩证思维和战略思维，实现各方面新体制逐步完善、各种利益关系更加协调，积极为经济社会发展增添新动力。弘扬西柏坡精神，坚持勇破善立，必须始终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牢牢把握改革的重点和节奏，既坚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聚焦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精准发力，又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使各个方面改革同步推进、形成合力；努力强化改革的法治保障，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努力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

坚持人民立场，不断把为人民造福的事业推向前进

西柏坡时期，我们党颁布《中国土地法大纲》，开展土地改革运动，使亿万农民迸发出难以估量的参军参战热情，为推进战略进攻和夺取全国胜利奠定了可靠基础。与此同时，1948年9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即将建立的政权性质是人民民主专政，要求各级政府尽快恢复和发展人民经济事业、文化教育事业等，体现了鲜明的人民立场。正是因为我们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信赖和支持，才赢得了革命的胜利、人民的解放、民族的新生。弘扬西柏坡精神，就要坚持人民立场，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不断把为人民造福的事业推向前进。

经过中国共产党 95 年的奋斗，中国人民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今天，我们面对的人民群众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劳动大军、科技大军、创业大军，不仅朝气蓬勃、创新精神更足，而且自我意识、权利意识更强，精神诉求、利益诉求更多，期盼更有质量、更有价值的生活。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适应新形势新要求，深入贯彻落实党的群众路线，进一步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不断使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弘扬西柏坡精神，坚持人民立场，就要始终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要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发展各项社会事业，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打赢脱贫攻坚战，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就要尊重人民主体地位，扩大人民群众有序政治参与，保证人民广泛参与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形成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坚持“两个务必”，不断把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向前进

西柏坡时期，面对执政“赶考”这一崭新历史课题，毛泽东同志向全党发出了“两个务必”的号召。“两个务必”是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的作风要求，内涵十分丰富。谦虚，关键是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勤于学习，善于提高；谨慎，关键是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调查研究，科学决策；不骄，关键是自省自警，勇于担当责任，作风扎实，脚踏实地；不躁，关键是纪律严明，强化战略定力，清醒认知，准确判断；艰苦奋斗，关键是励精图治，永葆奋发进取状态，心系群众，实干兴邦。“两个务必”突出体现了我们党在伟大成就面前保持清醒头脑和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是西柏坡精神的核心内涵。弘扬西柏坡精神，就要坚持“两个务必”，不断把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向前进。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以理想信念教育补足精神之钙，以严明政治纪律统一全党意志，以坚

决惩治腐败保持肌体健康，以狠抓作风建设树立良好形象，使党风政风为之一新、党心民心为之大振。但我们也要看到，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破除改革阻力、激发创新活力，需要锻造更加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当前，我们党仍面临“四大考验”和“四种危险”，努力向历史、向人民交出新的更加优异的答卷，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更为紧迫。实践证明，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到什么阶段，党的建设就要推进到什么阶段。弘扬西柏坡精神，坚持“两个务必”，必须严字当头，做到真管真严、敢管敢严、长管长严。要始终坚持和维护党的领导，以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政治勇气，着力解决党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严格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切实做到对党忠诚、为党分忧、为党担责、为党尽责；持之以恒加强作风建设，坚决同一切弱化先进性、损害纯洁性的行为作斗争，祛病疗伤，激浊扬清，确保党始终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以对腐败零容忍的态度推进反腐败斗争，确保各级领导干部牢固树立正确权力观，做到公正用权、依法用权、为民用权、廉洁用权；着力培养干部队伍，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把党和人民需要的好干部精心培养起来、及时发现出来、合理使用起来。

《人民日报》，2016年10月10日

雷锋精神



雷锋精神是永恒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体现。你们要做雷锋精神的种子，把雷锋精神广播在祖国大地上。

——2014年3月11日，习近平出席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解放军代表团全体会议，接见部分基层代表时指出

让雷锋精神成为改革发展的时代标杆

杨忠民 谢文凤

雷锋精神具有历久弥新的价值。习近平同志指出，雷锋精神的核心内涵就是他身上所具有的信念的能量、大爱的胸怀、忘我的精神、进取的锐气。新形势下，我们要深刻把握雷锋精神的核心内涵，让雷锋精神成为改革发展的时代标杆。

坚定理想信念。习近平同志对雷锋的崇高信仰和坚定信念给予了高度肯定，并指出这是雷锋可以坚持做到一生为党和人民奋斗的根本动力。雷锋刻苦学习、深入领悟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并将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坚定树立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崇高理想信念。他在日记中写道，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甘愿牺牲自己的一切直至生命。雷锋生活的时代正是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极度困难的时期，但他没有被困难吓倒，而是坚守在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一线，全身心地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当前，我们正处于改革攻坚期、发展关键期，改革发展任务繁重而艰巨，迫切要求我们以雷锋精神为标杆，胸怀共产主义崇高理想，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贡献自己的一份光和热。

涵养大爱胸怀。习近平同志指出，雷锋精神，人人可学；奉献爱心，处处可为。积小善为大善，善莫大焉。雷锋正是在一件件或大或小的好事中彰显自己大爱胸怀的，真正做到了将人民的困难看作自己的困难，不管是对自己认识的人还是对陌生人，都始终保持一颗大爱之心。在雷锋眼中，全国乃至全世界的穷苦人民都是自己应该照顾和帮助的亲人，他无怨无悔地以大爱胸怀为人民奉献自己。雷锋的大爱胸怀对我们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具有典范意义。它启示我们：在个人修身方面，要做到“爱人”；在权力行使方面，要做到以人民为中心；在对待自然方面，要做到“爱万物”。广大党员、干部尤其要以雷锋为榜样，不断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以“仁爱”修其身，而后才可以“为政于天下”。

培育忘我精神。雷锋为了共产主义事业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完美地诠释了“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他抓住一切奉献的机会，把部队发放的衣物捐给国家，把节省下来的钱支援国家建设，充分体现了共产党员大公无私的高尚情怀。他总是心甘情愿、默默无闻地做着为人民服务的好事，却不希望对个人事迹进行宣传报道，也从不考虑自己的名誉地位。这启示广大党员、干部，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忘我精神，将自己当成人民的勤务员，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殚精竭虑、夙夜在公，将重心放在打基础、利长远的事上，不搞急功近利、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

增强进取锐气。雷锋始终保持着“做人民的小学生”的谦虚进取之心，在工作上向积极性最高的同志看齐。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他挤出时间学习文化知识，写下了近20万字的学习笔记。他不断钻研农业生产、驾驶、投弹等工作中的问题，并进行技术创新。正是凭着螺丝钉一样的钻劲和挤劲，雷锋在不同的岗位上取得了出色成绩，多次获得“模范工作者”“先进生产者”等荣誉称号。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在创新成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的新形势下，我们要像雷锋同志那样，抱着知难而进的积极态度，增强时不我待的危机意识，以滴水穿石的韧劲，学习理论知识、科技知识，大胆创新、锐意进取，不断形成推动改革发展的新认识、新成果。党的各级组织和人事部门在考察、选拔、任用干部过程中，应更加关注敢作为、能作为、善作为的人才，对懒作为、不作为、乱作为的干部及时批评指正，推动形成勇于担当、敢于创新、艰苦奋斗、锐意进取的良好工作作风。

《人民日报》，2017年3月22日

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焕发光彩

钧 青

雷锋是人民军队培养的伟大共产主义战士，是实践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道德的楷模，用22岁的短暂一生树起了一座令人景仰的精神丰碑。半个多世纪以来，学雷锋活动在全国全军蓬勃开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社会影响。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对传承和弘扬雷锋精神高度重视，多次在不同场合作出重要指示；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主席强调，要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全军广大官兵应深入贯彻习主席系列重要指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以强烈政治责任感和更高标准要求，深入开展新时代学雷锋活动，在弘扬雷锋精神、当好雷锋传人上努力走在前列。

民族脊梁·永恒丰碑

充分认识新时代学习弘扬雷锋精神的重大意义

习主席深刻指出，“雷锋精神是永恒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体现”“任何一个民族都需要有这样的精神构成其强大精神力量，这样的精神无论时代发展到哪一步都不会过时”“我们要从娃娃抓起，让雷锋精神在全社会蔚然成风，世世代代弘扬下去”。学习领袖指示、感悟领袖期望，我们一定要提高政治站位、找准历史方位、运用时代眼光，充分认清新时代学习弘扬雷锋精神，是弘扬民族精神、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引领风气之先、激发社会正能量的独特魅力，对推动党、国家和军队事业发展有着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新时代学习弘扬雷锋精神，是激发强国强军意志力量的重要课题。一个民族、一个时代，总需要一批优秀人物来引领社会风尚，需要伟大的精神来凝聚前进的力量。党的十九大对新时代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作出全面部署，党、国家和军队事业已站在新的起点上，迫切需要用一种广泛认同的精神力量激励官兵，引导大家勠力同心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而奋斗。雷锋身上体现的坚定理想信念、昂扬精神斗志和高尚道德追求，凝结着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体现，具有巩固共同思想基础、催人拼搏进取的强大能量。新时代学习弘扬雷锋精神，用大家信服的榜样来引导，用令人景仰的模范来示范，有助于形成全军官兵奋发向上的磅礴力量，激励广大官兵踊跃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立足本职岗位积极为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作贡献。

新时代学习弘扬雷锋精神，是保持共产党员初心本色的重要载体。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保持本色，生命所系。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发展壮大，成为领导中国人民不断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的坚强核心，归根结底就在于始终保持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雷锋作为一名普通党员，时时处处发挥模范带头作用，以实际行动诠释了党的性质和宗旨，彰显了共产党人的初心和本色。新时代学习弘扬雷锋精神，对于引导广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自觉以雷锋为榜样，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勤于检视心灵、洗涤灵魂，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对于增强各级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向心力，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新时代学习弘扬雷锋精神，是培养“四有”新时代革命军人的重要途径。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培养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生动诠释了新时代革命军人的好样子，鲜明指出了新时代培养什么样官兵的重大问题。55年来，全军部队坚持不懈开展学雷锋活动，雷锋精神深刻影响了几代官兵的人生追求和价值取向。雷锋身上所具有的信念的能量、大爱的胸怀、忘我的精神、进取的锐气，正是“四有”新时代革命军人好样子的生动写照。新时代学习弘扬雷锋精神，引导官兵“接过雷锋的枪”，学习雷锋的政治立场、价值追求和道德品质，全面提高思

想政治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军事专业素质、身体心理素质，就能培养造就一大批能够担当强国强军大任的时代新人，锻造出“四铁”过硬部队。

与时俱进·历久弥新

准确把握新时代学习弘扬雷锋精神的本质内涵

雷锋精神的永恒价值和强大生命力，就在于其具有与时俱进的品格，能够穿透历史，与时代条件和社会实践紧密结合。新时代学习弘扬雷锋精神，必须紧贴部队实际、紧贴使命任务、紧贴官兵特点，不断赋予雷锋精神新的时代内涵，为推动强军事业发展，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提供强大精神力量。

对党忠诚、听党指挥的忠贞信念。坚定的政治信念，是雷锋成长为伟大共产主义战士的基石。雷锋爱憎分明、立场坚定，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自觉把个人的一切都奉献给党和人民。我军是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能否具有崇高信仰、坚定信念，关系人民军队性质和宗旨，关系党执政地位的巩固和执政能力的提高，关系国家长治久安。新时代学习弘扬雷锋精神，就是要坚定自觉地做到：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and 党的十九大精神，全面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永远听党的话、跟党走；毫不动摇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全面深入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决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指挥；牢记党的宗旨，热爱党的事业，不忘入党入伍初心，保持革命精神、革命斗志，随时准备为祖国和人民牺牲一切。

赤忱为民、服务人民的宗旨本色。雷锋有句名言：“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雷锋用实际行动践行了他永远甘为人民当“傻子”的誓言。我军是人民的子弟兵，为人民服务是由我军性质宗旨决定的。新时代学习弘扬雷锋精神，学人民、爱人民、为人民这一条坚决不能变、不能丢。要始终保持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时刻把人民利益放在高于一切、重于一切的位置；要大力弘扬我军拥政爱民光荣传统，

积极参加和支援经济建设，坚决完成抢险救灾等急难险重任务，为维护国家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作出应有贡献；要踊跃参加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积极参加公益活动，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热诚关爱他人，多做扶贫济困、扶弱助残的实事好事，以实际行动促进社会进步。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的责任担当。雷锋一生经历农、工、兵三条战线，无论是当农业社的记工员、县乡政府的通信员，还是当工厂的推土机手、解放军的汽车兵，都像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拧在哪里都闪闪发光。雷锋这种对事业无比热爱、对工作极端负责的精神，集中体现了革命军人的职业操守。站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广大官兵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我们要像雷锋那样，强化奉献意识，自觉把个人成长进步融入强国强军伟业，不管在哪个岗位、从事什么工作，都始终保持强烈的事业心责任感；要强化职能意识，以正在做的工作和本职岗位作为基本实践平台，将全部心思和精力用在工作上，出色完成每一项任务；要强化主业意识，扫除和平积习，积极练兵备战，牢牢掌握能打仗、打胜仗的过硬本领，确保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

奋发图强、争创一流的进取精神。雷锋在部队2年8个月，荣立二等功1次、三等功2次，先后被评为模范共青团员、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雷锋这种勇往直前、勇争第一的冲劲拼劲，是我军开拓创新精神的生动体现。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绝不会一片坦途、一蹴而就，唯志坚者进，唯创新者强。接过历史接力棒、踏上强军新征程，我们要自觉学习弘扬雷锋精神，始终牢记党和人民的重托，树立图强向强的雄心壮志，跳出利益羁绊和“小我”格局，用忠诚、奉献和拼搏甘当强军兴军的铺路石；始终保持昂扬的精神状态，越是改革任务艰巨越要迎难而上，越是转型任务繁重越要激情满怀，勇于革除陈旧观念、打破习惯做法，敢为人先、敢闯新路；始终坚持一流的工作标准，勤于思考、善于总结，精益求精、追求卓越，努力在平凡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业绩。

严于律己、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雷锋的一生是勤俭简朴的一生，他自律严格，珍惜每一分钱、每一滴油、每一度电，穿的衣服补了又补、用的东西修了又修，时刻都在用优良传统修养党性、砥砺品行。我党我军是

靠艰苦奋斗起家的，在漫长的革命斗争中形成的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南泥湾精神等，都闪耀着艰苦奋斗的精神光辉。新时代学习弘扬雷锋精神，就是要引导官兵传承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树立正确的苦乐观，坚持工作上高标准、生活上低要求，把艰苦奋斗的作风作为一种精神、境界、情操来培育来践行；树立勤俭的创业观，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坚持勤俭建军，把每一分军费都用在该用的地方；树立严格的自律观，培树积极健康的生活情趣，心有所戒、行有所止，从小事小节上加强约束、规范自己，永葆革命军人艰苦朴素的政治本色。

薪火永续·血脉相传

深入推动新时代学雷锋活动广泛开展

雷锋是在党的哺育下，经过人民军队这个“大学校”“大熔炉”培养锻炼成长的。我们要倍加珍惜、坚持用好雷锋精神这个宝贵财富，把学雷锋活动作为加强部队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融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和“传承红色基因、担当强军重任”主题教育，加强组织领导，狠抓工作落实，推动学雷锋活动不断向深度和广度发展。

必须坚持扭住根本学雷锋，引导广大官兵坚决高举旗帜、维护核心。坚如磐石的政治信仰，是雷锋精神的灵魂。新时代开展学雷锋活动，最根本的就是要教育引导官兵像雷锋一样坚决听党的话、一辈子跟党走，做习主席的好战士。要弘扬马克思主义学风，引导官兵像雷锋学习毛主席著作一样学懂弄通党的创新理论，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强军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执行者、模范践行者。要锤炼党性修养，引导官兵自觉站在捍卫旗帜道路方向、党运国脉军魂的高度，不断强化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全面深入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始终同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保持高度一致。要引导官兵自觉塑造政治灵魂，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坚决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指挥。

必须坚持聚焦使命学雷锋，引导广大官兵努力提高新时代备战打仗能力。能打仗、打胜仗是军队的使命职责和根本价值所在。新时代开展学雷

锋活动，必须聚焦主责主业，把提高官兵备战打仗能力作为出发点落脚点。要教育官兵牢记使命、矢志打赢，深刻认识人民军队在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全局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进一步强化忧患意识、危机意识、使命意识，始终保持箭在弦上的备战态势。要激励官兵勤学苦练、精武强能，积极投身军事训练转变实践，主动研究军事、研究战争、研究打仗，坚持按纲施训、从严治训、实战实训、联战联训，补齐战斗力建设的短板弱项。要培树官兵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坚持在艰苦环境和急难险重任务中摔打磨砺，摒弃和平积习、祛除“骄娇”二气，锻造敢打必胜的精兵劲旅。

必须坚持立足岗位学雷锋，引导广大官兵积极为建设世界一流军队作贡献。建设世界一流军队寓于部队各项建设和工作之中，每个岗位都是强军事业不可缺少的一环。新时代开展学雷锋活动，就要引导官兵爱岗尽责，把雷锋精神转化为奋发进取、建功军营的内在动力。要强固强军之志，引导官兵自觉把个人理想抱负融入强军实践，强化事业心责任感，使自己的岗位成为托举党在新时代强军目标的坚实支点。要恪尽岗位职责，引导官兵自觉把本职岗位作为成长发展的沃土、干事创业的舞台，脚踏实地、埋头苦干，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精一行。要积极创新创优，引导官兵以卒子过河的劲头勇往直前，面对发展难题敢闯新路、敢于攻坚，努力在平凡中成就非凡。

必须坚持常态长效学雷锋，引导广大官兵自觉当好雷锋精神的种子。雷锋精神，人人可学；弘扬雷锋精神，人人可为。学雷锋活动起源于军队，广大官兵个个都应成为雷锋精神的种子，把雷锋精神根植在绿色军营、广播在祖国大地。要加强组织领导，推动健全工作机制，加大人力、经费、设施等保障力度，深化拓展军地共建共育平台，为学雷锋活动深入持久开展创造良好条件。要创新内容形式，运用新的传播手段、新的时代元素解读宣扬雷锋精神，把坚持传统做法与探索开展新的公益形式结合起来，进一步增强学雷锋活动的时代感和实效性。要注重典型引领，大力选树体现时代精神的学雷锋典型，组织他们以各种形式走上讲台、走进官兵、走向社会，形成比学赶超的群体效应，不断兴起学雷锋活动热潮，让雷锋精神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解放军报》，2018年3月5日

弘扬雷锋精神是真正的文化自信

刘德中

近年来，个别人质疑和否定我们的民族英雄，矮化和丑化我们的民族精神，否定和抹杀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甚至还嘲弄、糟蹋我们的民族独立历史。这种妄图抽掉我们民族脊梁的伎俩，是历史虚无主义的具体表现，最终可能导致民族虚无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

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甚至无中生有，是历史虚无主义者歪曲和颠覆历史的惯用手法。他们往往想用一些片面的材料和细节，来诱导人们否定总体的历史真实；他们不是为了求历史事实之真，而是为了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网上个别人质疑并否定雷锋其人其事，就是一例。

今年是雷锋同志牺牲 55 周年。1963 年 3 月 5 日，毛泽东为不幸牺牲的雷锋题词，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此后，每年的 3 月 5 日成为“学雷锋日”，雷锋的名字也随之响遍全国，成为亿万国人的榜样。

雷锋精神的基本内涵是无私奉献，其实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2013 年 3 月 5 日，我国发行《毛泽东“向雷锋同志学习”题词发表五十周年》纪念邮票 1 套 4 枚，分别是向雷锋同志学习、学习钻研、爱岗敬业、助人为乐。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学习钻研、爱岗敬业、助人为乐是对雷锋精神的一种新诠释。

雷锋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话：“有些人说工作忙，没时间学习，我认为问题不在工作忙，而在于你愿不愿意学习，会不会挤时间，要学习的时间是有的，问题是我们善不善于挤，愿不愿意钻。一块好好的木板，上面一个眼也没有，但钉子为什么能钉进去呢？这就是靠压力硬挤进去的。由此看

来，钉子有两个长处：一个是挤劲，一个是钻劲，我们在学习上也要提倡这种‘钉子’精神，善于挤和钻。”这种“螺丝钉精神”，就是自觉地把个人融入党和人民的事业中，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

有人对“螺丝钉精神”存在误解，以为是一种驯服工具，会压抑人的主体性。其实，“螺丝钉精神”是一种境界，强调的是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要做好螺丝钉，也是需要发挥聪明才智的。坚守住阵地，面对敌人进攻，仅有牺牲精神是完不成任务的。同样是石头，有的铺路，有的成为雕塑；同样是铁，有的成为面板，有的成为钉子。这都只是事业的需要，是分工的不同，并没有高低差异。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个人都要量力而行，因材施教，不能这山望着那山高。事实上，平凡的岗位同样可以成就伟大的人生。我们需要的是坚持、自信。

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提到学雷锋，他说：“雷锋精神是永恒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体现。”他还在多个场合提到“要发扬钉钉子的精神”“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改革落实”。只有一锤接着一锤敲，才能积小胜为大胜，这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应有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坚持传承和弘扬雷锋精神，是一种真正的文化自信。而有意无意地忽视乃至放弃榜样人物，其实是在自我瓦解核心价值。新形势下，树立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找回“新中国的榜样”。就此而言，对历史虚无主义的论点要主动作为、有力还击，而不只是一味应付、疲于应战。

《解放日报》，2017年2月21日

焦裕禄精神



要特别学习弘扬焦裕禄同志“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的公仆情怀，凡事探求就里、“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的求实作风，“敢教日月换新天”“革命者要在困难面前逞英雄”的奋斗精神，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殊化”的道德情操。要把焦裕禄精神作为一面镜子，从里到外、从上到下反复照一照自己，深入查摆自己在思想境界、素质能力、作风形象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努力向焦裕禄同志看齐，从今天做起，从眼前做起，从小事做起，像焦裕禄同志那样对待群众、对待组织、对待事业、对待同志、对待亲属、对待自己，像焦裕禄同志那样生命不息、奋斗不止，努力做焦裕禄式的好党员、好干部。

——2014年3月17日至18日，习近平在河南省兰考县调研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时指出

焦裕禄精神是党的宝贵财富

湖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习近平同志指出，焦裕禄精神同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雷锋精神等革命传统和伟大精神一样，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然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要永远向他学习。这一重要论述，为广大党员干部弘扬焦裕禄精神、践行“三严三实”要求提供了标杆，为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深入开展指明了方向。

用焦裕禄精神固本培元，补好精神之“钙”

习近平同志指出：“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焦裕禄不为名、不为利，不怕苦、不怕死，忠心耿耿、无怨无悔，彰显了“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的公仆情怀，体现了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他常说，“共产党员应该在群众最困难的时候，出现在群众的面前；在群众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去关心群众、帮助群众”。焦裕禄之所以深受人民群众爱戴，根本原因在于他胸怀一心为革命、一心为人民、把事业当作生命的理想信念，视人民群众为衣食父母，诚心诚意当人民公仆，始终与老百姓心相连、情相依、同呼吸、共命运。

用焦裕禄精神固本培元，要不断加强党的理论武装。信仰的坚定源于理论的清醒。广大党员干部要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强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学习，深刻领会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不断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

用焦裕禄精神固本培元，要切实践行党的群众路线。每一位党员干部都应把焦裕禄当成一把尺子、一面镜子，经常量一量、照一照，牢固树立群众观点，狠刹“四风”，始终做到心里装着群众、凡事想着群众、工作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真诚服务群众，真正成为人民群众的贴心人。

用焦裕禄精神提质强能，履行担当之责

习近平同志强调，要学习弘扬焦裕禄“敢教日月换新天”“革命者要在困难面前逞英雄”的奋斗精神。攻坚克难、敢于担当是焦裕禄精神的重要内涵。焦裕禄出身贫苦家庭，只上过几年小学，但他从未放松学习，在企业工作时刻苦钻研、勇攀科学技术高峰，成为工业战线上的“红旗手”。到兰考工作时，恰逢当地遭受最严重的内涝、风沙、盐碱“三害”，社会经济成为豫东重灾区的“黑锅底”，全县36万人中出去逃荒的多达3.8万，粮食产量滑至历史最低水平。在严重困难面前，焦裕禄没有退缩、没有妥协，不等不靠、不畏艰难，组织党员干部学习《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等重要文献，回忆兰考的革命斗争史，鼓舞大家的精神和干劲；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创造性地制定了一套简便易行的治理“三害”措施。焦裕禄用短暂而厚重的生命，诠释了一个共产党人所应肩负的责任与担当。

用焦裕禄精神提质强能，要求党员干部带头自省自醒：是否具备干事创业的精神状态和素质能力？是否敢于担当责任、勇于直面矛盾、善于解决问题？全面深化改革，广度、力度和深度前所未有，矛盾、困难和阻力空前巨大，党员干部的素质能力面临重大考验和挑战。只有发扬焦裕禄精神，不断提高素质能力，才能具备逢山开路、遇河架桥的底气，才能冲破旧观念的束缚和利益固化的藩篱，努力打好改革攻坚战，交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历史、无愧于人民的答卷。

用焦裕禄精神砥砺品格，大兴实干之风

习近平同志要求党员干部学习和践行焦裕禄凡事探求就里、“吃别人

嚼过的馍没味道”的求实作风。焦裕禄在企业工作期间，为了攻克难题，经常把铺盖卷搬到车间，废寝忘食，直至问题得到圆满解决；到兰考工作后，他始终胸怀封沙、治水、改地的志愿，心中始终装着兰考的发展和人民的幸福。在兰考工作短暂而又弥足珍贵的475天里，焦裕禄深入120多个生产大队走访调研，把兰考1800平方公里土地上的自然情况摸了个透，找出了种植泡桐治理水、沙、碱“三害”等良策，从此兰考人民走上新的发展路。

焦裕禄之所以能在短短一年多时间改变兰考面貌，靠的是坚持实事求是、遵循客观规律，堪称谋事实、创业实、做人实的典范。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就要自觉践行“三实三严”要求，大力发扬这种求实的作风。要放下架子、扑下身子，深入困难最大、问题最多、发展最困难的地方，接“地气”，找“症结”，挖“病根”，真切了解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求，不断密切党群干群关系。突破习惯思维，创新发展路径，用创新的方法清除积弊，用务实的举措促进发展。发扬“钉钉子”精神，对大事、要事、难事和急事，要抓准、抓紧、抓实、抓好，不见成效不撒手。健全科学的考核体系，完善选人用人机制，让那些重实际、说实话、办实事、求实效的干部得到褒奖和重用；让那些热衷于作表面文章、搞形式主义、严重脱离群众的干部受到警醒和惩戒。

（执笔：徐晨光 黄智勇 陈远章）

《人民日报》，2014年6月26日

学习焦裕禄精神重在实干

陈礼洋

作为党员干部，要像焦裕禄同志一样，讲实话、办实事，真正把求真务实融入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之中。对打基础、利长远、惠民生的事，要以“功成不必在我、建功必须有我”的胸怀主动作为，一以贯之抓好落实。

焦裕禄同志的公仆情怀、实干作风、奋斗精神、道德操守，是人民心中一座永不磨灭的丰碑，永不过时、永葆活力，永远激励我们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要有一心为民的公仆情怀。“唯有民，方为民”，焦裕禄同志始终怀揣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公仆情怀，胸怀群众，先公后私，无论什么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摆在第一位。作为一名基层干部，学习焦裕禄同志一心奉公的精神，就要以忧国忧民和为人民服务的自觉，抓好当下民生工作。一是全心全意抓好脱贫攻坚。当前，虽然经济发展了、生活改善了，但仍有部分群众依然在贫困线上挣扎。作为扶贫一线的党员干部，我们应当坚决履行好全区“第一责任人”责任，俯下身子，倾力为民，多思多想、多访多问，采取更加有力、有效的措施，确保贫困群众真脱贫、不返贫。二是让群众分享改革红利。当前社会改革发展进入深水区，社会矛盾不断积累，我们应该要沉下心来，设身处地、换位思考，为群众发声、为群众代言、为群众解难，让群众得到更多改革红利，不断增进与群众的真挚感情。三是尽心尽力增进民生福祉。民生是最大的实事。我们应当持续加大财政对民生的投入力度，扎扎实实地做好群众就学、就医、就业、住房、社会保障等实事，让群众得到实惠。同时，坚决杜绝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对当前中央高度重视的环保、扶贫等问题，坚决抓好抓实。

发扬求真务实的实干作风。从山东到河南，从工业建设到行政管理，从车间主任到县委书记，无论何时何地，焦裕禄同志对工作都始终保持求真务实的优良作风。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作为党员干部，要像焦裕禄同志一样，讲实话、办实事，真正把求真务实融入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之中。一是坚持重实情、出实招。不断强化求真务实的政绩观，在当前招商引资、城市建设、精准扶贫等中心工作中，坚持讲真话、重实情、出实招、求实效。二是坚持走在前、干在先。牢牢树立标杆意识，聚焦主责主业，率先垂范，深入一线，履职尽责，以实实在在的行动，带领党员干部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三是坚持抓落实、求实效。以“钉钉子”的韧劲干事，把口头上讲的、纸上写的、会上部署的东西付诸实施，落实落细。对打基础、利长远、惠民生的事，要以“功成不必在我、建功必须有我”的胸怀主动作为，一以贯之抓好落实。

传承迎难而上的奋斗精神。知难而进、迎难而上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宝贵品格，也是焦裕禄精神的重要内容。当我们面对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时，应当要像焦裕禄同志那样，敢试敢想、敢做敢拼。一是坚定发展信念。怀着信念，变压力为动力，善于在挑战面前捕捉和把握发展机遇，善于在逆境中发现和培育有利因素，夙兴夜寐思改革，废寝忘食谋发展，以昂扬的精神状态和优良的作风带领广大群众迎难而上、锐意改革。二是强化攻坚意识。始终保持敢做善成的勇气，保持逆势而上的豪气，不怕矛盾复杂、不怕任务艰巨、不怕责任重大，敢于挑起重担，敢于克难制胜，敢于奋勇争先。在全面深化改革，特别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只有攻坚、再攻坚，敢于壮士断腕、自我革命，把该放的放下去，该管的管起来，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宏观调控作用，切实转换发展动能。三是提升办事效率。面对急难险重工作任务时，我们决不允许出现跟不上、慢一拍的情况，必须以“马上就办”的精神按下“快进键”，把中心工作抓牢抓实，推动各项工作提速、提效、提质，形成讲效率、抓落实的良好导向。

坚守朴素廉洁的道德操守。“矩不正，不可为方；规不正，不可为圆。”焦裕禄同志永葆着共产党人严守规矩、清正廉洁的政治品性。在全面从严治党的新时期，我们更要坚守共产党人的原则和底线，保持共产党人崇高

的道德情操，总的来说，具体要把握以下几个方面。一要“干净”。“干净”就是作风端正、清正廉洁的最好体现。严防“雅贿”陷阱，严把“爱好”尺度，不该吃的千万别张嘴，不该拿的千万别伸手，做到经济上过得硬，腰杆子挺得直，让“干净”成为家人之福、单位之福、地方之福。二要“公正”。在工作中一定要把公正作为重要准则，特别是在项目建设、社会民生等工作中务必要做到一视同仁、一碗水端平，不要为了一己私利而违背原则。要在较真碰硬、认真细致中进一步匡正干事创业风气。三要有“定力”。强化学习、提高修养，养成一种不为所动、不为所惑的定力，达到苦到舌根吃得消、烦到心乱耐得住、困到绝处行得通、屈到愤极受得起、急到燃眉定得了、色到情迷稳得住、财到眼前看得淡的七种境界。

《学习时报》，2017年7月7日

『两弹一星』精神



“两弹一星”精神激励和鼓舞了几代人，是中华民族宝贵精神财富。

——2011年1月26日，习近平看望三位著名科学家时指出

“两弹一星”精神的内涵与体现

李 斌

20世纪50年代，面对帝国主义核威胁、核讹诈，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审时度势，高瞻远瞩，果断决定研制原子弹、导弹、人造地球卫星。在为“两弹一星”事业进行的奋斗中，广大研制工作者培育和发扬了一种崇高的精神，这就是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它是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神和科学精神的体现，是中国人民在20世纪为中华民族创造的新的宝贵精神财富。

习近平同志2011年1月26日在看望航天科技专家孙家栋院士时指出：“‘两弹一星’精神激励和鼓舞了几代人，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

1964年10月16日，在毛泽东的关怀下，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中国政府于当天发表声明，指出：中国发展核武器的目的在于消灭核武器。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热爱祖国、无私奉献

“热爱祖国、无私奉献”是创造“两弹一星”伟业的广大建设者和创业者的高贵品质和精神支柱。研制者们心有大我、至诚报国，淡泊名利、无私奉献，自觉把个人理想与祖国命运、个人志向与民族复兴紧紧联系起来，把爱国之情、报国之志融入建设祖国的伟大事业中，融入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伟大奋斗中。

1951年，于敏从北大调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现原子能科学研究

院)。此后的10年，他从头学起，孜孜不倦。功夫不负有心人，没有出国留学经验的他，成为国际一流的理论物理学家。

1961年1月，于敏应邀来到钱三强的办公室，接受了热核武器原理预先研究的任务，从此隐姓埋名30年，投入到新的神秘研究领域，从一个基础理论研究领域，一下转移到多学科、应用性强的科学领域。这是于敏职业生涯的又一次重大转折。

为了尽快研制出我国自己的氢弹，他和同事们废寝忘食、昼夜奋战。氢弹原理非常复杂，研究中常常“山重水复疑无路”，但每个人的心头都像燃着一把火，决心赶在法国前头研制出氢弹，为祖国争光。那是理论部的黄金时代，科研大楼的夜晚常如白昼。1965年9月，一场创造历史的上海“百日会战”最终打破僵局。于敏带领的团队终于形成了一套从原理、材料到构型的基本完整的物理设计方案。不久，氢弹原理试验获得成功。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试验圆满成功。于敏说，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消失的，留取丹心照汗青，能把自己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事业之中，也就足可以欣慰了。

1956年秋，王淦昌作为中国代表来到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工作。1960年，他组织并领导的研究小组在世界上第一次发现了“反西格玛负超子”，为祖国争得了荣誉。1960年底，他谢绝苏方的挽留，回到中科院原子能所，并把在苏联省下的14万卢布全部捐献给正在遭受自然灾害的祖国。

刚刚起步的我国核工业，就遭遇了苏联撕毁合同、撤走专家的严冬。有一位苏联专家临别时说：没关系，我们走了，你们还有王淦昌。1961年4月，王淦昌接受了研制核武器的任务。从此，他以身许国、隐姓埋名，放弃自己得心应手的物理学基础研究工作，从事核弹研制的全新事业。多年后，回想当年“愿以身许国”的初心，他说：“我认为国家的强盛才是我真正的追求，那正是我报效国家的时候。”

1958年，邓稼先在钱三强的竭力推荐下，义无反顾地投身于核武器研制事业中。在接受研制核弹历史重任的那天夜晚，他对妻子许鹿希说，以后家里的事我就不能管了，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生就过得很有意义，就是为了它死了也值得！从此，在公开场合，

邓稼先的名字连同他的身影都销声匿迹。他成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在京郊高粱地里兴建研究所，在去罗布泊国家试验场的路上颠簸，在云雾缭绕的山区指挥核弹研制……他对年轻大学生动员说，干我们这个工作，就要甘心当无名英雄，一没有名，二没有利，还要吃苦；做出的科学成果又不许发表论文。

1963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理论设计方案按预定计划诞生。为争取时间，根据上级指示，邓稼先和他领导的理论部班子原封不动地转移到氢弹的研制上去。他克服重重困难，将自己的命运和氢弹紧紧联系在一起，为一举突破氢弹技术难关，成功试验第一颗氢弹建立卓越功勋。

他长期甘当无名英雄，为我国核武器研制事业兢兢业业、呕心沥血、孜孜不倦奋斗了28年。1986年，积劳成疾的邓稼先被癌症夺去生命。在生命最后一个月里，他28年的秘密经历才得以披露。临终前，他所关心的仍然是如何发展我国的尖端武器，并语重心长地说：“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

在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和第一颗氢弹研制过程中，包括邓稼先在内的大量骨干都是钱三强推荐的。后来，钱三强常常因为推荐了这些骨干，使他们远离家人、与世隔绝，甚至身体落下毛病而心中不安。有一次，他遇到一起开会的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教授，表示歉意说：我那时把您的儿子吕敏搞到新疆去了，这么多年没有回来，给家里带来困难。那时候的吕敏，已经在核试验基地工作了20多年了，他从父亲处得知这件事，很感动，特意给钱三强写信说：这个事情我不后悔，总算给国家干了点实际有用的事，知识分子能有这个机会，是不容易的。

同样是钱三强推荐的程开甲，是中国核试验科学技术的领头人。他不但自己来到基地，而且于1969年举家迁往罗布泊，全家在那里一直生活到1984年才回到北京。后来，程开甲被问及参加核试验最难忘的感受是什么，他激动地说：有了原子弹，中国人才真正挺直了脊梁。我们为核武器事业而献身，为的就是让我们的祖国能硬邦邦地站立于世界。我们做到了……

在我国导弹和核武器两个试验基地，有数千名职工，他们不仅自己在戈壁沙漠工作了一辈子，许多人的第二代、第三代至今仍然留在那里。

核武器研制事业辉煌而又神秘。它的神秘，需要用无私的精神支撑，

用严酷的纪律维护。有一位工程师接到秘密调令，按规定她瞒着丈夫，借口出差，神秘地从家庭中消失，来到遥远的罗布泊，承担测试技术研究工作。半年多后，在孔雀河边的一棵树下，她与自己的丈夫意外相逢。原来，她丈夫也与她一样，接到秘密调令，并且与她在同一支特种部队里。由于沙漠无垠，他们比邻若天涯。

前来罗布泊指挥作战的张爱萍将军听到这个动人的故事，流着热泪来到那棵树下。他说，就叫它夫妻树吧，它是一座纪念碑！

这样可歌可泣的故事在罗布泊不知道上演过多少幕！核武器事业是千百万人的事业，他们建立的功勋永载史册，他们热爱祖国、无私奉献的高贵品质，不断激励后人接续奋斗。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创造“两弹一星”伟业的广大建设者和创业者的坚强意志和立足基点。

1956年春，中央作出发展原子弹、导弹的战略决策，中国研制导弹、原子弹的大幕徐徐拉开。

1957年10月15日，中苏双方签订新技术协定，规定在1957年至1961年底，苏方将供应我原子弹的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供应我国导弹的样品和技术资料等。中苏“10·15”协定签订后，中央决定组建导弹和原子弹研究院，开始实施导弹、原子弹的研究设计、试制生产、勘测靶场和建立特种试验部队的计划。当时，以钱学森为代表，包括任新民、屠守锷等在内的一批高水平的科学家很快集中到导弹研究院，仿制苏联提供的教学和科研弹P-1和P-2（后来的“东风-1号”）。

同时，数以万计的朝鲜归国志愿军、大学毕业生、工人和技术人员，陆续来到一片戈壁大沙漠上安营扎寨。他们放下枪支和笔杆，扛起镢头和铁锹，在沙碛地上支起帐篷、搭起锅台；冒着炎热的高温，顶着扑面的沙尘，打井开荒，展开了一场生存之战。经过两年多的苦战，原来空荡荡的大戈壁上，矗立起星罗棋布的建筑物，飞机场、发射阵地、技术区、发电厂、铁路、公路、医院、礼堂、通讯设施，以及大片的部队生活区。导弹试验

基地奇迹般地建起来了。1958年冬，青海金银滩的核武器研制基地开始建设；1959年春，马兰核试验基地开始建设。

当仿制P-2导弹的工作正按计划紧张进行，导弹已运抵发射场，一切准备有条不紊时，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情况。

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照会我国政府，决定召回全部在华苏联专家。不等中国答复，于25日又通知说，在华全部苏联专家将在7月28日开始撤离，9月1日前全部撤完。从7月中旬到8月下旬，苏方撤走了在导弹研究院工作的全部专家，带走了他们掌握的全部技术资料。听到这些情况，毛主席早有心理准备，语重心长地说：“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

就在苏联专家撤走后的第17天，我国用国产液体燃料成功发射一枚苏制导弹。第83天，祖国的地平线上飞起了我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枚导弹。

此后，中央决定缩短战线，集中力量，自力更生突破原子能技术。大批专家和科技骨干从全国各地迅速奔向核武器研制和试验的第一线。我国的核武器研制事业在中央专门委员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迅猛地发展起来。正如钱三强说的：曾经以为是艰难困苦关头，却成了中国人民干得最欢、最带劲、最舒坦的黄金时代。

原子弹比导弹更复杂，花费更大。早在1955年初，中央就作出发展我国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中央决定成立第二机械工业部，组织实施原子能工业。1958年9月底，苏联援助建设的重水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正式移交使用。我国从此有了一个综合性的原子能科学技术研究基地。中国核工业建设的速度大大出乎苏联方面的预料。按照中苏协议，苏联答应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一些技术资料。此时我们迫切需要的正是这些，却等来1959年6月下旬苏方暂缓援助的通知。1959年6月这个特殊的日子，也就成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工程的代号：“596”。

在核弹爆轰试验之前，必须解决理论计算数据问题。在国外严密封锁的情况下，邓稼先率领理论部已有的十几人，在一无权威资料、二无实践经验的条件下，开展了大规模的运算。他们用手摇和电动计算机、算盘和钢笔，喝着白糖冲开水的营养补品，含辛茹苦、夜以继日地把原子弹的设计轮廓勾勒出来了。爆炸力学、中子输运、核反应、中子物理等方面也都

取得了决定性进展。核试验系统工程的龙头终于扬起来了。

1966年10月下旬，在我国本土成功地进行“两弹结合”试验。通过几次重大试验，我们走出了一条不同于美苏的尖端事业发展新路子。从采矿、冶炼、加工直到最复杂的科学研究工作，都采用了各种因陋就简的办法，该精则精，能简则简，使我国尖端事业在简陋条件下以较短时间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1971年8月，当邓稼先与挚友杨振宁相逢，杨振宁问起中国原子弹是不是由中国人自己研制。杨振宁在离开上海经巴黎回美国的前夕，收到邓稼先写的信，说他证实了，中国原子武器工程中除了最早于1959年底以前曾得到苏联的极少“援助”外，没有任何外国人参加。这封短信给了杨振宁极大感情震荡，一时热泪满眶。

正如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的总指挥张爱萍将军精辟指出的：原子弹不是武器，它是一种精神，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

大力协同、勇于登攀

大力协同、勇于登攀是创造“两弹一星”伟业的广大建设者和创业者的科学态度和“两弹一星”事业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证。

核武器研制与试验是一项规模大、技术复杂、综合性强的系统工程，关涉研究、生产、试验、使用各个部门。1962年，毛主席在罗瑞卿转报二机部两年规划的报告上批示：“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为研制试验核武器，国家共组织了五个方面的科研力量，即中国科学院、国防科研机构、工业部门、高等院校和地方的科研力量。据统计，全国先后有26个部（院），20个省、市、自治区，包括900多家工厂、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参加攻关会战。原子弹研制中的“九次计算”“草原大会战”；氢弹原理突破中的“群众大讨论”“上海百日攻坚战”；小型化研究中的“五朵金花”“多种外源”方案等等，都充分显示了群策群力集体攻关的威力，使我们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

研制两弹，除了以独立自主攻克理论难题外，尤其需要大力协同攻克工业技术难关。

尖端武器需要许多新型原材料。据统计，仅用于尖端武器的新型材料至少有 5600 种之多。这么多的原材料研制，没有全国一盘棋的大力协同的精神，是不可能完成的。何况除了新型材料，还有电子元件、精密机械、仪器仪表、特殊设备、测试技术、计量基准等七个大方面工作。聂荣臻把这些称之为国防尖端事业的“开门七件事”。这“开门七件事”，成为当时科研战线家喻户晓的动员令，动员全国数以百计的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工厂进行协同攻关研制。

1964 年 10 月 16 日，中国成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成为继美国、苏联、英国、法国之后，世界上第五个独立掌握核武器技术的国家。工业落后的中国在短时间内造出原子弹，靠的就是全国的大力协同，靠的就是勇攀高峰的科学精神。这也说明，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中国成功的秘密所在，是中国的优势所在。

科技工作主帅聂荣臻率先提出科研工作管理上要按“三步棋”走法来安排，即主管部门和科研单位都要树立“三步棋”的思想，一个是正在研究试制的型号，一个是正在设计的新型号，一个是正在探索的更新型号。他说：“至少要看三步棋，不能走到哪算哪里。”用通俗说法总结，就是“手里干一个，眼睛看一个，脑子里想一个”。与聂荣臻感情颇深的钱学森晚年曾说：“聂老总在导弹研究院刚建的时候，我们并没有提出系统工程的口号，但实际上很多做法，都是按系统工程的办法来干的。”“按系统工程的办法来干”“至少要看三步棋”，正是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精神的具体实践。

在国防尖端项目研究“缩短战线”政策调整中，为了集中力量搞两弹，人造卫星研究悄悄退到一旁。当两弹事业告一段落，人造卫星研制也提上了日程。当时，长征一号火箭的研制举步维艰。为了确保第一颗人造卫星研制成功，1967 年下半年，中央决定成立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孙家栋临危受命，负责卫星的总体设计。他从方方面面挑选出 18 个搞导弹的、搞卫星的、有系统工程经验的、有特长的技术骨干，承担卫星本体的研制任务。钱学森说：希望你们 18 个人能成为航天十八勇士，为中国的卫星，闯出一条天路来！研制第一颗卫星，是我们的初战，以后还要搞返回式卫星、载人飞船。请记住，是卫星，是国家的航天事业，把我们结合在一起。

孙家栋带领十几个青年人开启了中国人探索太空奥秘的创业之路。工

程需要一种二十几个插针的插头，孙家栋找到上海无线电五厂，才帮助制造出来。1969年底，长征一号火箭第一次发射遭遇了挫折。但很快于1970年1月30日再次发射取得成功。六个地面卫星测控站也建成了，陈芳允等科学家对外国卫星进行跟踪观测，证明中国测控网性能优良。卫星发射时所使用的通信线路全都是靠电线杆架起来的明线。为防止有人破坏，各地动员了数十万民兵，从发射场到各个观测站，在全国数万公里的线路上，保证每一根电线杆下面，日夜有人值守。

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终于发射成功，从此拉开中国人探索宇宙奥秘、和平利用太空、造福人类的序幕。

我国“两弹一星”的事业是集体的事业，它取得的每一次成功，都凝聚着千万人的奋斗和创造，辉煌和光荣属于每一个在这条战线上的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无名英雄，属于全体中国人民，属于自强不息的中华民族！

《人民政协报》，2018年1月25日

我国“两弹一星”历史研究现状与前瞻

詹欣

“两弹一星”历史研究是党史、国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两弹一星”精神激励和鼓舞了几代人，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总结“两弹一星”的成功经验与启示，对于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加快科技进步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两弹一星”是约定俗成的说法。1958年6月21日，毛泽东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指出：“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十年功夫完全可能”。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中国不得不面临国防工业的调整，1959年10月，中央军委提出，国防工业应以尖端技术为主，目前主要是导弹问题，同时也要注意核弹头问题。1960年初，在中央军委召开的扩大会议上，进一步明确了发展国防尖端技术的方针是“两弹为主，导弹第一”（周均伦主编：《聂荣臻年谱》，下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44页、第709页）。此后，随着中国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和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两弹一星”逐渐成为我国国防现代化伟大成就的代名词。

由于“两弹一星”事业的特殊性质，直至20世纪80年代以前，这段历史一直被尘封起来。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周恩来、聂荣臻和张爱萍等直接领导“两弹一星”事业的决策者、组织者的年谱、回忆录以及纪念性文章的面世，“两弹一星”历史的神秘面纱被逐步掀开，学界也随之对“两弹一星”历史展开了研究和探讨。

为展示新中国30多年的建设史，当代中国出版社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出版了系列《当代中国》丛书，包括原二机部副部长李觉等主编的

《当代中国的核工业》、谢光等主编的《当代中国的国防科技事业》和张钧等主编的《当代中国的航天事业》，这些专著编委会成员以参与决策和建设的亲历者为主，是不可或缺的资料。值得一提的是，1994年为纪念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30周年，《党的文献》选编了一组毛泽东、周恩来关于原子弹和原子能问题的论述以及原子弹爆炸相关文献，史料价值弥足珍贵。

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对当年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予以表彰。不久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专门召开“两弹一星”研制工作的历史回顾座谈会，邀请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和参加过这一伟大工程设计和建设的有关领导和专家，就党中央对“两弹一星”的决策和领导、研制过程中的曲折和甘苦、自力更生与依靠外援的关系、50年代形成的大科学体制的特点与影响、“两弹一星”精神的重要意义进行了座谈。此后，“两弹一星”历史研究进入了一个繁荣阶段，呈现百花齐放之势。

首先，从文献来说，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自2004年始先后三次解密外交档案，时间跨度从1949年到1965年，共约82000多份文件，包括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指示、各种重大外交事件文电、政府间条约和协定等。在这些文件中，包括了我国对和平利用原子能问题、在亚洲设立无核区问题、《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和国际裁军等问题的原则和立场，对研究“两弹一星”历史，具有极为珍贵的史料价值。2013年中央档案馆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联合编辑出版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其中有关“两弹一星”的文献十余篇，许多档案都是首次公布。其次，这一时期关于中国核武器计划的回忆性专著和文章也逐渐增多，包括直接领导和参与“两弹一星”研制的领导者和执行者，如毛泽东、周恩来、聂荣臻、张爱萍等，也包括负责研制的著名科学家，如钱三强、王淦昌、邓稼先和钱学森等。再次，从学术机构来说，2006年两弹一星历史研究会成立，并创办了《两弹一星历史研究》会刊和两弹一星历史研究网，推动了相关研究和学术活动的发展。

近年来，学界推出了一系列“两弹一星”历史相关专著与文章：关于“两弹一星”研制的重大决策，学者主要从两个角度进行分析：“两弹一星”事业是党中央集体领导的结晶。正是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经过无数人的不懈

奋斗，“两弹一星”事业取得了让世人瞩目的成就；同时也着重阐述毛泽东、周恩来、聂荣臻以及张爱萍等领导同志，在其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关于探索走自力更生道路与对待外援的经验教训，我国在“两弹一星”事业过程中，非常注重自力更生，依靠自己的力量，突破了一个个技术难关，积累了宝贵经验。关于弘扬“两弹一星”精神，有学者指出“两弹一星”精神，是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神和科学精神的体现，是中国人民在20世纪为中华民族创造的新的宝贵精神财富。以“两弹一星”精神为切入点，学术界重视其与当代社会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对接。关于探索“两弹一星”管理模式，“两弹一星”是中国成功组织的国家级重大科技工程，它的成功实施极大提高了我国的科技实力、经济实力和国防实力，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总结“两弹一星”的组织管理经验对推动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学术界主要围绕着“两弹一星”事业所广泛运用的系统工程、并行工程和矩阵式管理等现代管理理论和方法进行分析，探讨设计、实验、工程部门之间紧密配合、创新攻关的成功经验。

今后，“两弹一星”历史研究应该在以下两个方面予以加强：一要不断总结“两弹一星”的历史经验。“两弹一星”不仅仅是我国国防现代化的伟大成就，也是中国现代科学技术事业发展的重要标志。它填补了许多科学研究空白，为我国实现技术发展的跨越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这些经验包括：第一，坚持党的统一领导，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第二，坚持自力更生，自主创新。第三，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第四，坚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第五，坚持科学管理，始终抓住质量和效益。相关研究应该从关注“两弹一星”历史的人和事向总结历史经验，探索科学管理模式和人才培养路径转变，为改革创新提供新的借鉴和启示。二要深挖“两弹一星”历史文献，可喜的是，近年来随着有关“两弹一星”事业文献的逐步公布和相关领导同志和科学家的回忆录与传记的大量出版，为研究“两弹一星”史的学者提供了便利。当然，目前文献利用仍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应该充分利用相关史料及各国历史档案，开展口述史研究，努力推动“两弹一星”历史研究进一步发展。

《光明日报》，2016年6月15日

责任编辑：蒋菊平 钱慧春

装帧设计：阮全勇



**红色基因就是要传承。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
强起来，经历了多少坎坷，创造了多少奇迹，要让后代牢记，
我们要不忘初心，永远不可迷失了方向和道路。**

——2018年3月8日，习近平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山东
代表团审议时强调



人民日报出版社
官方微信平台



人民日报出版社
官方微博平台



人民日报出版社
官方淘宝店铺



定价：38.00元